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史



内容提要

本书为世界公元前 8 至前 3 世纪世界文化教育史，是阐述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发展历史的一部专业史著作。作者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取精用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地叙述了这一历史时期世界东西方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的进程，并以教育发展为基本线索，介绍了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制度演变和教育思想理论成就，对在世界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介。书中并对东西方教育异同、不同民族文化区域发展特点与成就加以分析比较。本书内容丰富，文字简明，在撰写过程中力求达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一、概述

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本《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史》，是百卷本《世界全史》划分的世界古代中期史，10个独立成卷的专业史的一个分卷。

在整个人类发展的悠久历史长河中，世界各个国家的民族祖先曾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为我们留下很多宝贵丰富的精神财富。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的渊源有很多就是来自世界古代中期这个历史时代。在这一时期，东西方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蔚为壮观的世界古代中期的文化教育画卷。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从搜集资料入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为指导思想，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史为本、以论为辅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以教育发展为基本线索，力图勾画出公元前8至前3世纪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发展的主要轮廓。书中既写西方，也写东方，从而展示出东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化教育成就。但该书由于受到篇幅字数所限，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不分巨细地详加论述，只能抓住一些重要问题突出地加以阐述。

在编写体例上，我们则以人类大区域的历史活动的分布范围作为基础撰写的空间，按地区和国家分题编写，自西向东构成框架，主要集中在叙述：欧洲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古代希腊、罗马，北非埃及和西亚两河流域，南亚次大陆印度，以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教育概貌。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在世界古代中期，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东方各国的文化教育，其性质和根本特点是一致的，都是适应了当时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实际情况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虽同属于奴隶社会这一历史阶段，民族文化教育内容和措施却表现有所不同，产生差异，各自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特色。

西方奴隶社会有代表性的文化教育，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教育。希腊民族创造了爱琴文明，成为欧洲文明史的开端和人类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建立奴隶制城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公元前5至4世纪希腊奴隶制达到繁荣阶段。希腊的文化教育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适应了奴隶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

在古希腊为数众多的城邦国家中，斯巴达和雅典的文化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是整个希腊文化教育的典型范例。斯巴达以农业立国，从九千户的斯巴达人统治十余万户奴隶和平民的实际情况出发，文化教育完全服从于对奴隶的残酷武装镇压和对外战争保护城邦的需要。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了它的教育性质注重军事教育，实行单纯尚武的军事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为捍卫奴隶制度的勇敢善战的军人武士。而在雅典，由于海上交通便利，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且随着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其文化教育提倡人的身心和谐的发展，培养服从和效忠国家的公民，使他们不仅成为军人，而又成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和商人。为达此目的，雅典积极兴办了多种类型的学校，诸如文法学校、弦琴学校和体操学校，还有国立体育馆等教育机构，开设了内容丰富的各种课程。

古希腊的教育实践活动，孕育了较为系统的教育思想，产生了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这样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学说，成为古希腊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希腊化时期，古希腊的文化教育传播到欧、亚、非三洲的许多地区，希腊文化对东方一些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希腊人也吸收了东方文化。体育作为文化教育

的重要内容，本书着重叙述了古代希腊体育，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的由来，以及古希腊教育家对体育教育的精辟的论述。

古代罗马的文化教育，同样是建立在剥削奴隶劳动的基础上，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它吸收了古希腊文化教育成果，也根据自己本国特点和需要进行修改和补充。希腊文化教育主要是通过罗马对后世欧洲的文化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人们通常把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并称为希腊——罗马文明。

古代罗马在王政时期（公元前 8—前 6 世纪）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罗马民族的思想生活到精神文化都还是很原始的。罗马王政时期已经有了文字，但由于流传下来的可靠史料很少，所以这一历史时期的教育状况难以稽考。从公元前 6 世纪开始，罗马进入共和时期。在共和早期，由于罗马社会经济特点决定教育的目的和性质是将年轻一代培养成为即作农民又当军人，完成这种教育任务主要是靠家庭教育形式。罗马共和后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变化，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促进了罗马学校教育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罗马学校教育制度体系。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后期的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代表，以后昆体良继承了他的思想，罗马的教育实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昆体良的教育理论体系中。

埃及、西亚两河流域的亚述和巴比伦等亚洲和非洲古代东方国家，比西方的希腊、罗马，较早地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奴隶社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它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许多特点，民族的文化教育也很早地就出现了。

埃及是世界上古老的奴隶制国家，古代埃及人创造了光照史册的尼罗河文明。约在公元前 3000 多年，古代埃及人就创造了象形文字。埃及在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中王国时期学校教育极为发达。古代埃及出现宫廷学校、职官学校、寺庙学校和文士学校等多种类型学校，并在数学、天文学、文学、历法、医学、航海和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世界古代中期，埃及的奴隶制度进入了衰落阶段。晚期埃及的社会经济特点，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由于商业的发展要求文字进一步简化，出现了“世俗体”文字，和西亚、爱琴海地区的文化交流超过了前代。尤其是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成就更是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西亚两河流域是世界文明的又一个发源地。当古希腊人还处在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荷马时代时，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已经持续约两千年了。亚述和巴比伦两个文明古国就建立在此。古代两河流域人民在文化教育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苏美尔文化是两河流域最早的文化，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两河流域的学校教育也很早地就开始了，巴比伦的学校以培养“文士”为教育目标，既有普通教育又有专门教育。到新巴比伦时期，在建筑、天文、数学和水利方面进一步发展，它的文化教育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古代印度的文化教育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亚次大陆人民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创造了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距今大约四千多年前，印度产生了哈拉帕文化，表现了古代印度人民的聪明智慧。在教育方面，主要特点是教育与宗教紧密结合。婆罗门教和佛教适应当时印度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其教义维系种姓压迫和构成培养人们宗教意识为核心任务的古代印度教

育的基本内容。婆罗门教采取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古儒学校教学内容完全渗透着婆罗门教的神学精神。佛教以广设寺院作为教育的场所，这些寺院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就是佛教学校。佛教教育也以神学为中心，教学内容主要学习佛教经典，佛教教育对许多相邻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古代印度人民同其他古代东方民族一样为丰富世界文化教育的宝库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教育发达。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 21 世纪，我国就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以后又经商代和西周，奴隶制从发展走向强盛。夏、商和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前 221 年），奴隶制社会开始解体，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经济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重要标志就是西周官学的衰废和代之而起的私人自由讲学的出现。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和教育思想流传下来，被人们认为是东方文明的象征。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删定而成《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部经书；他聚徒讲学，开办私学，从教长达四五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开创了我国私学教育的局面。孔子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对我国文化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著名教育家墨子、孟子、荀子和韩非的教育思想各具特色，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宝库。战国后期，出现了教育理论的著作，其中《学记》的成书，不仅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总结，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学的萌芽。

历史是绵延不断的，今天的世界是过去的世界的继续和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我们只有很好地了解认识过去，才能正确理解认识现实，也更加有助于展望未来。因此，学习和研究世界古代中期的文化教育内容是很有意义的。本书试图将世界古代中期东西方文化教育发展及其成就比较生动地呈现出来，使读者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文化教育的概貌，从中吸取可供比较和借鉴的有益的东西，从而更好地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二、欧洲文明的摇篮——古代希腊文化教育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其文化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每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有巨大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由此可见，希腊的文化教育在欧洲人民的心目中是多么亲切、熟悉，而享有一种特别的殊荣。世界古代中期，欧洲的文化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而古代希腊的文化教育，和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较，则站在了当时欧洲文明的前沿。古希腊人创造的文化教育奠定了近现代欧洲文化教育发展的基石。这是我们要以古希腊作为代表考察欧洲文化教育起点的原因。

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爱奥尼亚群岛。希腊半岛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是古希腊的主要本土和活动区域。由于山岳阻隔，它又分为北希腊、中希腊和南希腊（伯罗奔尼撒）三个部分。

从自然条件来看，希腊境内多山，土地贫瘠，不利于农业生产，而适于种植葡萄、橄榄，葡萄酒和橄榄油成为大宗的输出口。气候属地中海型，夏旱冬雨。多山造成了希腊半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通困难。但东南沿海地带，海岸曲折海湾深港口多，为航海与海洋有联系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希腊东南隔海与世界古老文明的北非埃及和西亚地区相望，古希腊人很早就吸收了埃及和西亚的先进文化，从而创造了欧洲最古老的文化。古代希腊的文化教育是西方奴隶制国家文化教育完整而典型的代表，成为西方文化教育之源。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1. 斯巴达和雅典奴隶制城邦的文化教育

荷马时代之后，公元前8—前6世纪，是希腊各奴隶制城邦的形成时期，史称这段时期为希腊的“古风时代”。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氏族制度瓦解，进入奴隶制社会，产生了一些奴隶制国家。这些国家规模狭小，领土面积也不大，历史上叫作“城邦”。这一时期，希腊人不仅在其本土和小亚西海岸，建立了很多奴隶制城邦，而且对外进行殖民活动。

在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中，阶级结构有奴隶和奴隶主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还有大量的自耕农和独立的手工业者。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根本矛盾。这些城邦国家建立之初，采用奴隶主贵族寡头政体，大权掌握在少数的贵族奴隶主手里，实行着“贵族寡头政制”体制。其后，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一些城邦中，工商业比重越来越大，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也日渐形成和强大，贵族寡头政治逐步由工商奴隶主统治所代替，城邦国家政体向奴隶主民主制发展。在古代希腊发展的历史上，和为数众多的城邦国家中，斯巴达和雅典是两个起过作用有影响的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城邦国家的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形成可以反映出其他许多古典奴隶制城邦国家的共同特征。而这两个城邦的文化教育，也正好可以作为希腊文化教育发展的范例。所以，在研究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时，我们选择斯巴达和雅典的文化教育为代表，进行探讨分析。

（1）斯巴达的单纯尚武的军事教育

斯巴达是古代希腊的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建于公元前 8 世纪。斯巴达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以及教育组织实施，是古希腊文化教育的一种典型。它重在对人的军事教育的培养，实行单纯尚武的军事教育。

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拉哥尼亚地区。这里是一片肥沃的平原，并得到犹罗达河的灌溉，适于农业耕种。平原的东、北、西三面被高山峻岭包围，南部以岩石海岸为境界。它的海岸不利于航行，无法进行海外贸易，航海业不发达。斯巴达以农业立国，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农业。

斯巴达城邦国家的居民构成，主要有三部分人，即斯巴达人、希洛人和皮里阿西人。

斯巴达人是多利亚人的后裔。约公元前 12—前 11 世纪时，多利亚人由北方向伯罗奔尼撒移民来到拉哥尼亚并定居在这里。此后，这些外来的征服者统一了拉哥尼亚地区。在公元前 8 世纪，斯巴达人建立起自己的奴隶占有制国家。斯巴达人是城邦的正式公民。他们是农业贵族，也被称为军事农业贵族，享有充分的权利。在人数方面，斯巴达公民（包括家属）人数不多，仅有 9000 户，共 3 万人，约占全国居民人口总数的 10%，其中成年男子只有几千人。

希洛人为拉哥尼亚地区的原有居民，斯巴达人在征服过程中，把他们变成农业奴隶，全体希洛人被固着在土地上，失去人身自由，没有政治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希洛人和斯巴达人之间更是界限分明不可逾越，他们受到极端的奴隶待遇，希洛人人数众多，大约有 25—30 万人。

皮里阿西人是由被驱逐到边远地方和原住在边远地区的居民组成，属于平民阶层。他们在政治上不享受公民权。而在法律上是自由人，需要纳税和服役。这部分人拥有自己的财产和土地，也可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当时，皮里阿西人约有 3 万户。

上述阶级结构表明，斯巴达是一个少数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斯巴达人不从事生产劳动，统治着 25 万以上的奴隶和平民，他们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从军作战保护城邦。对内残酷压迫剥削和镇压希洛人的反抗，对外进行防卫免受战争干扰。这样就使得斯巴达人长期处在高度的军事戒备状态，不得不把自己训练成为勇敢善战的军人武士。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了斯巴达的教育性质，实行单纯尚武的军事教育，它的整个教育都是为战争服务，以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当人们提起斯巴达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它的军事教育。

教育目的和教育组织系统。斯巴达教育的目的和宗旨，是通过严格的军事体育训练达到将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子弟培养训练成为身体强壮的武士和勇悍合格的军人，从而去完成对国内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并肩负起对外的掠夺和防御战争的重任，以确保奴隶主军事贵族的统治。这样，军事训练就成为斯巴达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不能成为公民，整个斯

巴达社会无异是一个军营。

斯巴达的教育组织，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国家教育场所，另一种称作“埃弗比”。

国家教育场所是国家的公育机构，类似寄宿学校，内设总监（亦称国家视导员）管理。总监周围还有所谓职衔叫“鞭打者”的作为助手，而从事直接的或正式的管教工作的人被称为小队教导员，一般由 20—30 岁的青年担任，负专门的责任。在公育机关里，同龄儿童被分成小队进行编制，每队约由 64 人组成，挑选机警勇敢的儿童任小队长。

埃弗比团是高等教育场所，亦称士官团或青年军事训练团。这种教育组织，要完成对青年的正规军事训练，由所谓“能干”的战略家进行领导管理。

教育过程、内容和方法。据传，来库古斯（Lycurgus）是古斯巴达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创始人，大约活动在公元前 9—前 8 世纪。他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身强力壮、效忠国家的统治者和武士，全部教育机关均应由国家主持，强调全民性的军事教育。这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约公元 46—120 年）所说的那样：“来库古斯将自己的同胞训练成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倒象是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聚集在首领的周围，怀着几乎是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

斯巴达人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是国家的重要职责。斯巴达人的生活受国家管制，儿童属国家所有，实际上教育过程和管理，从儿童一出生就开始了。

根据来库古斯法规定，斯巴达新生婴孩必须接受地方长老的严格检查。父亲要把孩子抱到长老那里，经过长老们的审慎检验后才能决定儿童的生存。如体弱有病不合格者，或被抛弃于露天野地任其死亡，或被丢给奴隶希洛人。健康的婴儿才能允许保留下来，由父母养育并得到九千份土地中的一份。在斯巴达人看来，开始就在健康方面有天然缺陷的生命，对个人和国家都是无利无益的，只有强健的婴儿可能长成良好的战士。基于同样的原则，妇女对于初生婴儿不是用水，而是用酒洗浴，以此作为一种对婴儿体质的试验。因为据说癫痫和有病的婴儿在烈酒中就会抽风和失去知觉，同时健康的孩子是能象钢一样地接受试验的，并且还能够得到一种坚强的体质。被检视合格的儿童由父母代替国家抚养，至 7 岁为止。这可以说是斯巴达国家对儿童青少年教育管理的第一个阶段。

从 7 岁开始，男孩被送进国家教育场所，正式接受军事体育锻炼。这是国家对儿童教育管理的第二个阶段。

军事训练的主要项目内容是五项竞技，即赛跑、跳跃、角力（摔跤）、掷铁饼、投标枪。另外，还有骑马、游泳、射箭和各种军事游戏。这些训练项目均分等级，对儿童进行严格训练。国家教育场所内制度严酷，生活单调。儿童在这里，一年四季衣着单薄，光头赤脚，饮食也非常粗劣。他们睡觉没有被褥，成群地睡在用手而不是用刀从尤罗塔河岸采集来芦苇铺成的床上，冬天也只允许加一点蓟毛取暖。为了培养儿童的顽强坚韧的性格，无论是受到鞭打，还是在格斗中受伤，都不能哀号呻吟，否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说来也很奇怪，斯巴达人为了鼓励儿童的机警性，经常让他们到住地附近去偷

柴米和蔬菜，成功者受到表扬，被发现的要受到处罚。正如传说故事讲的那样，一个斯巴达的少年儿童偷了一只幼小的狐狸，把它藏在自己上衣贴胸的地方，这畜牲用尖牙利爪扒出了少年的肠子，但他还是强忍疼痛，宁肯死去，也不愿让人发现他的偷窃行径。看看斯巴达不少青年在阿尔特弥斯·奥提亚祭坛阶下，忍受苦难被鞭打致死的情景，使人更加相信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

在这个阶段里，国家教育场所还要对儿童进行特殊的政治教育。斯巴达的社会领导人物经常来到这里，与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谈话。谈话的内容有关各种政治问题，并向儿童提出各种问题，诸如“谁是好公民和谁是坏公民？”，“谁是国内的优秀人物”，等等。要求儿童迅速回答，答案要简短有内容，锻炼儿童的敏捷头脑。此外，国家教育场所的监督和负责者，还要向儿童少年讲述奴隶制国家的政治法律、风俗习惯、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并让他们参加一些实际活动，例如祭神、竞技，以至执政者的就职庆祝仪式。凡此种谈话和各类活动的意义，目的都是训练儿童将来成为城邦国家的保卫者和统治者。儿童在国家教育场所受训练到 18 岁为止。

年满 18 岁的青年要转到高一级的埃弗比团学习，进一步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这是斯巴达教育管理的第三个阶段，受教需用 2 年的时间。

青年当成为埃弗比成员时，要主动到阿尔特弥斯圣殿巨大的祭坛上去承受鞭打的严峻考验。届时，忍受了最多鞭打又没有畏缩者就要受奖。在学习期间，受训青年还要参加秘密服役，即在夜间对奴隶希洛人进行突然袭击和追杀。这样作法，是激发斯巴达青年仇视奴隶的心理，同时以此慑服奴隶，加强管制。青年在 20 岁时结束在埃弗比团的训练学习，开始戍边服役到 30 岁。30 岁时可成为正式公民和合格军人，参加公民大会。斯巴达国家对青少年的教育管理至此才告完成。

斯巴达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对年轻一代的军事体育训练，极为强调军事教育，但对于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不重视的。阅读和写字对儿童来说，只学习一些最必需的东西，仅仅学到够用而已。其它一切训练都在追求一个目的：使他们善于服从命令、承受艰难困苦与能征惯战。

关于妇女教育问题。重视对女子的教育是斯巴达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妇女教育被视为斯巴达国家的重要职责，其原因是因为女子有生育健康后代的重任。这是斯巴达人对教育价值认识的明确表现。和希腊其他城邦国家比较，“斯巴达的妇女自然要比其他希腊妇女占着受人尊敬得多的地位”。斯巴达人允许女孩过一种自由的户外生活，青年女子在出嫁以前，也受着跟男子同样的体育训练，其目的是要培养女孩成为身体强壮的母亲，以生育健康的儿童；另外，男子外出征战时，可以防守本土城池，训练的内容如同男孩练习五项竞技，要学跑、跳、打球、掷标枪、角力以及舞蹈唱歌等。普鲁塔克说，来库古斯对于妇女给予了一切可能的关注，“他让少女们锻炼身体：跑步、摔跤、扔铁饼、掷标枪，为了使她们将来的腹中婴儿在壮健的身躯里打下壮健的底子并更好的发育成熟，也是为了使他们自己健壮结实，怀胎足月，能够顺利地、轻易地对付分娩时的阵痛。”但对女子的训练与男子训练所不同的有二点：第一，准许女孩们住在家里不过兵营的生活；第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59 页。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 102—103 页。

她们的训练强度也比男孩要小。

斯巴达人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和训练成功的效果，使斯巴达妇女作为母亲，在当时希腊人当中，和斯巴达男子士兵享有同样的崇高声誉。

斯巴达教育在西方文化教育史上，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类型，对后世欧洲的教育实践和理论的形成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斯巴达重视教育，把教育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而给予关心。普鲁塔克在谈到斯巴达教育时首先明确指出：“就教育而言，来库古斯把它看作是立法者的最伟大和最崇高的任务。”因此，斯巴达人上至城邦政府，下至普通百姓都对办理教育事业表现出一种很大的热忱。在这种关怀教育的思想指导和鼓舞下，斯巴达教育工作组织严密，对青年一代实施有步骤的教育，对女子教育和训练也非常重视，这些都是斯巴达教育中值得称道的积极方面。

斯巴达实行单纯尚武的军事教育，构成了它的教育的基本特点，其教育性质也是野蛮和落后的。斯巴达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均由奴隶主贵族政治目的所制约。斯巴达教育有其明显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教育是为贵族寡头政体服务，教育的目的是在于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以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奴隶主贵族子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广大的奴隶和平民的后代则完全被排斥在外。斯巴达办理教育有积极的方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教育存在片面性和消极面。例如，斯巴达只重视军事体育教育，而不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更谈不上对文学、艺术和哲学的研究，这些在斯巴达教育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这就使得斯巴达的生活极为单调狭隘。再如，斯巴达教育单纯强调服从和纪律，这种压制性的纪律约束表现在斯巴达人全部生活举止中，他们的神态言行必须时刻保持严厉和固执，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的个性发展的一种摧毁。色诺芬对斯巴达教育下的青年形象作了很好的描写：“守纪律和服从的精神在斯巴达盛行”，而青年人“沿街行进时，双手插在斗篷里，默默前行，也不左顾右盼，只是一味谦恭地盯着地面”，这些都不足为奇。

斯巴达教育对古代希腊教育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柏拉图吸取斯巴达人的教育思想，也主张由奴隶制国家统一办理教育，把全体自由民的子女，看成是整个奴隶主国家的后代。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同样，更强调教育是国家的职责，教育是国家的事情，认为：“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不要象现在这样，每人只分别地照顾自己的儿童，给予自以为最适合于他们的教育。”斯巴达教育不仅在对西方教育理论方面，而且在实践方面也为后来欧洲有的国家办学所模仿，象英国的寄宿学校让学生过集体生活，公学教师培养学生应该具备勇敢和服从精神，等等。由此可见，斯巴达教育对后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雅典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

雅典是古代希腊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建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古典时代，雅典社会经济和奴隶主民主政治繁荣发展，与此相适应，它的文化教育也独放异彩，和斯巴达实施的单纯的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02页

[英]威廉·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任宝祥、吴元训主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

军事教育比较，雅典教育重在对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培养，成为进步的古希腊文化教育的典型形式。

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雅典位于地中海中部、希腊东南的阿提卡半岛上，是希腊的一个沿海城邦国家。境内多山少平原，不利于农业生产，橄榄和葡萄却很早就在这里得到了大量的种植。而大理石、银矿和建筑用的陶土等矿藏，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阿提卡海岸线曲折、漫长，连接各条航路，处在中希腊各邦和东方联系的前沿地带，可通地中海、黑海沿岸，直到小亚细亚。这种地理环境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从事海外贸易，对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雅典人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积极开展与外界其它国家的交往，吸收比它先进的国家的文化。同时，生活在这样环境里的雅典人，大海使他们变得心胸开阔，培养了勇于冒险、开拓、进取的精神，发展了他们的创造力。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摇篮和先驱，在雅典人身上，希腊民族的天才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

雅典的社会阶级关系比较复杂。公元前 8 世纪左右，雅典的氏族公社逐步解体，开始形成奴隶制城邦。和斯巴达同样，雅典原来也是一个农业国。农业贵族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享有特殊权利，他们霸占了阿提卡半岛的最好土地，占有大量的奴隶，有些农业贵族还经商、放高利贷。奴隶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奴隶和奴隶主是雅典社会的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彼此间长期进行着尖锐殊死的斗争。此外，雅典社会还存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人是雅典的平民，与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相比，他们属于“自由民”，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在政治上也无民主而言。由于阶级的分化，大部分农民丧失土地无法维持生活，只得向贵族借债，最后沦为贵族的债务奴隶。因此，奴隶主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雅典社会阶级矛盾的又一个方面。随着雅典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包括富裕的商人、船主和手工业作坊主，他们经济实力雄厚，成为平民的上层。但旧的农业奴隶主贵族统治阻碍了他们的发展，由于不能分享政治权力，新兴的商业奴隶主也起来反对旧贵族的专制和独裁，要求在政治生活领域有民主和自由。到了公元前 7 世纪末和 6 世纪初，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已经越来越激烈，这些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经过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富有的工商业奴隶主同贵族一样参加了雅典城邦的统治，扩大了雅典奴隶主统治的基础，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完善。这就为雅典的文化教育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各派思想学说的争鸣，为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希腊对波斯战争（公元前 492—前 449 年）结束以后，希腊奴隶制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在希腊各主要工商业城邦，这种繁荣以雅典最为突出，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高度发展。奴隶劳动被广泛使用于各个生产部门，手工业作坊普遍使用奴隶劳动，作坊种类有制陶、冶铁、酿酒、造船、纺织、制革等等。小作坊使用几个到十几个奴隶，大的作坊使用奴隶达几十个，有的甚至上百个。罗立温银矿有上万个奴隶在矿坑里，整天暗无天日地进行着挖矿砂的生产劳动。希波战争以后，雅典还控制了提洛同盟各国，建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起着控制主宰整个希腊和地中海的全局作用。雅典成为地中海地区的最大商业中心，东到小亚细亚、西至法国南部、南到埃及、北至黑海沿岸，与周围国家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接受着古代东方的文化影响。雅典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又为它的文化教育繁荣打下了物质基础。

雅典优越的地理环境、民主政治的实施、繁荣的经济生活，这一切都为它的文化教育发展奠定了背景和基石。雅典的这些政治、经济和生活的特点，使它的教育无论从教育目的、组织形式、教育过程、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和斯巴达教育比较呈现了很大的不同，更加广泛灵活、丰富充实，具有多面性。

教育目的和教育组织。在教育的总目的上，雅典和斯巴达具有一致性，都是培养维护奴隶制度的统治者，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为服从和效忠国家的公民。但是，由于雅典商品经济的发展、实施民主政治的需要，教育目的已不满足限于培养训练成身强力壮的军人武士，而还要把青年培养成为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修养的政治家和善于通商的交际商人。作为政治家要能言善辩、擅长演说；作为商人要具备知识、头脑灵活。因此，雅典教育除了军事体育、道德教育外，还重视智育和美育的教育，逐渐形成一种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雅典教育对人的要求是身心既善且美。身的教育不仅着眼于军事准备，而且注意身体的健美匀称和动作的灵活。心的教育，包括音乐、文字、文学的文化教育。而宗教和道德的教育贯穿于整个身心教育的过程。雅典就是通过这样的教育来兼顾人的个性和公民性的双重发展，培养身心和谐发展能履行公民职责的新一代。这种注重身心和谐发展，强调体、智、德、美多方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体现在雅典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全部过程里。它比斯巴达的单纯尚武的军事教育，内容丰富生动。

在身心和谐发展教育思想指导下，雅典兴办了多种类型的学校，开设了各种课程。教育组织机构，大致分三级五种。初等教育，有文法学校和音乐学校，音乐学校亦称弦琴学校。这两种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学生要交学费才能入学。中等教育，有体操学校，亦称角力学校，也由私人办理。高等教育，有国立体育馆，由国家主办派人监督管理。还有埃弗比团的高级教育。以上这些教育机构，均为奴隶主阶级子弟设立，教育的阶级性异常明显。

教育过程、内容和方法。雅典的学校教育，据推测在梭伦时代以前就存在了，并成为雅典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据传，最早有关教育的立法应归功于梭伦。梭伦（约公元前640—前559年）进行政治改革时，将管理学校一项列在雅典法典中。有关教育方面内容有：国家有权给那些在战争中死亡者家属的子女交付学费；双亲要照顾子女学习读、写和游泳；指定学校视导员；学校的规模和开学放假时间；教员的委派和责任以及教仆的品格；学生的年龄、出身，谁应入学和怎样入学；其他还有成人不得进入学区等规定。由梭伦规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可以推断学校在那时确已存在的事实。

雅典教育制度基本上构成了完整体系，对儿童、青少年的教育过程、内容和方法大致情况如下：

学前教育（7岁以下）新生婴儿要经过严格检验。7岁前男女儿童均在家庭由父母抚育。有的家庭将孩子交给奴隶照料。教育的内容有做各种游戏，包括唱歌、玩球、掷骰子、玩小动物，还有听讲故事、神话，同时接受礼貌道德教育。

初等教育（7—13至14岁）7岁以后，男女儿童教育有别，女孩不能进校识字读书，仍继续留在家庭受教育，主要学习缝纫、纺织、刺绣等手工技艺。男孩可同时进文法学校和音乐学校，或先入文法学校，后进音乐学校，接受初等教育。当时，儿童上学往返途中，由成年奴隶侍候陪伴，这种奴隶称为“教仆”，教仆大多仪态端庄兼有文化。智育教育方面，儿童在文法学校里要学习读、写、算简单的知识。读，即识字阅读，从字母到单词，学到

一定程度阅读《荷马史诗》等等，让儿童学习和效法英雄人物。写，是指在蜡板上描字，并用墨水在羊皮纸上练习。算，是用手指或类似算盘之类用具计数。美育教育，音乐学校是对儿童进行美育的主要场所，雅典的儿童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在音乐学校里，儿童要学习唱歌、弹奏七弦琴和朗诵《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史诗片断，其目的达到陶冶儿童的性格，增加美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音乐和体育相互配合，彼此和谐刚柔互济，使人的心灵和谐渐趋完美的境界。

中等教育（13—18岁）雅典儿童在文法学校和音乐学校学习，达到12—13岁时，要进入高一级的体操学校，接受中等教育。体操学校一般设立在音乐学校附近，以体育教育为主，学习年限2—3年。学习内容以五项运动为主，即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通过体育增强儿童体质、训练技能技巧、锻炼精神意志。大多数青少年在此学习二三年就去求业谋生。少数显贵子弟为担任国家工作，升入国立体育馆深造。学习内容除体操教育、军事技术外，还要学政治、哲学、文学等。雅典国家对国立体育馆的建设，从教师选择到学校设备条件都予以关心重视。

高等教育（18—20岁）正式公民的后裔，年满18岁的青年在国立体育馆毕业后可升入埃弗比团。这是一种专业军事高等学校，培养军事领导人才。修业期限2年。入伍的士官生要在雅典神庙宣誓，誓词是：“我决不玷辱我的神圣武器，也决不抛弃我队伍中的同伴；不管是我一人还是与同伴一起，我都要为神庙和公产而战；我要让祖国更强大繁荣，决不让她削弱；我要服从法官。遵守现存的法律和以后人民可能制定的法律，如果有企图推翻或违背法令的，无论我一人或与同伴一起，我都要坚决抵抗；我要尊敬祖先的神庙和宗教。请帮助我吧，阿格劳洛、恩雅略、阿瑞斯、宙斯、泰洛、奥克索、何格芒。”之后，接受国家授予的矛和盾两种武器，学习军事知识和技能，举行操练表演，在边防驻地军队见习。完成以上训练任务，20岁时通过规定的仪式，成为雅典的正式公民。除埃弗比青年军训团外，高等教育还有著名哲学家办的一些哲学学校。在这种学校，教育内容大多根据学校创办者的个人哲学观点，对主要哲学问题展开研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创办的学园就属这类学校。从公元前5世纪起，一批批智者从外邦来到雅典。他们周游各地收费授徒，满足了青少年对更多更高的文化知识需要的追求。智者讲授修辞学、哲学、自然科学、天文学和法学，传播新的知识和思想，扩大了青年们的眼界，受到社会和青年们的欢迎。智者的讲学到了公元前4世纪，还由流动的短期讲学形式发展为比较固定的教育制度。

在阐述雅典教育过程、内容和方法之后，进一步再谈谈雅典对于女子的教育，是远远不及斯巴达对妇女重视的那样的程度。雅典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低，妇女从属于男子，主要职责是在家中料理家务。女孩子和男孩子受的教育不同，女孩子只能在家庭接受母亲的教育，在家庭里学习点文化，如识字、阅读和唱歌，不可能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雅典妇女活动范围狭窄，一般都局限在家庭，很少和外界往来接触，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虽然如此，但在雅典妇女中也曾出现过富有知识和才华的女子。

雅典和斯巴达教育比较。雅典和斯巴达的教育实践集中地反映了希腊教育的状况。雅典和斯巴达教育比较有其共同之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

践上都以注重教育著称，这两个城邦国家都重视军事体育教育，把军事训练摆在了教育的重要位置。但和斯巴达单纯尚武的军事教育比较，雅典培养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更具有特色，适应了雅典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雅典人看来，一个最好的公民应该具备道德、智慧、健康和美诸方面品质的和谐发展。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在评价雅典教育时，谈到：“我们爱好美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这番话表达了雅典教育追求的目标和教育的宗旨。

雅典教育，在培养目标上不仅要求身强力壮的军人武士，还要求培养教育政治活动家和商人。在教育内容上扩大了范围，把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相结合，并要求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体育目标要求既身强力壮，又发育匀称。音乐教育注重培养人的节奏感，使其心灵纯洁举止文雅。知识教育是作为衡量人是否有教养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了广博的知识，才能启迪智慧，从事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活动。道德教育重在智慧、勇敢、节制、公德四种道德品质教育青少年。在教育事业的办理形式上，雅典既有国家办学，也有私立学校，表现了办学的灵活性。雅典教育的这些内容，是斯巴达所无法比拟的，与斯巴达闭塞保守的政治环境和它的单纯的军事教育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雅典教育在古希腊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成为古代希腊教育思想产生的基础，古希腊的思想家从雅典的教育实践中汲取了营养，为他们论证的教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后来，罗马共和时期，在教育目标、学科内容的很多方面都袭用了雅典教育的作法，特别是它的和谐教育，对亚里士多德以及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教育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 智者的出现和代表人物的教育观

智者，是古代希腊人把有智慧、能力和技艺出众者，称为“智者”。后来，“智者”一词的内容含义发展为以收学费授徒的职业教师的称号。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出现了一批职业教师，他们往来城市周游各地，发表应时的演说，教给有志学习的青年辩论的艺术，培养青年们参加奴隶民主政治和从事政治活动的的能力。这些以教学为职业的教师们，在教育史上又被称为“智者派”。智者们的教育活动的主要地区和中心是在雅典。

（1）智者的教育活动

希腊和波斯战争（公元前500—前449年）结束以后，整个希腊半岛的经济和文化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历史时期。当时，希腊城邦尤其是在雅典，由于奴隶民主制的发展，经济的空前繁荣，使统治阶级上层日益感到提高教

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雅典公民为了能够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和参加城邦事务的管理，也更加迫切要求受到多方面和更高的文化教育，使之能够在法庭、人民大会和一切公共场合阐发自己的主张，以动人的演说驳倒对方争取群众。这样，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辩论术就越发显得重要了，人们需要掌握演说的方法和技巧。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传播新颖的知识，教授辩论术的技巧，于是便在希腊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以教学为职业的教师，他们就是所谓的智者。雅典的对外开放和宽松的环境气氛，更为智者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智者从希腊各地来到雅典，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以教育为职业，接受报酬，代行学校的任务，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

智者从希腊的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以游学的方式从事教育的实践活动，吸引那些肯出学费的子弟来听讲学习。智者并没有共同的学说，但他们有一定的独特信仰和价值理论，在教育观点上，智者深信人的素质是能够通过教育改变的，人的力量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教育目的就是教人学会怎样参加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和知识。黑格尔在分析智者的教育目的时，曾作过这样精辟的概括：“他们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说教育，教人治理一个民族，或者通过观念以使一件事情办得通。那时还没有离开哲学的枯燥对人类全体、对人的本质方面都不关心的各种实证科学。此外他们还有着最普遍的实践目的，就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的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的职业性政治活动。”智者的教育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要使人有智慧，教育青年有适应政治斗争需要和生活智慧的专门能力。因此，他们的教学内容都涉及到人文科学，特别是那些与辩论术有关的科学。

智者教学的主要科目是文法、修辞学（雄辩术）和辩证法（哲学），他们创立了古希腊的最早的课程内容，即后来西方教育史上所说的“三艺”科目。智者派以雄辩著称，他们给予辩论术以很大的价值，因为辩论术对于每个希腊人来说，是一种说服人的艺术。当时辩论术风靡整个希腊，它是争取群众、博得名声的主要手段。在政治生活斗争中，往往是靠演说取胜。在雄辩中，语言是人的特殊力量，为了使雄辩有力，就需要有文法、修辞和辩证法的知识。所以说，智者创立的“三艺”学科是和雄辩演说有着直接的关系。文法、修辞学是有关语言结构的知识，讨论各种词类、词的性质功能以及词的辨析修正。智者还对文学作品，如作品的结构、句的构造、字的选择等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对于发展文法做了有力的推动工作。辩证法的意思就是进行谈话和论战，辩证法要教授对某些具体观点的论证，提出正反两方面理由进行辩论，是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的一门艺术。经过智者们的倡导，教育活动蓬勃展开，三艺教学得到发展，成为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初等和中等文学教育的重要课程，时间长达1500年之久。以后，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和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四艺合称为西方教育史上的“七艺”。

智者除讲述三艺科目外，还对自然科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也很重视。他们认为，天文学和地理学对于雅典的航海和对外贸易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智者还以某种物质，如水和火等来推测宇宙万物的构成和宇宙的本质。有些智者研究天文、数学，并用空气、云的运动来说明下雨、打雷、闪电的原因。他们在教授自然科学时，利用了天文仪和几何仪器，在西方的教学中，智者

们首先最早使用了教学仪器。此外，有的智者还重视音乐教学，认为音律能使人在交际场中显得风雅，教人学习“音量”、“音律”等知识。在教学方法上，智者还注重练习。由上述可见，智者们的适应着日渐成熟的对各方面比较高的教育的需要，教学内容是比较广泛的，而且也是十分丰富的。

（2）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的教育观点

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是古希腊智者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们对希腊的哲学和文化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

普罗塔哥拉。普罗塔哥拉（公元前481—约前411年）生于色雷斯的阿夫泽拉城。公元前445年，他来到雅典授徒讲学，是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智者，智者教育活动的先驱人物。在雅典期间，他与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交往密切。普罗塔哥拉曾作《论神》一书，怀疑神是否存在，书中有段话说：“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象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他的这一思想触犯了希腊传统的宗教世界观，因而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据传，普罗塔哥拉虽逃出了雅典，但在前往西西里岛的途中，乘船遇到狂风巨浪，船沉丧生。

在哲学世界观方面，普罗塔哥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他以个人的认识 and 感觉作为真假的的标准，冲破了旧的传统观念和宗教世界观，说明了万物的尺度是人而不是神，提高了人的意义、地位和价值，从而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伟大作用和控制自然的力量。这一思想的提出，反映了雅典工商业奴隶主要求有更多权利的迫切愿望，在雅典民主派反对贵族派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哲学观点是主观唯心论的命题，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标准。

普罗塔哥拉在教育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在人的形成和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指出：“对于学习，天赋和练习是同样的需要；我们应从少年学起。没有实践的和没有理论的实践都没有意义。学习如果没有达到相当的深度，便不能在灵魂中生根。”普罗塔哥拉重视道德教育，强调公民的善恶要通过教育来进行，道德是可以通过教育获得的。

普罗塔哥拉关于教育目的问题，认为教学是为了使学生成为良好的公民，并能成功地处理公共和私人的事务。根据这样的目的，普罗塔哥拉教学力图使在他那里求学的人学到“私人事务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智慧。他们学到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能够在国家事务方面作最好的发言与活动。”

普罗塔哥拉的教学科目主要有文法、修辞学和演讲术，他研究文法，并把它引进了课程中。在教授演讲术时，他首先向学生提供简单的讲演，作为语言的范例；其次，进行有关这方面演说的考试；第三，进一步学习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第四，让青年演说家练习演说，教师给予评论；最后，由学生进行公开讲演。

普罗塔哥拉代表著作有《论神》、《论真理》和《论相反论证》等。由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9页。

米定斯基：《世界教育史》，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27页。

《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2页。

于他主张和宣扬无神论思想而受到迫害，著作也被焚毁，除留下残篇片段外，几乎都散佚了。现在，研究普罗塔哥拉的思想多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关他的材料来进行探讨。

高尔吉亚。高尔吉亚（约公元前 483—前 375 年）和普罗塔哥拉一样，也是智者派的创始人物，以演说术和修辞学而著称。他是西西里岛莱奥提尼人，早年随哲学老师恩培多克勒（古代哲学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的学生）学习修辞、论辩、自然哲学和医学。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为请求联合反对叙拉古，高尔吉亚于公元前 427 年被他的母邦派往雅典。他在雅典完成出使任务后，游历了希腊的许多城市，在那些城市收徒讲学传授演讲术，除了得到高额报酬以外，并以新颖的演说风格博得了很大的声誉。晚年，高尔吉亚居住在特萨里亚的拉里萨。由于高尔吉亚在辩论术和修辞学方面的贡献，他死后，雅典人在德尔斐神庙给他树立了一座金质的半身象，使人瞻仰表示纪念。

高尔吉亚对哲学问题的研究，集中反映在他对“非存在”问题的论证中。高尔吉亚在其《论非存在或论自然》这部著作中，接连提出了“三个命题”，即：第一，论证“无物存在。”他提出，如果有物存在，则该物或是存在者，或者是不存在者，或者既是存在者又是不存在者。他通过反证的方法进行逻辑论证，来证明三者都不能成立，最后得出结论归于什么都不存在。第二，论证“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人也无法认识它”。他论证说，如果我们所思想的东西真实存在，那么凡是我們思想到的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实际上我们却可以思想到并不存在的东西，例如 6 头 12 足女妖、吐火怪兽等等，这又说明我们的思想是靠不住的，存在是认识不到的。第三，论证“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对此点论证，高尔吉亚说：“因为我们告诉别人时用的信号是语言，而语言并不是给予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语言，语言是异于给予的东西的。”从上面高尔吉亚关于“非存在”的论证，反映了他的一切皆无、一切都不可知、一切都不可言说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出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特征。

高尔吉亚的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为熟练的雄辩家和善于辞令的人。他把修辞学引进雅典，教学活动的主要科目是传授演说术。高尔吉亚在修辞学、演说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演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排比、比喻和声韵的技巧，演说术具有很大的逻辑力量和修辞语言的力量。他还用散文代替诗，散文比诗听起来更美。这些，使高尔吉亚在雅典受到了人们的赞誉，赢得了声望。

高尔吉亚还写有《帕拉梅德斯辩护词》和《海伦赞》两篇辩论文章流传下来，这两篇也是高尔吉亚演说术的典范，在他的演讲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智者派的贡献和发展演变

智者们的教育实践活动，对雅典乃至整个希腊的文化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评价智者派的教育活动时曾指出：“智者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他们代替了从前的公众教师，即诗人和史诗朗诵者”。“他们以教育为职业”，“以智慧、科学、

音乐、数学等等教人”。这些智者是希腊人的启蒙教师。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1794—1871）在他的《希腊史》一书中，也论述了智者对希腊文化的启蒙作用，智者对希腊的文化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在欧洲哲学史和文化教育史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由于智者们的积极活动，使雅典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智者们的教育活动，用知识武装了人们的头脑，促进了智慧生活的发展，体力活动降到了次要地位，从而提高了希腊人的文化水平。可以这样说，当时没有一个生活范围是智者们所未接触的，他们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不少新颖的观点。其次，智者系统讲授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将演说术提高到很重要的位置，对这些学科加以深入研究，使这三门学科得以建立，为后世的三艺教学奠定了基础。第三，智者们的教育活动，标志了西方教育史上高等教育的产生。他们在青年当中推广正式教育，教育对象是15—16岁的青少年，时间大约2—3年或者3—4年。从智者的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来看，已具有了高等教育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说智者的教学是西方高等教育的萌芽。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智者活动于希腊很多城市和东方的许多国家，吸收了各地方的学问，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在信息闭塞的时代，他们做了城市与城市间的活的联系，增进了知识学术的交流。希腊的文化教育，通过智者们的教育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为代表的早期的智者派，是一批真正的学者和教师，他们重视教育的作用，理解教育对人的重要意义，对雅典和希腊的文化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但是，随着希腊民主制的消亡，智者派的活动也逐渐衰落下去，智者派也发生了演变。在晚期的智者派当中，有一部分人将哲学和雄辩术蜕变成概念游戏，蜕变成为任意诡辩的方术，或以是为非或以非为是，颠倒是非歪曲真理。他们已失去了“智者”的初始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对这些人来说，称之为诡辩派或许更为恰当合适。

3.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实践活动与教育思想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世界文化名人，号称古希腊三杰，他们的思想学说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们的教育思想体系还不够完整，但意义重大的是西方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却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1）苏格拉底及其教育思想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古代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是古希腊的三杰之首，被西方学者尊为圣贤。

生平和教育活动。苏格拉底生于雅典附近阿洛佩凯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索弗罗尼斯科斯是雕刻匠，母亲法伊纳列特为助产士。他早年学过雕刻技艺，也曾在他父亲选择的初等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熟读荷马等诗人作品。学习过数学、几何、天文学和音乐多方面的知识，对哲学尤感兴趣。苏格拉底曾自谓：“我一生从没过过宁静的生活，我从不关心大多数人所关心

的事情：诸如赚钱，建立舒适的家庭，谋求高官厚禄等；也没有参与如政治、秘密结社、结党等在我们城邦从未间断过的政治活动。”

苏格拉底从 30 岁开始，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从事教育工作，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被认为是第一个当公众教师的雅典人。

苏格拉底活动的年代是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由兴盛而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目睹了希波战争及其结束以后，希腊奴隶制民主制的繁荣，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一制度的主要缺陷。其基本的政治观点，思想比较保守倾向于奴隶主贵族政体，而对于民主制采取怀疑的态度。他站在热爱雅典、忠于母邦的立场上，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缺点进行抨击。他也为当时雅典潜藏着的滋长的危机，诸如法制观念淡化、道德日渐败坏、金钱权利的诱惑，而深为忧虑。他认为当时社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怎样教育青年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在他看来，教育最能使人获得理解力，要以政治美德去教育公众。教育失败了，国家也就危险了。为此，苏格拉底将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公众和青年教育上，时间长达 40 年。

在教育过程中，苏格拉底教学没有一定的对象，更没有固定的地点场所。他的门人中既有贵族派，也有民主派。有本邦人，也有外邦人。有政治家，也有将军。从青年到老人，从富者到穷人，无论是普通的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成了他教育的对象。体育馆、广场、街坊、商店成了自然的教室。苏格拉底说：“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比如，尤泰鲁斯就是一个“不得不亲手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当雇工的人。画师帕拉西阿斯、雕刻匠克雷多、制造胸甲的皮斯提阿斯都成为他的教育对象。

苏格拉底和当时活跃在雅典的智者派虽有表面上相似的地方，但与他们又有很大的不同。智者派教人要收取学费，但他却分文不取，把教育人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色诺芬回忆说：“尽管他（指苏格拉底）接待了许多希望听他讲学的人，其中有本国公民也有外国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讲学而向任何人索取过报酬，而是以其丰富的学识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对于受教育他不仅不收取报酬，有时还愿意倒付钱，最大限度地嘉惠了那些愿意领受他的教益的人们。从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来看，智者派侧重在雄辩术、文法、修辞。苏格拉底的教学内容重视道德、智慧、治国能力的培养，目的在于教人怎样做人。他的教学方法采用的是谈话的方法，即著名的“苏格拉底法”。

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被指控违犯法律，犯有不敬城邦旧神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两大罪状，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没有留下文字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观点，主要是通过学生色诺芬和柏拉图的作品反映出来的。苏格拉底是古代中期哲学史和教育史上饶有趣味的人物，黑格尔说他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人物”。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72 页。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第 66—67 页。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78 页。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0 页。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39 页。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思想学说多由大弟子柏拉图继承和发展。

哲学观点和论道德教育。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曾经说过：“苏格拉底以其外在特征，独到的品格，哲学推理的新风格，开辟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

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研究对象在探讨宇宙的本原，而苏格拉底对研究自然界不感兴趣。他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由神安排好的，就连人的灵魂也是由神安排的，真理就在人的心灵中，大力宣传神学唯心主义。因此，他强调哲学的目的在于研究人类自身，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要“认识自己”。人的智慧贵在“自知其无知”，从认识自己开始，达到认识的最高境界的善和接近智慧。可以说，苏格拉底的哲学研究范畴是以伦理为中心，包括政治、伦理、实际知识和教育等方面的内容的伦理哲学，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阶段。

从伦理哲学观点出发，苏格拉底把道德修养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提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道德观念，他发展了智者派学者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说法，主张“有思考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的含义，即是说人们只有认真深刻的思考才有可能达到道德的完备。在他看来，有思考能力的人，就是那些智慧和才能优异的少数贵族，他们具备了智慧、正义、勇敢、节制等优秀品德。所以，奴隶制城邦国家政权应由这些人去行政管理。

在柏拉图所著的《美诺篇》内，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有关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道德教育的问题。美德是什么？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一种善，知识包括一切的善，从而提出“美德即知识”的教育观点。美德既然是知识，美德就可以由教育得来，美德不是天生的，美德是可教的，即德行可教。在西方教育史上，苏格拉底是最早提出了知识和德行的关系，以及教育在培养德行中的作用。但是，苏格拉底把知识和道德等同起来，有知识的人必然也就具备了美德，这个说法显然是片面的。知识和美德并不能划等号，有了知识并不就等于具备了美德的品质。他认为，美德不能没有知识，还是有道理的，而他重视道德品质修养和人的智慧的发展，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培养造就有知识的治国的人才。苏格拉底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事业“对于人类有最大好处”。他一生除少数时候参加政治活动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哲学和教育事业上，相信自己在“教育方面很精通”。并为培养和教育奴隶主贵族国家需要的人才付出了辛勤劳动。苏格拉底从维护奴隶主贵族城邦的统治利益出发，提出教育目的是要培养造就有专门知识、有管理才能和训练有素的治国人才。他是一位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热情鼓吹者，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一大批的治国人才。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观点，在他和智者安提丰的谈话中明确地表示出来。有一次，当安提丰问他，即使他懂得政治，但他自己既然不参预政事，怎能想象他会使别人成为政治家的时候，苏格拉底回答说：“是我独自一人参预政事，还是我专心致志培养出尽可能多的人来参预政事，使我能够对政治起更大的作用呢？”由此可见，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01 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 193 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 193 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 38 页。

苏格拉底把培养教育治国人才比自己亲身去从政更为重要。

苏格拉底倡导专家治国，认为群众缺乏理智和政治能力，治理国家只能依靠那些少数优秀人物，在处理城邦行政事务上，他主张只能“站在专家一边，即站在能提出真理权威一边”，“应敬畏有专门知识的人更甚于敬畏其他所有人”。苏格拉底也反对当时盛行的以抽签办法选举执政和将军的所谓民主制。他谴责说：“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苏格拉底的专家治国的思想，后来成为柏拉图提出培养哲学王教育思想的基础。

苏格拉底把培养有专门知识的治国人才作为己任，并且不断地研究怎样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当权的问题。对那些有执政能力的人，他就积极鼓励他们出来参加城邦的政治管理活动。哈尔米戴斯就是很有才干又熟悉公共事务的一个，“远比当时执政的人们更有本领”。那时，哈尔米戴斯畏缩而不愿管理城邦事务，苏格拉底就用各种不同的话劝勉他参加政府工作。指出：“不要轻忽城邦的事务，只要力所能及，总要尽力对它们加以改善；因为如果把城邦的事务弄好了，不仅对于别的公民，至少对你的朋友和你自己也有很大好处。”

苏格拉底对缺乏专门知识的青年，常常通过谈话的方法，引导他们去学习从政应该具有的的必要知识和经验。向青年人说明，一个统治者对于国家事务如果没有精确的知识，他就不可能使自己有光荣的深刻道理。那时候，柏拉图的弟弟格老孔还不到20岁，却非常渴望在城邦政府中当一名领袖。为了使格老孔清醒认识自己的知识贫乏，苏格拉底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质询帮助他。苏格拉底首先从城邦税收谈起，他问格老孔：“目前城邦的税收是从哪些方面来的，总数共有多少？为了使不足的得以补足，使缺少的可以得到新的来源的弥补，毫无疑问，你对这些问题一定都考虑过了？”格老孔回答：“说实在的，对于这些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苏格拉底又问：“那么，请你对我们讲一讲城邦的支出吧。因为很显然，你一定打算把那些开支过大的项目加以削减”。格老孔回答道：“我还没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于是，苏格拉底说：“连支出和收入都还不知道，又怎能把这些事照管好呢？使城邦富裕呢？”格老孔对关系城邦经济生活的税收和支出这样重大问题茫然无知。苏格拉底接下去又继续问格老孔，诸如城邦的军事力量和敌人兵力的对比、城邦的防御工事布置、银矿税收减少原因、粮食贮备等等问题，而格老孔对这些也都一点不清楚。当格老孔承认自己完全没有担任所期望职位的必要知识的时候，苏格拉底及时劝诫他：“格老孔，要当心，你一心想想要出名，可不要弄得适得其反啊！难道你看不出，去说或做自己还不懂的事情是多么危险吗？”并热情诚恳地讲：“在所有的事上，凡受到尊敬和赞扬的人都是那些知识最广博的人，而那些受人的谴责和轻视的人都是那些最无知的人。”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第93页。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第92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8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110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112页。

如果你真想在城邦获得盛名并受到人的赞扬，就应当努力对你所想要做的事求得最广泛的知识，因为如果你能在这方面胜过别人，那么，当你着手处理城邦事务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地获得你所想望的就不足奇怪了。”

苏格拉底还经常劝勉一些热望担任公职的人学习所要求于他们的业务，充分认识他们在所寻求的岗位上所应负的责任。比如，他教育一个青年想在城邦里担任将领而忽略学习，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惩罚。没有军事知识的人是不能当军队指挥官的。“因为在战争的危急时期，整个城邦都被交在将领的手中，如果他成功，整个城邦将会获得很大益处，如果他失败，整个城邦将蒙受很大的损失”。苏格拉底的这一番话激起这个年轻人前去学习军事知识的兴趣。当这位青年人学完战术归来，苏格拉底又对他讲，这还不够，因为战术这只是将兵术的一小部分罢了。一个将领还必须能够为战争的必要事项进行准备，他必须能够为部队取得粮秣；必须是一个足智多谋、精力旺盛、谨慎、懂事、坚忍不拔而又精明强干的人；和蔼而又严峻；坦率而又狡诈；善于警惕而又巧于偷袭；审慎周详而又大胆进取；知道如何排列阵营……这些品质都是一个想当将领的人所必须具备的。苏格拉底还帮助一个被选为骑兵指挥官的青年，如何研究改善骑兵，使他认识了解骑兵指挥官的两个责任：第一，改善士兵和马匹的情况；第二，不把照料马的责任单单留给士兵。骑兵将领应如何训练士兵，又怎样使自己取得这样的资格。除此，作为一名指挥官还应该培养自己的演说能力，使之能够鼓舞士兵的战斗士气，从而激发每个战士的荣誉感。这样，就会在装备、马匹、纪律和奋勇迎击方面大大超过敌人。

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以教育力量去培养造就有知识的治国人才，这在当时来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一个进步。应该承认，在古希腊奴隶社会时代，培养一批有德行、有知识、有才能的治国人才，担任国家各级领导，总比那既未受过专业训练，或采取抽签办法，或者以其他方式而取得行政领导资格的人要强得多。

苏格拉底方法。苏格拉底的教育教学手段采用的是一种谈话的方法，即通过问答引导人们思考问题达到教育的目的，这在西方教育史上是最早的启发教学。后人将他的问答法教学形式称为“苏格拉底方法”，或称“产婆术”（精神助产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启发式就是从苏格拉底方法发展来的。

苏格拉底的母亲谙于产婆术，他受母亲帮人助产接生的启发，将此方法运用于人的思想的产生。苏格拉底没有固定的教馆，教育对象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他在大街、集市、运动场、剧场无拘无束地和人们交谈，讨论政治、战争、哲学、宗教、艺术、爱情、婚姻、家庭等等问题，引导人探求真理形成正确的思想，取得关于道德的完善无误的概念。

苏格拉底的这种谈话问答式的启发教育教学，大体过程基本上可分为讥讽和助产术两个主要步骤进行。第一步是讥讽。他在和各种各样人物讨论问题时，总是先装出自己对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引起对方提出问题，让人家回答。如果对方答错了，他也不马上纠正谬误，而是进一步提出补充的问题，加以引导。苏格拉底之所以这样教人，就是为了引导人发现自己认识上的矛

苏格拉底与格老孔的这段对话内容，引自《回忆苏格拉底》，第106—110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84—85页。

盾，怀疑自己已有的知识，迫使承认自知其无知，从而更积极思考去寻找问题的答案。第二步是助产术。苏格拉底认为，他自己的任务就是充当“智慧的产婆”，在启发对方发现自己认识的混乱，并否定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走上正确认识的道路，即“帮助真理出世”。这一步是让人取得真理性的认识，最后形成概念。例如，他在与青年交谈时，他总要对方给事物试下定义。比如“虔诚”和“节制”等词在谈话中出现，苏格拉底就反问：“什么是‘虔诚’？什么是‘节制’？”年轻人就按照个人考虑来回答问题。此时，苏格拉底马上提出一些和回答并不适合的例子，引导对方放弃或修正最初的定义，这样一问一答直到双方获得都满意的一个定义。

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记录了苏格拉底与一个自负青年尤苏戴莫斯关于“正义”问题的一段对话。文字虽然长一些，但这是苏格拉底方法的一个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故转引在下面以帮助了解认识其问答方法的精神特点。尤苏戴莫斯理想作一名政治家，苏格拉底便向他提出了有关正义的问题，并且问尤苏戴莫斯是否可以举出什么是正义的作为和什么是非正义的作为。于是，尤苏戴莫斯回答说“能够”。苏格拉底便建议他把正义的作为放入一边，非正义的作为放入另一边，接下去问道：

“虚伪是人们中间常有的事，是不是？”苏格拉底问。

“当然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苏格拉底问。

“显然应该放在非正义的一边。”

“人们彼此之间也有欺骗，是不是？”苏格拉底问。

“肯定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应该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当然是非正义的一边。”

“是不是也有做坏事的？”

“也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奴役人怎么样呢？”

“也有。”

“尤苏戴莫斯，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如果把它们放在正义的一边，那可就是怪事了。”

“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人民，我们不是也能说他是非正义呢？”

“当然不能。”

“那么，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当然。”

“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这也是正义的。”尤苏戴莫斯回答。

“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

“当然是。不过，一起头，我还以为你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哩。”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所有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的一边了？”苏格拉底问。

“好象是这样。”

“既然我们已经这样放了，我们就应该再给它划个界线：这一类的

事，做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但做在朋友身上，却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苏格拉底问。

“完全同意。”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接下去又问道：“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就要来了，因此，就制止了士气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哪一边呢？”

“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我看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志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它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当然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又问道：“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的确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

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和人们讨论各种人生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给予苏格拉底方法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苏格拉底的最大贡献就是首次提出归纳法和定义的方法，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苏格拉底的谈话式的教学方法，其显著的特点是引导人们去思索，学会逻辑地思考问题。他不是将系统的具体的知识直接向受教育者传授，也不是将现成的结论强加于对方，而是通过问答、交流和争辩的方法来宣传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教育主张。显然，这种方法含有归纳的因素，但又不是单纯的归纳。它有助于人的积极思维，调动受教者的主动性，激发人们去学习知识。把苏格拉底方法运用在教学上，可以使人把获得规律性的知识作为教学的中心任务。但也应该看到，这种问答式的教学方法，需要建立在受教者要有追求知识的愿望热情的基础上，受教者还须已有了一定的事实和知识，否则问答谈话难于进行。苏格拉底的这种问答法是在有了一定的知识和具备推理能力的成年人中使用，而不适合少年儿童，对于大多数少年儿童还应该是讲授系统的文化知识，问答的方法则可以作为辅助的教学方法。

论学习广博的知识。在苏格拉底学生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不少地方记录回忆了苏格拉底关于论学习知识的问题。

苏格拉底从灵魂不朽论出发，认为知识在人出生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而出生的时候又失去了。因此，学习不是获得知识，而是重新唤起回忆生前已经具有的知识。“借助视觉、听觉或任何其他感觉感知了一个对象后，感觉者可以通过联想回想起已经忘记了的对象……他们只不过回忆以前所掌握的知识，换言之，学习就是回忆。”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学习即回忆说。这种提

《回忆苏格拉底》，第145—147页。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8页。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第150页。

法割断了感觉对象和知识的联系，也割断了感知和思维的联系，知识的来源变成了不可捉摸、不可思索，让知识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如果抛弃消极的东西，学习即回忆说也含有积极的内容，比如，重视感觉，注重新的感觉经验和已有知识的联系、联想和对比。这种联想，以后发展成为统觉论。

苏格拉底认为，国家的领导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必须具有广博的实用知识。在他看来，凡做一切事情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国家这种大事，就更需要丰富的知识。一个好的政治家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具备广博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关于善、美德的知识，还要熟悉掌握国家的情况。这样，他才有可能把城邦治理好，他要求每一个担任国家公职的人，都应该努力学好自己的业务，有独创的精神，适于管理公务。为达此目的，苏格拉底不知疲倦地教给人们各种知识。色诺芬回忆说：“凡是一个善良和高尚的人所应该知道的事，只要他自己知道，他总是非常乐意地教导他们，如果他自己不熟悉的话，他就把他们带到那些知道的人那里去。他还教导他们，一个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对于各门实际学问应该熟悉到什么程度。”

苏格拉底主张人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有用的东西上面，换句话说，应该学习那些能够直接应用的知识。例如，他说：“一个人学习量地学，只须学到在必要时，能够对于买进、让出或分配的土地进行正确的丈量、或者对于劳动量进行正确的计算，这是很容易的。任何专心研究过测量学的人，都会知道一块地有多大以及它是怎样测量出来的。”他不赞成为了研究复杂难解的图形而学习量地学，因为他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尽管他自己并非不懂这一套。苏格拉底认为，这样做会使人把整个精力都消耗在上面，以致许多别的有用的东西都无法学习了。

苏格拉底还劝人学习天文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知道夜间的时辰、月份节令、为了作水陆旅行、值夜班和其他必须按节令、月份或夜间工作的方便，以便利用征象来分辨上述时间。他认为这一切知识也是很容易从那些在夜间行猎、掌舵和许多其他职业上有必要知道这些事的人那里学到的”。而至于为了分辨那些不在同一轨道上旋转的天体、行星和彗星，为了计算它们和大地的距离，它们旋转的周期和原因而消耗精力，这一切他都非常不赞成。

苏格拉底也劝人们学习算术，但对此也像对于其他事情，他总是劝人避免作那些无意义的劳动。无论什么有用处的事，苏格拉底总是亲自和他的门人共同研究、共同进行考察。

论青年教育。苏格拉底喜欢和青年人交往。色诺芬回忆他对青年教育时深情地说：“苏格拉底无论做什么事情，或在什么情况下，对人都很有帮助，以致对任何一个肯思考的人来说（即使他只有很平凡的分辨能力），极其明显的是，没有什么比随时随地和苏格拉底交往、言谈，更有益处的事了。”

青年们从他那里获得了有益的教诲。

苏格拉底希望青年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热爱青年，但他所爱的并不是他们的身体的年轻美貌，而是那些人的心灵的倾慕美德。他鉴别青年人的

《回忆苏格拉底》，第 182—183 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 183 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 183 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 138 页。

善良品质是通过他们学会他们所注意的事物的速度，他们对于所学得的事物的记忆能力，以及他们对于学习一切有助于管理好家务、庄园、城邦和成功地处理人类事务的知识的渴慕程度。苏格拉底认为，这样的人在受了教育之后，不仅他们个人会得到幸福，管好自已的家乡，而且还会给别人和整个城邦都带来幸福。

苏格拉底针对青年身上存在的不同情况和特点，教育青年的方法并不都是一样的。对那些自以为禀赋好而轻视学习的人，他就教导他们：越是禀赋好的人越需要受教育。他说：“烈性而桀骜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的时候加以驯服，就会成为最有用、最骁勇的千里马，但如果不加以驯服，则始终是难以驾御的驽材而已。”苏格拉底认为，青年人受到好的教育就能成为优良有用的人，如果受的教育不好，他们的意志越坚强，就越容易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以训练猎犬为例比喻，品种最优良的、最经得住疲劳的、最善于袭击野物的猎犬，如果经过良好的训练，就会最适于狩猎，而且最有用处；但如果不经训练，就会变得无用、狂暴、而且最不服使唤。教育培养青年也是同样，苏格拉底指出，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应当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良、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做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是，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为由于不知应该选择做什么，就往往会插手于一些罪恶的事情，而且由于狂傲激烈、禀性倔强、难受约束，就会做出很多很大的坏事来。

苏格拉底深情教育青年们，幸福不在于财富，而在于知识，在于做对人类有贡献的人，并获得人们的尊敬。对于那些以财富自夸，认为不需要受教育，财富会成就他们的心愿，使他们受到人们尊敬的人，苏格拉底就热情地教导他们，说：“只有愚人才会自以为不用学习就能够分辨什么是有益的和什么是有害的事情。也只有愚人才会认为，尽管不能分辨好歹，单凭财富就可以取得自己所向往的并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只有呆子才会认为，尽管不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但这也就是做得不错了，而且也就是为自己的一生作了美好的或充分的准备了。只有呆子才会认为，尽管自己一无所知，但由于有财富就会被认为是个有才德的人，或者尽管没有才德，却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苏格拉底，如同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一样，在世界文化教育史上都是享有声望的历史人物。他在政治、哲学思想上虽然有很多保守的地方，但是，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方面，却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教育观点和方法。比如，著名的苏格拉底产婆术教学方法，“知德统一”的教育思想。等等，成为后世人们不断研究的学术课题。今天，我们学习研究一点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对于了解西方文化教育的渊源是会有帮助的。

（2）柏拉图及其教育思想

柏拉图（约公元前 427—前 347），古代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希腊学园的创始者。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生平和教育活动。柏拉图是雅典人，原名阿里斯托克勒斯，生于奴隶

《回忆苏格拉底》，第 139 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 139 页。

主贵族家庭。其父亲阿里斯顿，母亲佩里克蒂娥尼在当时雅典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名望。柏拉图青少年时代，热心学习文法、修辞和写作，爱好体育锻炼。在科林斯海峡举行的一次运动会上，参加摔跤比赛，取得优秀的成绩。此外，他还对音乐、美术等学科很感兴趣，受到专业老师葛老孔的精心培养。20岁开始，他投师苏格拉底，从此成为苏氏的忠实门徒。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后，年仅28岁的柏拉图因受牵连而被迫离开雅典。他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等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柏拉图考察和研究了关于政府问题、政治法律、哲学学说、宗教状况、教育制度以及天文数学原理成就。这多方面的调查活动为其以后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次周游期间，他还宣传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公元前387年，柏拉图返回雅典时，已进入了不惑之年，随即创建了阿加德米学园，在此著述讲学，长达40年。

柏拉图一生著作丰富，著名的教育代表作有：《理想国》和《法律篇》等。

哲学观和社会观。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体系极其复杂，概括起来，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其哲学的中心思想即提出了“理念说”。理念，希腊文的本义是“被视之物”。

柏拉图认为，世界可以划分为“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这就是说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或称现象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在他看来，现象世界是变化的、虚幻的，理念世界才是永恒的、真实的。理念世界是原型和本，现象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和不完善的影子。在理念世界中，又存在许多个别理念，形成不同的等级，由低级逐渐走向高级，最高层就是纯理念。这个纯理念就是神，即宇宙万物的根本。可见，柏拉图的“理念说”是一种客观唯心论。

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柏拉图拥护贵族政治，反对民主政治。在他的“理想国”内，神用不同的东西造出来三种人，分为哲学家、军人武士和劳动者。哲学家被列为第一等，是治理国家的贤哲，“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身上加入了黄金”，具备了“智慧”这种最高美德，理应和适宜成为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等军人武士，是保卫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人，在他们身上含有白银，具备了“勇敢”这种美德，理应和适应于成为国家的保护者。劳动者包括农夫、手工艺者、商人，统称为民间艺工，属于第三等。他们是神用铜铁造成的，具备了“节制”这种美德，责任适应于劳动生产，为前二等人服务。至于奴隶，柏拉图从未把他们作为人对待，奴隶永远不能成为主人的朋友。据此，柏拉图认为第一等和第二等人要按严格教育制度培养教育，而教育和道德问题与第三等人是无关的。这样，柏拉图就给奴隶主阶级统治披上了神秘色彩，进一步合法化和神圣化了。

论教育目的和作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关于教育目的和作用的问题。

从维护奴隶主阶级国家利益出发，柏拉图提出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哲学家和军人，也就是要把奴隶主的子弟培养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和保卫者。他十分重视对哲学家和军人的培养和教育。柏拉图认为，作为一个执政者应该是“哲学王”，应具有哲学的头脑深通哲学，认识“善”的理念，能根据真、

善、美、正义的理念原则去管理国家，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而作为一名军人必须是由身体和智力健全，且经过严格的教育训练的公民承担。谈到培养哲学家和军人教育的关系时，柏拉图指出：军人教育是基础，是哲学家教育必须经过的阶段过程，哲学家的教育是在军人教育这个阶段上去完成。无论是培养哲学家，还是培养军人，都必须依赖于教育。

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同样重视教育的作用。柏拉图强调教育的重要意义，认为教育作用表现在对人的教育和社会国家建立巩固两个方面：第一，教育对人人的作用。在《理想国》第四卷中，苏格拉底和阿棣孟塔斯有一段关于论教育作用的对话，苏格拉底谈到教育的好处，他说：“我认为一种适当的教育，只要保持下去，便会使一国中的人性得到改造，而具有健全性格的人受到这种教育又变成了更好的人，胜过他们的祖宗，也使他们的后裔更好。”柏拉图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通过适当的教育，人性可以得到改造，可以使人变成有理性的人。第二，教育对社会和国家的作用。柏拉图认为，教育是建立理想社会和国家的重要工具。在他看来，教育要服从于政治、教育目的要和政治目的相适应。既然社会和国家由哲学家统治，军人负责保卫，手工业者和农夫进行生产劳动，那么，教育就应起到建立和巩固维系这种社会秩序的作用。

阿加德米学园的创建。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纪念传奇英雄阿加德谟的花园里创办了阿加德米学园。这在西方是最早出现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术的一所综合性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学园办学培养对象是奴隶主贵族子弟。教育内容丰富，包括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理论，还学习文法、法律、历史、伦理学，体育被列为必修课。教学和学习方法多采用苏格拉底问答法、正式演讲、学生个人钻研等形式，并开展政治咨询活动。教师和学生中曾出现了不少知名人物，如斯彪西坡、色诺克拉底、泰阿泰德、米尼德谟斯、亚里士多德、德琉斯等。阿加德米学园的创建是欧洲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西方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阿加德米被译意为“学院”，欧美一些中学或程度略高于中学的学校，曾以此冠以校名。

关于教育阶段的划分。柏拉图吸取和总结了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实践经验，主张教育应由国家管理，接受国家严格监督。他提出了人从出生一直到终世的不同阶段的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其过程大体包括学前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

关于学前教育，柏拉图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学前教育思想。他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及早开始，甚至提出了优生和胎教的见解。在教育态度上，柏拉图效法斯巴达教育儿童的作法，凡是自由民之子女，都属于奴隶主国家教育管理范围。具体来看，3—6岁的儿童要送到公立儿童游戏场，接受国家指派的保姆抚养教育。在游戏场里，儿童学习唱歌、听讲故事和做游戏。这些活动的内容，被看成是“道德影响的最好一课”。因此，对于音乐里的语言和故事作为儿童教材，主张必须加以选择审查内容，适合儿童性情和符合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

柏拉图认为，普通教育在6岁以后开始，要尽量对一切儿童施以所谓强

迫教育，自愿的固好，不自愿的也要来。7—18岁男女儿童要分别居住，进入官办的初等学校学习。这些学校有文法学校、体操学校和音乐学校。学校“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学习内容有机操和音乐。体操教学有机操、舞蹈、角力和军事锻炼。音乐课教学有唱歌、舞蹈、演奏，还有读、写、算基础知识。强调女孩和男孩一样也要接受军事训练。这一阶段学习重在德、智、体、美的教育，使儿童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和谐的发展。不难看出，柏拉图是以雅典和斯巴达的教育实践为样本，提出了关于儿童基础教育思想。

18—20岁青年要进行2—3年的专门军事训练，进入青年军事训练团学习，接受高等教育。教学内容一方面体育锻炼，还要学习“四艺”，即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在柏拉图看来，四艺知识作为一个军人来说都是应该掌握的。算术学习，有助于调兵列阵和计算船只。几何学习有助于建造兵营和行军列阵，天文学有助于航海，行军观测气候，音乐可以提高战斗士气。青年到20岁时要进行一次筛选，大部分人做为军人编入军队，少部分优秀者再接受10年教育。学习内容继续学习四艺科目，重点研究哲学。这一阶段虽然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但和前一阶段学习目的不同，不在实际应用，重在锻炼思维能力，是为了达到培养出哲学家或“哲学王”。这10年学习结束时，再经过第二次筛选，一般被分配去担任政府官吏。少数人再用5年时间学习辩证法，担任重要官吏职务。极少数的人还需要再经过15年的锻炼，经受磨难考验后，在学识和事功上都是优秀的，尤其是在哲学方面学有成就，就可以成为奴隶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至此，才算完成了教育的全部过程。

柏拉图继苏格拉底之后，多方面地探讨和研究了当时的教育问题，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其教育理论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服务于奴隶主国家统治利益。他主张国家实施对全体公民教育，提倡人的智、德、体、美的和谐发展，确立了四艺课程体系，设计了完整的教育方案，重视幼儿教育 and 女子教育，创建阿加德米学园，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而给人富于启发的地方。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宣传先天观念和遗传决定论以及森严的等级制度，又是消极的。

（3）亚里士多德及其教育思想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是继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古代希腊的又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

生平和教育活动。亚里士多德生于希腊北部靠近马其顿王国的边境地区色雷斯的斯塔吉拉城。其父尼各马科斯为马其顿的宫廷御医，母亲菲斯蒂丝是爱奥尼亚的土著。他少年时期，由于家庭环境条件，曾有机会接触一些学者和跟随本地学校教师学习，受到良好的教育。

亚里士多德17岁时来到了雅典，拜柏拉图为师，在阿加德米学园学习和工作长达20年，直到柏拉图去世为止。公元前343年，42岁的亚里士多德应马其顿之聘成为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历时7年，这是他命运的光辉一段。亚历山大出征波斯前夕，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又重返雅典。不久，在阿波罗神庙附近创办了吕克昂学园。这个地方有许多林荫路，有树木、喷泉和

柱廊装点着。也许就是由于这些供散步的林荫路之故，他的学派获得了“逍遥学派”的名称。在此，亚里士多德潜心讲学和科学研究，经常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讨论。他的一些主要著作《政治学》、《工具论》、《物理学》、《诗学》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亚里士多德在哲学、政治学、逻辑学、伦理学、历史、物理（自然学科）、心理学和美学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研究，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兴趣。恩格斯称他为古希腊哲学中“最博学的人物”。

公元前 323 年，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隐居到优卑亚岛卡尔基斯城。次年秋天病逝，终年 63 岁。

亚里士多德主要著作有：《形而上学》、《伦理学》、《工具学》、《灵魂论》、《政治学》，其中《政治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观点和主张。

哲学观和政治主张。在哲学观点上，亚里士多德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最终又走上了唯心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他的老师柏拉图在哲学问题上的一些见解，对柏拉图的“理念说”进行了批判。他反对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的观点。也不同意所谓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永恒不变和现象世界是虚幻的、不稳定的说法。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统一的，事物是统一的。他说，人们不会相信在日常所见到的太阳和月亮之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理念的太阳和月亮。他还确认，世界各种事物包括“物质”和“形式”，形式不能单独存在，而是寓于在“物质”之内，举例来说，大理石是“物质”，雕象是“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大理石便不可能有雕象的存在。这具备了唯物主义的因素。但亚里士多德却把“物质”看成为低级的、被动的；形式是高级的、积极的，最高级的形式即是神。这在本质上又倾向了唯心主义。

根据上述哲学观点，亚里士多德论证了人的灵魂和肉体两方面的关系，认为，二者关系如同形式和物质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并进一步指出灵魂共有三个部分，即：植物灵魂、表现在营养和繁殖方面；动物灵魂或称意志灵魂，表现在感觉和欲望方面，性质高于植物灵魂；理性灵魂，表现在思维或认识方面，性质高于动物灵魂。据此，亚里士多德提出要求教育与此三种灵魂相适应，进行体育、德育和智育的教育。

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亚里士多德主张国家由具有适度财产的中等奴隶主阶层来统治才是最好的。他既反对氏族贵族专制的统治，也反对商业奴隶主的共和制，反对过分贫富悬殊，代表了奴隶主阶级中等阶层利益。他说：“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这样的国家很有希望能治理得好：即在其中中等阶级的人数很多，并且在可能时还比其它两个阶级合起来更强。”

教育目的和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教育是国家的事业，教育应该由国家控制，受国家监督管理。在他看来，既然国家具有一个目的，显然一切人就应该受到同一的教育。他批评当时存在的有人只分别地照顾自己的儿童，给予自以为最适合于他们的教育现象，指出：“凡与共同利益有关的事物，大家都应受到相同之训练。我们也不应当以为任何一个公民是属于他自己的，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国家的，人人都是国家的一分子。所以，对于各个分子之照顾与对于全体之照顾是分不开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9 页。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58 页。

的。”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要培养统治者和全体公民的德性，使国民追求真理，立法者应首先注意少年儿童的教育。他十分称赞拉西第蒙人（斯巴达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并且使教育成为国家的事业。

亚里士多德在肯定教育对国家社会作用的同时，还对人的自然素质及其潜能、环境的影响和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说：“人类除天性与习惯外，尚有理性。由于天性、习惯和理性不能经常统一，这就必须使他们互相调和。倘若理性说服了人们该去做什么，人们常能做出许多违反习惯与天性的事情。我们已经确定了哪些天性是最容易借立法者之手而形成的；其他都是教育的工作。我们学习世事有些是通过习惯，有些是通过教导。”他要求人们看到自然给予的力量，就如同每一种物质都存有潜在发展的可能性一样，人同样也具备自然赋予发展能力的胚芽，这种胚芽的发展要赖于教育。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自然已将三种灵魂统一起来，那么教育就应该遵循人的自然发展的原则，把体育、德育和智育密切结合，使受教育者得到和谐发展。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教育发展史上，最早提出教育要适应人的自然发展的一位教育思想家。

提出按年龄分期划分人的受教育阶段。亚里士多德根据人的发展自然程序，首次提出了按年龄分期来划分人的受教育阶段。他把人从初生到成年划分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受教育的时间定为7年。其对每个阶段受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的具体情况如下：

7岁以前的教育 儿童在7岁以前受家庭教育。这一阶段对儿童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发育身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婴儿出生以后的抚育方式对其体力有很大的影响，可进“含乳分最多的食物”，为了保护儿童的脆弱肢体免于骨骼弯曲，也可借助于器械使其身体正直。让儿童在幼年习于寒冷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法，有助于健康，能促使坚强、忍受寒冷。在此期间，不宜要求儿童学习课业或工作，以免妨碍身体发育。应有充分的活动，以免肢体不灵。活动的方式虽有多种，但游戏和听故事可为主要方式。游戏不应是鄙俗的，易使人疲倦的。管理儿童教育的总监应对故事加以精选。同时，还应注意儿童周围环境的影响，应当特别留心使儿童尽可能少和奴隶接近，这点充分体现了他的奴隶主思想观点。7岁以前的儿童必须住在家里，避免沾染下流习气。

7—14岁的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在这一时期应进入国家办的学校接受和谐教育，并以情感道德教育为主。教育科目有：阅读、书写，体育锻炼，音乐和绘画四类。智育方面，阅读、书写和绘画被视为在各种生活中有多种用途的课程。学习这些内容可以为参加政治生活、个人谋生、评价艺术作品以及处理家事作基础的准备。体育锻炼的目的，在于可以鼓舞勇气使人健康有力量，亚里士多德要求养成参加体育活动的习惯。他强调体育锻炼要培养人的勇敢精神，但不能象斯巴达教育儿童那样凶猛残忍，而是要比较柔和，使身体发展不受损害。他明确指出，要把儿童送到真正能够培养他们身体正当习惯的教练员和教导他们体育锻炼的角力老师那里去接受培养训练。这样，体育锻炼对于学生来说是适度的，而不是过分的活动。他很看重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第100页。

音乐的价值，认为音乐不仅是进行美育的有效的手段，而且具备智育的一部分职能，并且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途径。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学音乐是为了娱乐”，“音乐的功用，便是在闲暇时供理智的享受”，“音乐之所以被列入学科之中，显然就是根据这个理由：这是自由民度其闲暇的一种方式”。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倡的“文雅教育”的思想基础。他主张音乐教育在各年龄阶段都要学习，在吸取雅典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把应属于智育部分的文学作品和诗文阅读、欣赏、咏唱也列入了音乐教育范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学科的功用可分为实用和文雅两个方面，从而把全部课程大致分为有用学科和文雅学科两类。书写侧重实用，音乐重在文雅。有用学科是为实际需要，服务于实利；文雅学科是使人心宁神静，供闲暇和理智享受。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雅教育”思想，2000多年来一直支配着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对欧洲的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4—21 岁的教育 这一时期的教育，属于高年级阶段，教育以智育为主，主要任务在于发展学生的理智灵魂。但由于亚里士多德关于这段教育期的著作失传，所以他在教育内容方面的设想，我们看不到更具体的材料。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可能属于这个阶段的教育。从这所学园的课程，大体可以推测出 14—21 岁时期学生受教育的内容。这个时期的学校学习科目可能有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理论。此外，还可能有哲学、文法、文学、诗歌、修辞学、伦理学等。通过以上这些科目的学习，实现教育的最高目标。

亚里士多德在女子教育问题上，却比他的老师倒退了一大步。他误认女子的天性劣于男子，高深的教育和修养对于她们并无实益，女子的美德应是服从于丈夫和沉静寡言。因此，亚里士多德轻视和反对女子受教育。

亚里士多德在众多学术领域里取得的成就，是古代希腊文化教育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他的哲学思想上的唯物的观点，受到进步思想家、特别是唯物主义者的重视，而他的唯心观点又为以后中世纪的经验哲学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利用。在教育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育要适应人的自然发展的教育思想，这一思想奠定了后世资产阶级的“遵循自然”教育思想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关于教育的年龄分期也基本上和人体发展相适应，其和谐发展的思想，特别是他提出的“文雅教育”，以及其他许多教育见解，都对后来的欧洲的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4.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教育概况

希腊化时期，从时间上说，一般是指从公元前 334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前 323）东征开始，到公元前 30 年埃及托勒密王国被罗马灭亡为止。马其顿位于希腊北部，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形成国家，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经过腓力二世的政治军事的大力改革，开始强大起来，并于公元前 338 年击败希腊联军，统治了希腊各邦。不久，腓力被刺身亡，由其子亚历山大继位。亚历山大继位后，首先平定了国内的叛乱，继而于公元前 334 年率大军开始东侵，先后征服了包括希腊在内的地中海东岸、西南亚的大部和非洲的埃及等地区，在短暂的 10 年时间内，建立了地跨欧、亚、非洲的亚

历山大帝国。但是帝国难于巩固，亚历山大死后，很快瓦解分裂为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国和埃及托勒密王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希腊的文化教育广泛传播到了被征服的广大地区。

（1）希腊后期教育的发展变化

从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开始东征，至公元前 146 年希腊本土被罗马吞并，这段时期是希腊历史的后期阶段。希腊无论是在后期阶段，还是在整个希腊化期间，与它前期的文化教育比较都有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在希腊本土，以雅典教育为例，与公元前 5 世纪的教育比较，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希腊本土被马其顿统治后，随着城邦独立性的丧失、奴隶主民主政治和经济繁荣的衰落，雅典原来那种以贯穿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忠于国家、勇敢善战、和谐发展的公民为主要的教育目标发生了改变，这个变化突出表现在教育内容上。中小学教育，虽然学制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但在教育内容、科目上都和过去不同了。初等教育方面，智育受到重视，读、写、算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体育和美育的地位下降了。体操学校和音乐学校逐渐由文字学校代替，文字学校或文字教师的地位待遇得到提高。中等教育，文法学校日益代替体育馆教育，学习内容有文法和修辞。文法包括文学和诗歌，修辞包括作文和演讲。教学内容还有算术、几何。这一时期学校设置和组织管理进一步加强完善。过去私人办理的学校，大部分也改为公立。高等教育方面，过去由于保卫城邦和对外作战的需要，军事体育训练曾经占据主要位置，是教育的重要内容。现在，随着城邦政治独立的丧失，军事训练已失去意义逐步被取消，发展学生身体是体育的主要任务。埃弗比团的单纯军事训练的性质已过渡到军事和学园相结合的教学。埃弗比成员可同时去学园和修辞学校学习。受训时间也从 3 年或 2 年缩短为 1 年。参加条件也已从必须训练改为自愿参加。训练的对象范围扩大，不仅有本国公民，而且有外国青年受训，这种情况说明埃弗比教育完全局限于雅典人已被打破，也成为外国青年来雅典求学的一部分。

希腊化时期，雅典的高等教育变化发展还表现在一些哲学学校和修辞学校逐渐合并、发展为高等学校。古代希腊著名哲学家们创建的哲学学校和修辞学校，到公元前 200 年左右，形成了教育史上的所谓雅典大学。这所大学实际上是下面几所独立学校的总称，主要包括：公元前 392 年苏格拉底创办的修辞学校、公元前 386 年柏拉图建立的阿加德米学园、公元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开办的吕克昂哲学学校。这几个学校的开办都是比较早的。还有，公元前 308 年斯多葛派芝诺创办的哲学学校、公元前 306 年伊壁鸠鲁设立的学园。伊壁鸠鲁（约公元前 341—前 270）和芝诺（约公元前 336—前 264）分别创立了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哲学派别，他们在雅典兴学校、收门徒教育青年，在希腊化时期影响是比较大的。雅典大学教学内容主要有哲学和修辞学。教学多由著名学者任教，校内学派林立，学术空气浓厚。学生来自希腊、罗马和西亚各地。这所大学存在了好几百年，直到公元 529 年东罗马帝国（拜占廷）的查士丁尼皇帝下令禁止一切哲学和法律讲座，学校才被迫停办。雅典大学对传播古代希腊的文化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希腊文化教育的传播

在希腊化时代，随着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

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大量的希腊人离开本土，移居到东方各地。在这些希腊的移民中间，有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还有一批教师。正是这些知识分子把古代希腊文化带到了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埃及等广大地区，使希腊文化迅速地传播到整个东方，并与发展中的东方文化融汇成崭新的希腊化文化。雅典哲学、文学和希腊的艺术，与东方自古以来很发达的数学、天文学和萌芽期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了。

当时在亚历山大帝国境内，一些城市完全希腊化了，在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人们一般都以希腊语作为公共语言使用。这一时期，希腊民族的概念也扩大了，它不再仅仅局限于爱奥尼亚地区数以百计的城邦，凡是能说希腊语，受过希腊式教育的人都可称为希腊人。希腊的教育，特别是雅典型的学校教育制度被广泛移植到东方不少国家。在希腊化的许多城市中，建立了希腊式的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在这些学校，不仅把希腊的“三艺”和“四艺”列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还把已经发展和分离出来的自然科学也作为教学的科目。不少希腊化的城市，如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拍加摩斯、叙拉古扎等，皆设有博物馆和图书馆。

在希腊文化教育的传播过程中，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化繁荣和学术成就。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远征埃及，战后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城，后成为托勒密埃及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城街道宽阔，骑马和乘车都很方便。最阔的街道二条，每条有一百尺阔，彼此交错成直角。城中建筑华丽，有壮丽的公共庙坛和王宫，这些宫殿占全城面积的1/4甚至1/3。王宫的一部分就是那有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亚历山大里亚港口建造的著名的灯塔，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城市在希腊化世界享有盛名，它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帝国的商业繁华的都市，也是地中海与东方各国文化、教育、科学和艺术交流的中心。在这里，希腊后期文化教育以及科学诸方面都得到了不同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在亚历山大里亚城，有许多民族的居民，住着埃及人、希腊人，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腓尼基人、犹太人和罗马人，贸易和文化的发达吸引了各地商人、学者和诗人。希腊化国家的大批学者来到这个城市从事研究工作，有利于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传播。公元前3世纪中叶，亚历山大里亚城建成著名的博物馆，逐渐成为一个研究院和最高学府，是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教育史学家誉它为亚历山大大学。博物馆分文学、数学、天文和医学四部，这四部既是研究所也是大学的分部。博物馆建有图书馆。馆内藏有各种文字，包括希腊文、犹太文、埃及文、希伯来文、波斯文在内的书籍和手稿达70万册，供世界各地学者使用。古代希腊的各种经典著作，和在各地找到的学者手稿，以及一部分东方的典籍几乎都收藏于此，很多名著被译成希腊文，这些图书都是煞费苦心从世界各地搜集而来。博物馆内还建有植物园、动物园、化学实验室、天文馆和解剖学展览室，经常举办哲学、语言学、修辞学、文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各种讲座活动。学者们在博物馆自由地从事各方面的学术研究。渴望受到高等教育的各国青年来到这里，跟随学者们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学生人数最多时竟达到14000名之多。

希腊化时期的自然科学有明显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这是和亚历山大里亚所进行的国际贸易和频繁的东西交通是分不开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又加上战争和建筑的需要，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研究。

这一时期，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和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欧几里德（约公元前 330—前 275），曾于古埃及王托勒密索特尔一世时，在亚历山大里亚执教，在此建立了他的几何学体系。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成著名的《几何原本》13 卷，其中第 1—6 卷论平面几何、第 7—9 卷论数的理论、第 10 卷论无理数、第 11—13 卷论立体几何，从而奠定了古典几何学的基础。阿基米德（公元前 287—前 212）是一位近代型的物理学家。他从西西里岛来到亚历山大里亚接受教育，作为学生和研究者，在物理学方面有很多发现，如杠杆原理、浮力原理等的发现。他还是希腊人中第一个把数学与实验研究结合起来的科学家。希帕克于公元前 160—前 127 年，在罗德岛和亚历山大里亚工作，他在前人研究天文学的成果上，判定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系统理论。他的体系以后又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另一位学者托勒密加以阐发。这样，地球中心论就成为天文学的权威理论，继续到 16 世纪哥白尼学说的出现。赫罗赫拉斯和埃拉西斯特拉特在人体解剖学和医学方面作出了贡献。斯特拉波撰写的 17 卷《地理学》一书在希腊化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欧洲中等学校地理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对这一历史时期科学的发展作出评价，他说：“对于自然界的精密研究，是在亚历山大时代才由希腊人开始发展的。”

由上述我们已经不难看到，希腊化时期的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巨大的发展。而在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与希腊前期比较，希腊化时期没有什么独创性的东西。但是，希腊化的几个中心城市，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在保存希腊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上作出了贡献。希腊文化主要是从亚历山大里亚经过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于纪元 641 年占领了这座城市）传播到中世纪的欧洲。学者们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收集、整理、研究和注释工作上，仅以这点而论其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象阿里斯塔芬和阿里斯塔库斯二位著名的学者，是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第三任和第四任的负责人。他们曾对荷马史诗和其它的希腊诗作了精细的研究。阿里斯塔库斯的评注达 800 卷之多，他还为建立文法学科体系作出了贡献。普罗塔哥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在文法方面作过不少的研究，但是，直到阿里斯塔库斯，才把词分为名词（包括形容词）、动词、分词、代词、冠词、副词、介词和连词 8 大类，文法科学体系才以这种形式确定下来。

希腊化时期，希腊和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东方各国经济和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古代西方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接触。这段时间，希腊奴隶社会已经进入腐朽没落的阶段，自从雅典政治独立丧失后，以它为代表希腊文化也开始了凋敝的过程。但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及其后继者，使高度发展的希腊文化进入了被征服的地区。这一时期，文化教育的中心也从雅典移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希腊的学者们在亚历山大里亚受到托勒密王朝的特殊照顾，取得了学术上的成就。如果没有埃及的繁荣为亚历山大里亚这一文化中心提供物质基础，没有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在沟通东西文化遗产中发挥的作用，学者们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5. 古代希腊体育及其历史影响

（1）古希腊人重视体育

古希腊人是热爱体育运动的民族，体育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希腊人之重视体育运动，其原因从社会传说推测，可能是因为体育和军事技术有相关联系。在原始社会末期，实行军事民主制组织管理，战争和掠夺是社会生活中经常的事情，需要健壮的身体和军事技术，也就成为人们，特别是那些部落首领应具备的主要品质。因此，体育运动便很自然地受到古希腊人的重视。从荷马史诗中可以了解到，在那个“英雄时代”里，希腊人就把体育运动看作是增强体质和娱乐人灵魂的活动。公元前8世纪以前，古希腊就已盛行拳击、角力、赛跑、射箭、投枪、掷石饼和战车赛等竞技活动。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逐步开始正式训练儿童和青少年，并让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古代中期公元前8世纪以后，希腊形成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在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体育作为这两个城邦教育内容所占的地位和作用。这里，从体育教育角度出发，再就斯巴达和雅典的体育状况多说几句话。斯巴达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利益，教育由国家负责进行，培养训练青少年成为一名合格的勇敢、坚韧、绝对服从和无所畏惧的军人则成为教育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愿望，斯巴达城邦国家从每一个婴儿出生那一天起，直至他二三十岁成为军人取得公民权为止，要进行有组织的一系列的军事体育训练，以培养军人应具备的品质。即使成年结婚以后，也还须继续在兵营服役，一直到60岁。在20—60岁期间出于军事的需要，斯巴达男子几乎都过着军营生活，按照规定天天进行身体训练。在进行日常训练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年龄特征，训练内容有：跑、跳、角力、拳击、击剑、掷铁饼、掷标枪、游泳、骑马、狩猎、徒步旅行、球类比赛，还有和军事相结合的舞蹈等。由于斯巴达人一生都在进行军事训练活动，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保持优胜的地位，从公元前720年开始曾达一个多世纪之久。雅典和斯巴达一样注重体育，但由于教育目的不同所使然，雅典体育已不单纯是为了军事需要，更重要的是培养青年一代的身心和谐发展，体育和音乐教育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两项重要的内容及保证措施。因此，体育和德育、智育、美育是结合进行的。但是，自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之后，随着雅典经济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人们开始热衷于文化知识学习，而对青少年身体的关心慢慢地淡薄。此时，雅典的市民享乐气氛充斥，喜欢观看竞技表演，却对本身的体育锻炼日渐忽视。这样，就使竞技走向专业化，而普遍的体育活动逐渐衰落下来。

（2）古代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盛会

世界性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起源于古代希腊，希腊人在公元前776—公元393年之间共举行了293次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盛会。这是希腊民族在人类体育发展史的光辉篇章，也是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

据传，古希腊人为了供奉神灵便筑起神坛，在坛前燔祭他们所杀献的牲畜，同时举办庆祝活动，伴随有颂歌和舞蹈。以后，他们又建筑了坛场和大庙。在规定的时刻，希腊人汇聚一起在庙坛举办庆节，祭神的庆祝节日活动，后来又增加了体育和竞技的内容。这可能是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雏型。传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由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所创始

的。

古希腊各城邦经常在祭神庆节举办运动会，规模比较大的有：奥林匹克、伊斯特摩斯、皮托、尼米亚。其中，最负盛名和影响最大的是在奥林匹亚地方举行的运动会，即奥林匹克运动会。

古代希腊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由伊利斯国王爱菲特斯发起召开，公元前 776 年，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奥林匹亚的地方举行。自此开始，以后每 4 年举行一次，会期一般定为 5 天。在奥运会进行期间，按照规定，各城邦之间相约“神圣休战”，停止战争，故奥运会的召开又象征着和平。这时候，从希腊各地来的人们汇聚奥林匹亚，他们当中不仅有运动员，还有哲学家、讲演家、艺术家和诗人。比赛期间，既有规模宏大的音乐、戏剧文娱表演，也有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和讲演家发表的祝辞。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的基本条件要求是纯希腊血统并获有公民权的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初竞赛项目主要有赛跑和角力，以及拳击、战车赛等。在奥林匹克竞技中，跑占有重要的位置，赛跑按“斯泰德”计程（1 个斯泰德约相当于 185—225 米），最初只有短跑（1 个斯泰德），以后逐步增加了往复跑（2 个斯泰德）、长跑（7—24 个斯泰德），还有武装赛跑和火炬赛跑。短跑有预选赛，可能还按年龄和身体状况分组，跑的姿势已和今天大体相近。竞技的胜利者被戴上橄榄枝编成的花冠，雕塑家要为他雕像，还要在其家乡举行庆祝活动，热烈欢迎运动健儿归来，每个人都为自己城邦获得优胜的参赛者引以自豪。所以，对古希腊人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是一次民族重大的节日活动，具有全希腊的意义。

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从公元前 776 年开始，到公元 393 年共举行了 293 次，时间持续了一千年之久。后来，由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信奉基督教，禁止其他异教活动，便以奥林匹克与基督教相抵触，下令废止运动会，并且破坏了奥林匹亚的建筑物和运动场地的设施，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至此结束。

随着近代体育的兴起，恢复奥运会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望。1888 年，法国教育家 P.de 顾拜旦（1863—1937）提出恢复奥运会的建议，并在 1894 年由他主持在巴黎召开了国际体育会议。这次会上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致同意在国际范围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委托希腊作第一届国际奥运会的筹备工作。1896 年近代第一届国际奥运会在雅典举行，以后每 4 年举行一次。由此，揭开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新篇章。

（3）马拉松长跑的起因

今天，马拉松长跑的比赛运动也是起源于古代希腊。

公元前 492—前 479 年之间，波斯帝国企图控制霸占爱琴海地区，发动了对希腊的侵略战争，史称希波战争。波斯国王大流士三次派兵入侵希腊。继第一次失败后，便于公元前 490 年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入侵。雅典和波斯两军在马拉松平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马拉松平原在雅典城东北，是一个三面环山的河谷。雅典士兵在将领米太亚德率领下，机智勇敢、以少胜多，在马拉松大败波斯军队，最后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辉煌胜利。

马拉松之战后，为了尽快地将希腊人取得的这个胜利的喜悦传给全体雅典人民，米太亚德决定派善于长跑的战士菲迪皮茨赶快回雅典报捷。于是，菲迪皮茨不顾战时的疲劳，带着身上的血迹，立刻从马拉松动身。他以惊人

的毅力，最快的速度，一直跑到了雅典城的中央广场。当他向聚集在广场上的盼望胜利消息的人们激动地宣布：“我们胜利了，大家欢乐吧！”之后，随即倒在地上，英勇地牺牲了。

为了纪念这位菲迪皮茨战士的英雄事迹，在雅典近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首次举行了马拉松赛跑。参加这项比赛的运动员，从马拉松起跑，大体沿着菲迪皮茨当年跑的路线，到达雅典城，全程 40 公里。1920 年，人们又对马拉松到雅典的这段路程作了比较精确的测量，确定为 42.195 公里。从 1924 年第 8 届奥运会起，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就把这个距离（42.195 公里）正式规定为马拉松跑的标准距离，一直沿用到今天，成为目前世界各国通用的马拉松长跑的距离。

（4）古希腊教育家论体育

古希腊的教育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重视体育，并且对体育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过探讨。体育作为教育的内容，成为他们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苏格拉底认为，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需要用身体的，所以要尽可能使身体保持最良好的状态是非常必要的。他自己就很重视体育锻炼，为了准备应付任何严峻的考验，苏格拉底天天早晨跑到广场锻炼身体，以培养忍受饥渴、酷热、严寒和疲劳的能力。他不仅自己重视体育锻炼，而且教育人们锻炼身体增进健康，反复告诫青年要为保卫城邦积极地去锻炼身体。有一次，当他看到青年艾皮根奈斯身体很不好，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艾皮根奈斯，你的身体多么缺乏锻炼啊！”随即向他讲述了身体健康对一个人的重要性，雅典人随时可能与敌人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战争的危险时刻，如果身体虚弱就可能丧生，或被俘而成为奴隶，或者可耻地偷生。

希波战争以后，富裕起来的雅典人不再向从前那样重视军事体育锻炼。为此，苏格拉底及时教育青年，他说：“不要因为城邦没有正式规定军事训练，就自己也疏忽起来，而是应该更加注意锻炼才是。应当明确知道，无论是任何其他竞赛或任何事业，把身体锻炼好总不会吃亏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体育锻炼对于人的精神大有好处。在思维活动中，健康的身体也是必要的。许多人“由于身体不好，健忘、忧郁、易怒和疯狂就会经常猛烈袭击许多人的神智，以致他们把已获得的知识全部丧失净尽”。但那些身体健康的人却有充分的保证，他们不会遭受由于身体不好而受到危险，相反，由于身体健康很可能获得和身体衰弱完全相反的有益效果。

柏拉图在从事教育研究活动过程中，重视体育教育所引起的作用，体育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主张身心和谐发展，强调“用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柏拉图提出 7—12 岁的儿童进国家学校，学习文化基础知识；12—17 岁进体操学校学习游戏、舞蹈、角力、掷铁饼、投枪、赛跑、射箭、骑马等；17—20 岁的青少年仍然要继续进行体育锻炼。通过这些体育训练，培养勇敢高尚的品德和优美强健的身体。他并且认为，妇女也需要体育锻炼，指出：女孩应该练习舞蹈和角力，结婚以后，便要参加战斗演习、行营布阵和使用武器，这样，一旦当全部的军队出征打敌人的时候，

《回忆苏格拉底》，第 131 页。

《回忆苏格拉底》，第 132 页。

她们就能保卫儿童和城市。柏拉图关于体育教育的思想内容丰富，除在其教育思想体系占有一定位置，他还抨击当时雅典出现的竞技主义和竞技职业化的倾向，批评人们轻视体育的思想和态度。认为体育应该包括教育手段和健康术。柏拉图这些丰富的体育思想对后世的体育发展都很有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教育史上第一个主张按年龄分期特征进行教育的人，强调对儿童实施体、德、智、美和谐发展的教育。他认为，智力的健全要依赖于身体的健康，所以体育应该先于智育。开展体育训练，对于培养儿童的勇敢和坚强的意志会起积极的作用。在对儿童具体实施体育锻炼时，要求学前儿童身体锻炼应是逐渐的，到了初等教育时期，儿童除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习体操和唱歌，“对于儿童们，这些操练应该是一种比较柔和的，避免粗劣的膳食和痛苦的劳作，庶使身体的生长不受损害”。在体育实践中，亚里士多德强调养成健美的体格而不是野蛮的兽性的体格，“应该把高贵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兽性的东西，放在第一位”。他还主张根据每个儿童不同的体质特点选择合理的方法因材施教，而对那些身体还没有发展健全的儿童要采用运动量比较小的活动来锻炼身体。亚里士多德的体育思想，对后来体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第 111 页。

《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第 111 页。

三、古代罗马王政和共和时期的文化教育

古代罗马在欧洲是继古希腊之后的又一个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它最初是意大利半岛中部的一个很小的城邦国家。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罗马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一个大帝国。古罗马的历史，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

王政时期，约公元前753—前509年；

共和时期，约公元前509—前30年；

帝国时期，约公元前30—公元476年。

古代罗马在吸收古希腊文化教育成果的基础上，其文化教育也曾取得了许多成就。希腊的文化、教育，又主要是通过罗马，对后世的欧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古代罗马在世界文化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1. 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罗马社会和早期文化

古代罗马国家建立在意大利半岛。地中海中部意大利半岛，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亚平宁山脉纵贯半岛南北。北部有肥沃的波河平原，为主要农业区。东部地区背山面水，宜于畜牧。西部也有一些平原，适于农耕。南部和西西里岛地势也有利于农牧业。意大利半岛上有不少河流，以波河和第伯河为主要河流。古代罗马城邦就建立在第伯河边。

远在旧石器时代，意大利半岛上就有居民生产活动。据说，利古里亚人是意大利半岛上的最早居民，大概是从非洲经过现今的西班牙和法国一带移民到这里。约当公元前5000年左右，意大利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2000年代初（青铜器时代），意大利人的祖先从东北方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他们操印欧语结成一些部落，拉丁人就是这些部落中的一支，遂定居在中部的拉丁平原。公元前1000—前800年间，意大利进入了铁器时代。考古发掘调查表明，从公元前8—6世纪，拉丁部落联合、归并其他部落，在第伯河口建立了罗马城，并逐步发展形成古代罗马城邦。

根据传统的说法，罗马史的最古时期通称“王政”时期，时间约从公元前8至前6世纪，这一时期大约有250年。这是罗马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

罗马在“王政”时期，大约有七个王朝统治罗马。第一、三王是拉丁人，第二、四王是萨宾人，后三个王是伊达拉里亚人。这一时期，罗马有300个氏族和3000个家族。每10个氏族结成一个胞族，称为库里亚。每10个库里亚组成一个部落，称为特里布斯。这样，有30个胞族组成了3个部落。每个特里布斯就是一个特别的部落，共同构成罗马人民整体。当时，罗马的社会制度和管理机构类似古希腊荷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大体情况如下：由所谓王、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管理公共事务。此时，罗马国王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审判长，由人民大会选举产生。其权力有限，可以罢免，还没有掌握民政方面的权力。氏族首长组成元老院，作为国王的咨询机关，和王一起处理公共事务，预先讨论向人民大会提出的重大问题。人民大会按胞族召开，称为库里亚会议，是罗马王政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大会权力极大，可以通过或否决重大问题，选举包括王在内的一切高级公职，决定战争与和平事宜，并对判处死刑的案件作最后裁决等。恩格斯在谈到罗马早期的这种社会

制度和组织时，指出：“象英雄时代（即荷马时代——著者）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政时代也生活在一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之下。”

公元前7世纪，罗马社会生产力发展，铁器普遍流行使用，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农业方面，铁制农具普遍使用。手工业也开始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出现了木匠、铜匠、陶器匠和皮匠等手工业者。交换和集市贸易日渐发展，交换的媒介物已使用铜块代替牲畜作为衡量的标准。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为私有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时，罗马氏族社会走向解体，富有的家族形成了氏族贵族，攫取氏族的土地和财富。破产的氏族成员受到贵族的保护，成为所谓“被保护人”，贵族变为庇护者。这样，在罗马氏族社会内部开始分化，除氏族贵族外，产生了广大日益受贵族剥削和奴役的阶层。除被保护人外，还有外来移民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被称为平民。他们人身自由，不属罗马氏族成员，没有政治权利，主要从事个体农业劳动、手工业和小商业。很多平民向贵族租地借债，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公元前六世纪，罗马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财产的扩大，阶级分化的加剧，平民和氏族贵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

到王政时期的第六个王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约公元前578—前534年）时，他依靠平民的支持进行了重大的社会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罗马居民，不论贵族和平民，按财产标准分为五个等级。不列入等级者的称为“无产者”，每个等级建立军事百人团；第二，设立百人团会议，凡是能服兵役者均可参加。会议获得库里亚会议的许多权力，表决时以百人团为单位，原来的库里亚会议至此丧失意义；第三，整个罗马按地区分为四个区域，代替先前的三个氏族部落的划分。关于罗马王政时期的这次社会改革，可能不是一时全部实现，也不一定成于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一人之手，史称这次改革为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改革。通过这次改革，“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真正的国家制度。”罗马社会的这次改革，其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

公元前6世纪末，罗马王政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是伊达拉里亚人塔克文。由于他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罗马人的反抗。贵族反对伊达拉里亚人破坏了他们的特权，平民也不满意当时的苛捐杂役。还有附近的拉丁城市也起来反对异族的统治。约当公元前510年，罗马爆发了反抗伊达拉里亚统治的斗争，塔克文政权最后被推翻，罗马王政时期至此结束。从公元前509年起，罗马社会进入了共和时期。

罗马社会在王政时代，人们的思想生活和精神文化还是很原始的。古代罗马人认为每一件事物和每一种现象都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神。比如，人在幼年时期，有婴儿呱呱堕地神、摇篮神、最初学步神等等。氏族崇拜和家族崇拜起着很大的作用。善良的精灵——家神和守护神被当作家庭和房屋的守护者。罗马人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文字。据传，罗马人的字母表，是从住在亚平宁半岛西部沿岸库麦地区的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公元前一世纪末，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6页。

史家哈利加纳苏人狄奥尼索斯曾说，他亲眼见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同拉丁城市签订的关于出资在阿温提努姆山上修建狄爱娜神庙的协定。这一协定刻在了铜柱上，协定原文的字母形似古代希腊文字。1900年在罗马集会场发掘出土的带有古体铭文的黑石，上面刻有犁耕体铭文，字母的形式也与希腊字母相近似。这些情况说明，罗马早在王政时期已经有了文字。文学创作在这个时期也萌芽了。罗马人和其他民族同样，有了民间诗，但可惜最古的民间诗文没有流传到今天。在较晚的史料里，有一些出自远古的宗教赞美诗的片断。至于罗马人的教育实践活动，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可靠史料极少，更加难以稽考。因此，关于古代罗马教育，我们只能从王政时期以后的共和时期教育谈起。不过在罗马共和早期教育中，还保留着相当的氏族至王政时期的残余影响。从共和早期的教育情况，我们可以倒溯推测罗马王政时期教育概况，对下一代的教育主要靠家庭教育来进行。

2. 罗马共和时期的文化教育

公元前509年，罗马建立了共和国，由此到公元前1世纪后期（前30年），为罗马共和时期。从共和时期开始，罗马进入了奴隶制社会。罗马共和时期的文化教育，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一般又分为共和早期（公元前3世纪以前）和后期（公元前3世纪后）两个阶段。

（1）罗马共和早期的文化教育

罗马共和早期还是一个很小的城邦国家，仍旧保留着王政时代的社会经济特点，且还有不少氏族公社的生活传统。公元前3世纪以前，罗马经济以农业为主。

罗马共和早期，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经济生活还相当原始，带着自然性和闭塞性。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种植谷物、蔬菜，饲养牛羊和猪。农业生产成为共和早期罗马人生活的主要来源。罗马人基本上是农民。罗马在共和时期以至帝国时期一直在对外进行扩张，战争相当频繁，连年的对外战争使罗马人负担沉重。罗马平民不仅要在农村公社进行生产劳动，还要到军队中去服兵役参加征战。罗马共和早期的这种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它的教育目的和性质是农民——军人的教育。罗马人要完成生产和打仗两方面的职责，需要接受作农民和当军人的教育。前文已述，罗马在王政时期已经有了文字，但这时可能还没有出现学校，即使有学校也很简陋是初级学校，学校在儿童教育中不占重要地位，对少年儿童和年轻一代完成农民——军人性质的教育主要是靠家庭教育。

罗马在共和早期的农村公社范围内，其家族具有一种特有现象。这就是家长制家庭的出现。当时家庭既是经济单位，也是教育单位，按照古罗马人的看法，家长对家族成员有无限的权威，有权决定家族成员的生死。父亲在家庭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对子女操有生杀大权。父亲的权利有：（1）关于对畸形和残废儿童立即灭绝的规定；（2）父亲对他的子女一生的管教、鞭打、禁锢，令其带着锁链进行农事劳动，将其出卖或杀死。就是其子辈身居高位，父亲也有以上权利；（3）儿子三次被父亲连续出卖，最后就脱离了父亲的控制。（4）生父死后，超过10个月出生的孩子，不再视为合法的儿童。这些规定见诸于罗马十二铜表法。可见，儿童出生以后，首先由父亲决定生

存还是遗弃。那些取得生活权利的1—7岁的男儿童，则由母亲在家庭内负责教养。7岁以后开始区别，男孩教育主要由父亲承担，女孩继续留在家中接受母亲的教育，学习家务。

家庭教育的主要方法，承袭了氏族至王政时期教育传统。在作农民的教育方面，男孩从7岁开始至16岁止，要跟随父亲学习生产劳动知识和耕作技术，在田间进行实地的农事操作练习，学习耕种、收割。他们之间即是父子，也是师徒般的关系，孩子围绕父亲形影不离，并跟随父亲到各种公共场合活动，学会生活的本领。在作军人的教育方面，男孩要从父亲那里学习军事知识。父亲教孩子学习骑马、角力、游泳和各种武器的使用。男孩到16岁，成为罗马公民，开始服兵役。教育的内容，文化教育所占比重很小，为了计算帐目和测量田地，儿童也学习点简单的读、写、算文化知识，算术中包括一些简易的几何、测量等。这些文化知识也由父亲来教授儿童。

罗马的家庭教育还重视对儿童的道德和公民的教育。父亲要教育孩子怎样敬神、爱国、孝亲、守法，祖先的显赫事迹和英雄人物故事成为对儿童进行道德和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注意培养儿童的勤劳、节约、朴实的农民品质。十二铜表法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十二铜表法是罗马制订的维护奴隶制的法律，制订于公元前451—前450年。这些法律条文刻在十二铜表上，故称为十二铜表法。法律条文表明了罗马古代生活和教育的精神和理想，成为罗马公民必读的“教科书”。在家庭教育中，父亲要教育孩子记诵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儿童们必须熟记这些法律条文，以养成守法习惯和遵法的观念。因此，每个男孩从童年起就必须学会咏唱它，如同咏唱原始的战斗诗歌，以赞美其祖先一样。这种法律的学习，构成了罗马早期教育中的组成部分，和儿童学习的重要内容。

以上是罗马共和早期文化教育概况。

（2）罗马共和后期的文化教育

从公元前3世纪以后，到公元前30年之间，是罗马共和的后期阶段。在这一时期，古代罗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外侵略使罗马的版图扩大、奴隶制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罗马的文化教育也同时得到了发展。

罗马共和后期的社会与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罗马共和国建立以后，平民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在经济方面也不能参与国家公有地的分配和使用。在罗马共和早期，平民不断掀起争取政治权利，争取土地，反对债务的斗争。经过两个世纪左右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罗马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取得的结果，集中表现在：第一、平民陆续争取到一定的权利。诸如，可以充任官职担任保民官，有权否定贵族统治集团侵犯平民利益的决定，平民也可以与贵族通婚，打破了旧的氏族的界限，消灭了罗马氏族的残余。第二、随着债务奴隶制的废除，债务减免和少量公有地的分配，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得到暂时缓解，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命运。第三、在平民和贵族斗争过程中，罗马有公民权的人数增加，加强了罗马国家的阶级基础，罗马共和政体逐渐完善。罗马国家机器的加强，为它的奴隶制度的发展和对外扩张准备了条件。

罗马建国的时候，还是第伯河畔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但对外奉行扩张侵略政策。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到公元前3世纪对外发动了一连串战争。首

先，罗马同周围一些城邦国家进行了多次战争，获得了大量土地和奴隶。公元前4世纪中期和3世纪初，罗马又打败了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萨莫奈人以及希腊移民城邦，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一跃而为西部地中海的强国。之后，罗马继续在地中海沿岸对各国进行侵略。为了争夺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它与迦太基在公元前264—前146年进行了三次战争，历史上称布匿战争。最后，罗马打败了迦太基，获得了大片的领土，迦太基地区被划为罗马阿非利加省。罗马在和迦太基战争的同时，又征服了马其顿王国，并把它划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公元前2世纪中叶，最后扑灭了希腊人的反对罗马的斗争。这样，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罗马终于取得了地中海的霸权。在长期对外侵略过程中，罗马从被征服地区掠夺了巨额的财富、强占了广袤的土地、海港和矿山，也俘获了众多的奴隶。这些都为罗马奴隶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使它的经济能够迅速发展。奴隶数量的急剧增加，也为在工农业生产上需求大批的劳动力提供了来源，愈来愈多的罗马公民大量移居城市。罗马共和后期，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日益发达兴盛和繁荣。

罗马共和后期受到希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这时，希腊化时期已经开始，希腊文化象滚滚的洪流一样涌入罗马。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融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罗马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进一步提高公民的文化教育素养，而共和早期的培养农民、军人的家庭教育显然不适应了。罗马与希腊（主要是雅典）一样，是奴隶主共和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希腊文化教育适应了罗马的政治、经济基础。因此，希腊的文化教育便在罗马受到普遍的欢迎。这表现在：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希腊后，希腊的大批教师来到罗马办学，其中包括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担任学校教师和其他文化工作。此后，罗马学校逐渐按希腊学校模式建立起来。希腊语不仅成为罗马学校的教学用语，而且是罗马贵族和社会上层通用的时髦用语，能否熟练地使用希腊语，是衡量有无教养的一个标志。学校的课程也仿照希腊学校设立，教学用书是用希腊文书写的。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建立了起来，希腊教师在各级学校任教，有的还成为罗马贵族的家庭教师，教师地位提高倍受罗马人尊敬。罗马人还仿效雅典办法由“教仆”陪伴贵族儿童上学。这时希腊的哲学、文学、科学和艺术在罗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罗马共和后期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希腊文化教育的全面影响，所有这一切促进着罗马学校教育的建立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罗马学校教育制度体系。

罗马学校教育制度体系。

初等教育 罗马共和后期，7—12岁的男女儿童要入小学，接受初等教育。

罗马小学校在共和早期可能出现，但数量很少，是作为家庭教育的补充辅助形式存在。小学教育到共和后期得到普遍发展。

罗马小学都由私人开办，要收取较高的学费，入学者是富家子弟，一般平民的儿童难以入学。校舍很简陋，或设在寺庙里，或在简陋的棚子里，有的甚至在露天上上课，也有的设在家庭中。教师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多由奴隶充任，希腊人一般不愿意教这类学校，个别希腊人开办小学，其收费要高于一般小学的4倍。

罗马小学的教学内容重视文字教育，主要课程是读、写、算，还要学习十二铜表法。共和早期儿童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是由家庭父亲承担的，现在

主要由小学教师来完成。音乐和体育在罗马小学中没有位置。教学方法是机械背诵，还要伴之以野蛮体罚教育。罗马小学已有节假日的规定，8天休假一次，7月底至10月中放暑假。

罗马贵族家庭不愿把子女送入小学，便在家里雇佣家庭教师教育儿童。一部分贵族家庭儿童入小学，也学习希腊人的办法，由教仆伴随儿童上学。

这是罗马共和后期初等教育情况。

中等教育 罗马共和后期，儿童在上完小学之后，12—16岁的少年要进入文法学校，接受中等教育。

文法学校是比小学高一级的学校。这类学校也是由私人创办设立，收取更高的学费。入学者多为奴隶主贵族子弟。文法学校教师地位比较高，被称为文法学家或文学家，收入也丰厚。文法学校，最初多由希腊人主办，所以这类学校亦称为希腊文法学校。

文法学校的教学内容，在希腊人办的学校里主要学习希腊语和希腊文学，教师多由希腊人承担，教学用希腊语授课，教材用希腊文编写。如此重视希腊语言文字，原因是罗马征服希腊后，希腊文化迅速传入罗马。希腊语成为罗马贵族的语言，这是贵族子弟应必备的。公元前100年在罗马出现了第一所拉丁文法学校。随着罗马文学的成长，拉丁文法学校也迅速发展。于是，在罗马共和后期便出现了希腊文法学校和拉丁文法学校两种学校。儿童可同时进这两种学校，学习希腊文或拉丁文。希腊文法学校要学习荷马史诗和希腊其他作家的作品。拉丁文法学校要学习西塞罗等拉丁文学。此外，还要学习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以及伦理知识，这些学科内容比较肤浅简单。拉丁文法学校不重视体育，甚至排斥否定体育，在这一点上与希腊教育完全不同。文法学校的儿童，在进入高年级后加学一些修辞学和演说术，为升入高等教育作准备。

文法学校教学方法是讲解和听写，儿童学习以背诵为主。学校管理制度纪律严格，实行体罚，有暑假和神农节、智慧女神等节假日的规定。

高等教育 罗马共和后期，16—20岁的青年进修辞学校学习，接受高等教育。这是比文法学校更高一级的学校。

随着罗马共和制的繁荣和发展，高等教育在实际上是演说家的教育。修辞学校开办的目的则是把贵族子弟培养成为演说家和雄辩家，以适应罗马国家政治的需要。青年在文法学校学习结束以后，准备参加和担任公职的贵族子弟便进入修辞学校。罗马共和后期，自由民与奴隶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贵族集团内部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这样从事政治活动就更加需要有演说的才能和本领来争取群众，影响平民。当时社会风尚流行的观点认为，是否具备演辩才能是衡量一个罗马人有无教养的重要标志，也是罗马青年在政治方面取得地位的资本。为了从事政治活动的需要，贵族子弟多拥入修辞学校学习。有的青年还要到雅典和其它东方文化中心去留学，学习更多更广博的知识。

罗马的修辞学校，开始从学习年限、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多仿照希腊修辞学校模式建设。教学科目有修辞学、辩证法、法律学、希腊语、数学、天文学、音乐和伦理学。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又出现了拉丁修辞学校。修辞学校教师多来自希腊，以后由罗马人承担。这些教师或是希腊的修辞学家、哲学家，或者是罗马人拉丁修辞学家。

罗马共和后期高等教育情况表明，至此全部教育的最高目的和培养目

就是培养演说家和雄辩家，这是由这一时期的政治所制约的。

3. 西塞罗及其教育思想

在罗马教育发展史上，西塞罗、昆体良和奥古斯丁是三位著名的教育家。西塞罗是共和后期的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代表，昆体良著《演说术原理》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演说家的教育，奥古斯丁的教育思想奠定了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理论基础，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和对以后西方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 年）是罗马共和后期的政治家、雄辩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他出身于富裕的骑士家庭，先后在修辞学家、法学家和斯多葛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学习，受到良好的教育。西塞罗青年时代参加军事训练服过兵役。他曾到雅典的哲学学校游学，在希腊接受了修辞学方面的训练，有机会向杰出的雄辩术教师请教，并且可以听到当时最出色演说家的演说。西塞罗受完教育之后，便开始从事律师的工作，继而步入政界。他以突出的雄辩才能和广博的知识，攀登到统治集团的上层领域。公元前 64 年，西塞罗在竞选中当选为执政官，公元前 51 年出任西里西亚总督，后因反对“三头联盟”的执政官安东尼而为其部下所杀。西塞罗的政治演说和他的作品，其特色用词优美而富有感染力，典丽的拉丁文体帮助了拉丁文学的发展，影响了罗马以及后来的欧洲教育。《雄辩术》一书是西塞罗教育思想的代表著作。

在哲学观点上，西塞罗是一位折衷主义者。他试图将柏拉图主义、斯多葛学派和怀疑论折衷拼凑结合起来，并加以通俗化，借以宣扬“灵魂不死”等观点。西塞罗认为，灵魂是永久活动的，而且是自动的，它永远没有完结，既不会分散，也不会消灭。灵魂能记忆过去，推测未来。在此基础上，西塞罗提出人有“天赋观念”，认为儿童的学习是唤起过去的记忆，很多知识在生前就已具备了。西塞罗在政治上思想保守，维护贵族共和制，认为由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三种权力相互牵制的罗马共和制是最合乎自然的理想国家。当希腊化教育在共和后期涌入罗马之时，在罗马教育界当中，有的坚决反对希腊文化教育；有的则绝对拜倒，主张全盘接受。但西塞罗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他说：“我们要向罗马学习道德，向希腊学习文化。”由此可见，西塞罗基本上接受外来的文化教育，但要求保存罗马民族的道德传统。

西塞罗以培养雄辩家作为教育的目的和罗马高等教育的理想，他在《雄辩术》和其他对话录中，对于这种培养雄辩家的教育思想，作了很好的描述，同时，也阐明了雄辩术训练的必要性。西塞罗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雄辩家。当时雄辩家的概念和内容含义比较广泛，政治家、军事家和法律家等也包括在内。所谓雄辩家是一个具有广泛教养的人，既有多方面的知识，又擅长雄辩演说才能。在西塞罗看来，只有好的雄辩家才能成为优秀的政治活动家，而好的雄辩家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一个名符其实的雄辩家，必须能够就眼前任何问题，任何需要运用语言艺术阐述的问题，进行演说，以规定的模式，脱离讲稿，伴以恰当的姿势，得体、审慎地进行演说。这是西塞罗对雄辩家的最本质的特点的描述，也是他给雄辩家所下的基本定义。

西塞罗为了达到培养雄辩家的教育目的，对于雄辩家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受教育的内容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西塞罗认为，作为一个雄辩家应该是：（1）要有广博的知识。为使雄辩家具有广博的知识，教育的课程有：雄辩术、文学、修辞学、历史、哲学和法学等。前面几种学科必须向希腊人学习，而法学是罗马人自己的学问。这些学科的学习都要围绕培养雄辩家的总目的来进行。比如，学哲学是因为在演说、辩论时常常会接触到哲学命题；学历史是为了提供史实先例以加强论据；学文学是为了使言词优美、动听，打动人心。（2）应具有修辞学方面的特殊修养。在言语修养上，雄辩家应表达正确、通俗易懂、优美生动、语言与主题相称。（3）应具有优美的举止和文雅的风度。演说是由身体、手势、眼神以及声音的调节及变化加以控制，它们对于演说本身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由上述可见，西塞罗提出培养一个名符其实的雄辩家的要求是很高的，而雄辩的艺术则是更为崇高的事情，它是由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多得多的各种科学和学问结合而成的。

在教学方法上，西塞罗指出：练习是雄辩术教育中将知识化为演说效果的主要方法，在培养雄辩家的教育过程中，它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最常用的练习是模拟演说。为了掌握辩论和演讲，可选用法庭的案件作为练习的题材，然后尽可能地逼真地发表演说。西塞罗还认为，掌握雄辩术最主要的练习还要写作，用写作来磨炼演说，使人得到敏锐的判断力和机智的表达能力。西塞罗在演说上独具风格特色，这是与他根据一定的规则写成的演说细心加工分不开的。他的每一篇演说都照例分成下列各个部分：引言、事件的叙述、下面的主要部分的大要、证明——演说的主要部分、主要部分的摘要和最后的结语。西塞罗演说涉及面极广，演说时轻快热情，拥有大量的词汇，利用同义语、譬喻、比较等等手法。罗马的雄辩术在西塞罗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以至后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也曾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语言并尽力模仿他。

西塞罗在雄辩家教育上，还十分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他认为，作为雄辩家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提倡在奴隶主之间讲究“人道”，要具备同情、仁爱、谦和与礼让等品质。在教育方法上，他还提出要注意环境的影响，教师对学生要宽严适中，不能滥用体罚。

总之，西塞罗生活于罗马共和后期，其教育思想反映了罗马传统教育和希腊文化教育思想互相渗透和结合的发展趋势。西塞罗在比较广泛的规模上使罗马有教养的社会认识了希腊文化教育。西塞罗的培养雄辩家的教育理论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他为培养雄辩家所规定的课程丰富了雄辩教育的内容，使之成为罗马共和后期的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后由昆体良继承并加以发展，对罗马乃至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欧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埃及和西亚两河流域的文化教育

世界上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是从东方开始的。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早于欧洲而出现，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这四个亚非文明古国被誉为世界文明的摇篮。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发展情况不一样，其文化教育也呈现了各自的民族特点。现在继续来探讨亚非地区这些有代表性国家的文化教育，以此反映世界古代中期东方文化教育发展的概貌。

1. 埃及的文化教育

埃及人民曾经创造了古代尼罗河文明，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是欧、亚、非三大洲的联结处。北临地中海，东北过西奈半岛与西亚相通，东是红海，隔海和阿拉伯半岛相望，南为努比亚（今苏丹），西接利比亚。尼罗河从南到北流贯全境，南部尼罗河谷地带称为上埃及，北部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区称为下埃及。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狭长的河谷区灌溉便利，谷产丰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赞颂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古代埃及居民大概是由北非的土著种族和西亚的塞姆人融合而成。古代埃及人体格壮大，肤色黝黑，头发黑而光泽。其语言属哈姆——塞姆语系中的一个语族。

埃及在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出现了许多最初的奴隶制小国，逐步进入奴隶制社会。这些国家长期战争和互相兼并后，形成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约在公元前 3100 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攻灭下埃及，统一了整个埃及，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即早期王朝。从此开始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大体经历了 31 个王朝。

古代埃及在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奴隶和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在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这些成就内容包括文字、文学艺术、学校教育、数学、天文、历法、医学、航海和地理知识等。在这里，我们且略述它的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的概要。

（1）文字和学校教育的出现

在文字方面，古代埃及文字产生是很早的。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古代埃及的学校教育也比较发达，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学校。

文字和书写。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古代埃及人就创造了文字。这种文字是从原始社会最简单的图画和花纹产生出来的象形文字。它和苏美尔文、古印度文、古中国文及其他最古的文字体系一样，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象形文字结构复杂是借用图画来表示一定的事物或概念。例如，画三条波形横线表示“水”，画两座夹峙在河谷或峡谷两边的山峰表示“山”，画一块长方形的被灌溉渠分成几个相等部分的耕地表示“地区”概念。后来，这些符号在表示一定的概念的时候，同时也表示一定的音节。比如，埃及人把猫头鹰叫做“姆”，它的图形既表示猫头鹰，也表示“姆”这个声音。古代埃及有一音一符的字母，共 24 个。由各种符号组成的词组有 600 多个。这种文字几经演变，外形逐渐简化，向字母文字过渡。此后，它

成为腓尼基、希腊、罗马民族的字母文字和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而印度字母、阿拉伯字母等也辗转由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成。可见，古代埃及人创造的象形文字所产生的影响。

古代埃及人用纸草作的纸进行书写。纸草亦称纸莎草，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是当时使用的最广泛的一种书写材料。纸草纸的制作过程，是先将纸草上的茎干剖为长的薄片连结排齐，进一步再铺上第二层纸草片，然后用木槌槌打压平晒干，使重叠的纸草片变薄粘紧，就成为光滑平薄的纸草纸。这种纸草纸曾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广泛通用流行。希腊、罗马和阿拉伯人也使用它来书写。古代埃及人书写用的笔是由芦管制作的，墨汁是菜汁加烟渣调和成的。

古代埃及文字主要操在祭司和史官手中，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很难掌握，这就使得埃及文字发展缓慢，并且增加了它的复杂性。祭司们垄断了知识，不愿意让人民懂得文字，更不想使文字成为广大群众的精神财富。相反，祭司和史官却给文字罩上了神秘的光圈，把它认为是“神圣的词的文字”，是智慧之神托特的赐物。在书写开始时，他们必须向托特神行礼祈祷，口中要唸：“请到我这里来指导我，让我有能力执行你的职务……你的职务比所有其他的职务都好……请到我这里来，请指导我……我是你家的仆从。”

学校教育。埃及在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这个阶段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学校，学校教育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宫廷学校 这是埃及古王国时期法老设立在宫廷中的学校。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埃及就开始创办了这类教育机构。到中王国时期仍旧存在发展。办学目的是教育皇族后代和贵族子弟，使他们具备作为未来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能力。学习的内容大概是包括读、写、算以及天文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学习结束，这些人被派往政府机关进行实际业务训练，经锻炼以后分别委任为国家官吏。

职官学校 这是埃及中王国时期国家官办的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这类学校产生的原因和中王国时期国家强盛，政务繁杂有直接的关系。这时，宫廷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社会对培养人才的需要，这样就出现了在政府机关内附设建立的职官学校，担负培养训练自己机关所需要的官吏的任务。见于埃及文献记载的职官学校有：司马机关设立的训练司马官员的学校，司库机关设立的造就理财官员的学校。这些学校的教育对象均为贵族和官吏子弟。学习内容除基础知识外，主要学习进行与政务工作有密切联系的业务训练。这类学校教师大多由学校所在政府机关的官吏充任。学生从5岁开始，经过12年的学习，毕业后可成为文士和官员。职官学校出现并发展后，宫廷学校便逐渐衰落。

寺庙学校 古代埃及很早就有了寺庙学校。这类学校一般设在城市的寺庙中。当时寺庙在作为祭祀祈祷的主要场所外，还是兼办政治社会事务的机构，如代替法老掌管天文、建筑之事。因此，寺僧们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还是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者。所以，有人又把寺庙学校通称为僧侣学校。有些僧侣还任皇家的文化官吏，致力于数学、测量学和物理学的研究。有的寺庙藏有大量的图书，可供学习钻研。著名的海立欧普立斯大寺就堪称是一所高等

学府，吸引着有志学习的青年和外国学者来这里深造研究。寺庙学校重视科学教育，进行天文学、数学、建筑学、医学多方面的探讨，对学术和教育作出了贡献。

文士学校 这是古代埃及“文士”私人招生授业的学校。文士是当时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初步科学知识，能从事书写活动兼能担任计算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擅长文墨。文士在家中设学，故称文士学校，也叫书吏学校。办学目的为培养文士和计算人才。教育对象范围比较广，除奴隶主子弟，部分手工业者子弟外，个别女子也可入学，修业年限不等。学习内容有关书写、计算和律令知识。随着生产事业发展和行政事务增加，社会需要更多的能文善写者。职官学校、寺庙学校收容人数有限，而政府官员又多从文士中选拔，“学为文士”就成了一般奴隶主子弟进取的方向，文士学校遂广泛兴办起来。

从古代埃及教育来看，与其它国家相比较，它的学校教育较早地出现了，且学校的类型种类较多。古代埃及学校教育的阶级性是很明显的，是为奴隶主阶级子弟服务的。农民子弟极难进校学习，奴隶子弟更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僧侣乌若霍若新特在记述他所设置的学校的铭文上说：“我遵照法老的命令，创办和管理学校，学校的全部学生全来自显贵人家，而非来自贫穷人家。”在教育 and 教学内容方面，学校教育重视道德品质培养，要求学生具有敬神、忠君、尊官和孝亲的美德；在课程和知识传授中，课程门类多、内容丰富，重视书写能力的练习。当时的教育教学方法，多为灌输和机械性的训练，不注意引导学生思考，还要伴随体罚。文献记载，教师曾这样训诫学生：“用心地念书，不要把白天玩掉了，否则你的身体就要吃苦。”“不要把时间玩掉了，否则你就要挨揍，因为男孩子的耳朵是长在背上的。”“我要捆起你的腿，如果你再去街上游荡，你还会遭到河马皮鞭的抽打。”可见，古埃及的学校纪律是十分严格的。

（2）后王朝至托勒密时期埃及的文化教育

埃及从后王朝（第21—31王朝，约公元前1085—前332年）开始，至公元前30年罗马灭亡托勒密王朝为止，是为古代埃及奴隶制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

公元前11世纪初叶，埃及第二十一王朝在北部塔尼斯建立，南方底比斯实际是独立的王国，埃及陷于分裂。到公元前10世纪中叶，利比亚雇佣军领袖在北部塔尼斯和布巴斯提斯又建起第二十二王朝和第二十三王朝，底比斯在南方继续维持独立的局势。后来，利比亚人在北部以赛斯城为中心建立起第二十四王朝（约公元前730—前715年），努比亚人在南方建立起第二十五王朝（约公元前730—前656年）。约公元前655年左右，赛斯城的统治者普萨姆提克，建立起第二十六王朝，埃及重又出现统一。由此时到公元前525年波斯入侵，埃及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波斯人统治期间，埃及先后有第二十七—第三十一王朝的建立。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埃及成为亚历山大帝国一部分，开始了希腊人统治时期。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托勒密于公元前305年建立了托勒密王朝，最后至公元前

转引自曹孚《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司徒卢威：《古代的东方》，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89页。

30年为罗马所灭。

埃及从第二十六王朝建立，到波斯入侵前的150年的时间内，由于重归统一和形势稳定，社会经济又出现了一个比较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埃及的生产力又有了新的发展。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开始普遍使用。大量的铁器从亚述、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地区输入埃及。铁制的工具代替了从前落后的木、石生产工具，青铜器的使用也在逐渐减少。纺织、陶瓷、金属器皿和香料制造等手工业向前发展。国内外贸易活跃，城市增加，商业繁荣。据希罗多德的推测，埃及在第二十六王朝时，有人居住的市邑达2万座。对外贸易方面，埃及与希腊、小亚细亚贸易联系繁多，希腊人还在埃及建立了商业据点。这些是晚期埃及社会经济的基本情况，在文化上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的特点。

文字方面，随着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适应商业的要求，文字字体到这时也在发生变化。埃及字体有三种：（1）圣书体。这种字体笔画整齐如图案，主要用途于铭刻。（2）祭司体。在后王朝时期以前，由于经常书写文字的需要已经出现了草体文字。这种草体文字要求简化的外形，到第八王朝时期就演化成祭司体文字。这种简化的埃及文字体系，被希腊人称为僧用文字。它的特点是简化书写方便。（3）世俗体。埃及到第二十六王朝时，由于商业的发展要求文字进一步简化，于是出现了一套完善的草体文字，即所谓民用文字。这种字体比祭司体更加简化，类似我国的草书和现今的速记。这种字体在公元前八世纪出现以后，遂在埃及国家衰落的晚期广泛传播流行。

晚期埃及在这时期，主要是在第二十六王朝时，曾经出现过在很多方面恢复埃及古老制度的一种强烈愿望，从而重建埃及古王国繁荣时期在国家、语言文字、艺术和宗教等的旧形式。例如，文学盛行复古之风，在文学作品中，中王国埃及古典文学的风格和用语又复活了。象美术方面也出现了模仿，或几乎是盲目抄袭古王国时期艺术作品的倾向。

随着晚期的埃及和西亚、希腊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埃及和这些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日益扩大了。埃及人在与附近的许多民族交往过程中，曾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文化影响，当然也从这些民族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埃及与西亚、爱琴海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远远超过了前代。在这一时期，埃及文化深入西亚地区，主要是巴勒斯坦、腓尼基和叙利亚，乃至遥远的塞浦路斯。在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境内曾发现许多埃及古物，还有在埃及艺术的强大影响下制造的地方产品。腓尼基和犹太的移民也把他们的宗教习俗带到了埃及。移民埃及的希腊雇佣兵、商人和殖民者是古典世界日趋消灭的埃及文明的联系环节。

埃及文化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希腊文化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希腊阿波罗神的雕像就其身体的正面结构和这一时期典型的微笑表情而言，非常近似埃及的雕像，特别是近似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时期的雕像作品。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统治者，为希腊人大开进入埃及的门径，也就为希腊文化打开了埃及的大门。希腊的艺术家和手工业者把自己的艺术品和手工业制造品大量输往埃及。艺术中的艺术现实主义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埃及达到了自己的完满的形式。这一时期的肖像雕刻在埃及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完美的境地。属于这一时期的蒙吐耶姆哈特的头像和用绿片岩制作的祭司头像都是肖像雕刻的著名杰作。

从教育方面来看，埃及古代学校教育，在古王国时期就出现了学校，到

中王国时期学校教育得到发展，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学校。埃及学校教育在公元前八至三世纪之间，寺庙学校和文士学校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规模宏大的寺庙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成为传授高深知识的学府。像前面提到的海立欧普立斯大寺，就是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当时地中海地区的许多政治家，学者纷纷来到埃及。希腊七贤中的二位，梭伦（前 638—前 559）、泰勒斯（前 624—前 547）和作为哲学家、教育家的毕达哥拉斯（前 550—前 500）、柏拉图（前 427—前 347）都曾到埃及游学考察。我们知道，希腊七贤生活和创作的活动时间大体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和六世纪初，而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则是活动在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的历史人物。梭伦、泰勒斯和柏拉图等人都来过海立欧普立斯大寺学习。这些希腊的大哲学家和教育家到埃及游学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时埃及的学校教育。至于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校建置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前面已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其文化教育集中体现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化繁荣。关于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化教育以及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在本书第二部分“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教育概况”的一节中，已作了详细地论述，请读者参前浏览，这里不再展开说明。不过，应该进一步指出，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化成就取得并非偶然。它是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支持奖掖分不开的。托勒密王朝的托勒密·索特尔一世是一个最慷慨的学术保护人，他创建了规模巨大的图书馆，广泛收集图书，供以传播希腊文化。托勒密·菲拉德菲士继续他父亲的工作，建立了博物馆“缪斯神庙”，作为皇室资助学者和研究者寄宿的地方。从公元前 323 年直到公元前 30 年，托勒密王朝统治着埃及。在长期的内外复杂斗争中，托勒密王朝衰落下来，最后终于公元前 30 年为罗马所灭。此后，埃及的历史和文化教育便属于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的讨论范围了。

2. 西亚两河流域文化教育

古代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两河流域曾被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人类很早就在这里居住活动，创造了光辉的两河流域文化。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历史上西亚的两大文明古国亚述和巴比伦就在这里建立。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尤其是巴比伦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曾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两河流域文化亦被称为巴比伦文化。

（1）两河流域的学校教育

巴比伦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又地处贸易和交通的要道上，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很有利的。古巴比伦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巴比伦文化。这一文化的成果和标志，表现在文字、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建筑、宗教和法律等各方面。

巴比伦随着文字的产生，也和古代埃及同样很早就产生了学校和学校教育。根据考古学家地下发掘推测，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在两河流域就出现了学校。巴比伦的学校一般是附设在神庙之中，这种神庙学校成为传授所有知识的场所。学校均以培养“文士”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文士的标准是一方面能熟练运用文字从事多种书写活动，同时，也能作实际的计算工作。

公元前 18 世纪，即汉谟拉比在位时期，培养文士的学校已普遍发展。当时的文士学校大体有三种类型：（1）宫廷和政府机关设立的文士学校；（2）寺庙设立的文士学校；（3）文士设立的私立学校。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可以分为普通课程和专业课程。学生们在普通课程里接受基础知识的教育，学习文字、语言、算术、几何、天文学知识，以及学习根据星象预言未来的占星术。在接受普通教育之后，要受专门教育，学习高等专门课程。其内容有神学、法学、医学和音乐等。在接受专门教育过程中，学生还要到政府机关或寺庙中进行实习。一些寺庙学校还设有专门训练写字的学校。学生在校期间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楔形文字。他们要先学会怎样用粘土做泥版，又如何在上面画平行线，然后再学习书写和阅读。在当时巴比伦的学校中，教学方法是十分简单的，且带有原始的性质。教学过程仅限于教师问学生答，或学生问教师答，用一种语言去解释另外一种语言。练习写字和机械背诵是学生的主要作业。

关于两河流域学校产生的时间，长期以来是学者们聚讼的课题。本世纪 30 年代，法国考古学者帕拉在两河流域发现了马里城学校遗址。发掘的这所学校的地点是座落在政府机关和宫殿之间，而不靠近寺庙。学校包括有一条通道和两个房间，大间房屋长 44 英尺，宽 25 英尺；小间房屋面积约有大间的 1/3。在大间房屋，排列有 4 排石凳，能坐 45 人。小间有 3 排石凳，可坐 23 人。房间中无讲台讲桌，却排列有不少学生作业用的泥版书。地上有土盆，大概是用于盛水、和泥，做泥版用的。地面上还散落一些亮的贝壳，可能是用做教授计算的教具。据此种种迹象，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公元前 2000 年建造的学校。还有美国学者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卢卡士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士学校》一文中说：“现在发现的古代学校教科书和其他考古发掘到的文物，都说明至迟在巴比伦王国时期（约当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两河流域就诞生了学校；而且很可能比这早数世纪已有学校存在于该地。毫无疑问，约当公元前 18 世纪中叶，即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培养文士的学校已盛行于全境，即从现在巴格达向东南方向伸展，直到沙特阿拉伯为止，学校都出现了。”这段话可谓目前阶段关于两河流域学校教育情况的探讨的新结论。

（2）新巴比伦时期的文化教育

新巴比伦王国是由迦勒底人那波帕拉沙尔（公元前 626—前 605 年）占领巴比伦以后建立起的国家。所以，历史上又称新巴比伦王国为迦勒底王国。新巴比伦从公元前 626 年立国，到公元前 538 年被波斯所灭，存在了近百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特别是到第二代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 604—前 562 年）统治的时候，巴比伦的经济、军事、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期间，扩建了巴比伦城，整修了王宫，使之更加壮观美丽。它成为世界古代中期西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新巴比伦以城市和王宫的建筑豪华而著称。新巴比伦城有三层城墙环绕。主墙每间隔 44 米就建有塔楼一座，全城有 300 多座塔楼。城内有用石板铺设的宽阔路道。幼发拉底河穿城而过，桥梁都用石墩架设，整个城市气势十分宏伟。王宫的建筑更为堂皇华丽，墙壁上完全用彩色琉璃砖镶出各种动物的图案。尼布甲尼撒二世

为慰藉他的妻子波斯公主赛米拉米斯的乡思深情，还让人在宫中建立巍峨的石台，高达约 25 米，层层高台上种上奇花异卉和草木，用唧筒抽幼发拉底河水灌溉。仰望半空，花木扶疏，极为完美地重现了山区的景色。这就是世界古代七大奇迹的巴比伦“空中花园”。此外，还有马都克神庙，那里有 7 级的高达 90 米的梯形塔，顶端有四角镀金的小庙，供奉着马都克神的金像。新巴比伦时期，城市宫殿的重建及其成就，代表了两河流域文化在建筑艺术上的高度水平，反映了巴比伦人的聪明智慧。

新巴比伦文化从整体来看承袭了古巴比伦的成就。它在科学方面，特别是天文学上，更进一步得到发展。早在古巴比伦时代就已经积累了不少天文学知识，苏美尔和巴比伦的占星祭司从自己的观象台高处观测天体的运行，这样的观象台一般都安置在 7 级庙塔的顶部的平台上。在两河流域的古代城市，如吴尔、乌鲁克、尼普尔、阿卡德，也均曾发现这类庙塔的废墟，世世代代的天文观测使人们积累了不少知识。虽在两河流域的天文知识中也掺杂有不少迷信的东西，这是与那时的科学水平和祭司的垄断天文知识是有关系的。

到了新巴比伦时期，天文观测记录就更加完备，并且得到长期保持。他们改进了阴历置闰月的办法，汉谟拉比时代则是由中央国家当局下达命令决定，一般是临时性的措施并无规律。到公元前 6 世纪后期，新巴比伦规定八年中有 3 个闰月，后来又规定二十七年 10 闰。他们还把一个月分成四周，七天为一周，分别用日、月、火、水、金、木、土七个星的神名作为星期日至星期六的七天的名称。“星期”的意思就是星的日期。世界现在通行的七天为一星期的制度规定，大概就溯源于新巴比伦之时。

巴比伦在天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当时西亚各国有很大影响，并对后来希腊、罗马也产生了影响。此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巴比伦的天文知识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谈到日晷和一日之分为 12 个时辰时说，所有这些都是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里借来的，这是对巴比伦天文学成就的极好评价。

新巴比伦王国时期，特别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期间，天文、数学、建筑、水利方面的学术成就辉煌。这些知识掌握在寺庙的僧侣手中，所以寺庙自然地成为传授知识、培养文士的场所。一些著名的图书馆、观象台也都设立在寺庙之中。就教育而言，新巴比伦时期教育在当时也是属于先进的，对腓尼基、埃及、希伯来均曾产生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 586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并于公元前 583 年将不少希伯来的富家贵族带往巴比伦，造成了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

希伯来人在巴比伦留居期间，他们亲眼见到了未曾看见过的壮观的城市建筑、学校和图书馆，接触到了一种比自己先进的文化，眼界顿时为之开阔。后来，流亡的希伯来人出自身在异国怀念过去和设法回到自己家乡的意念，在巴比伦国土上创立了犹太会堂。这样的会堂内附设了小学，孩子们在这里读书写字和学习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这种学校大约产生在公元前 3 世纪，学校教育发挥了它的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后，会堂成了传授法律知识的场所，图书馆也成了会堂的一部分和进行普通教育的地方。希伯来人在巴比伦受到的文化教育启发，返回家乡后，他们就把犹太会堂发展成为学校。

尼布甲尼撒二世还对希伯来的青少年进行教育。在基督教《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篇中，就曾记载了他围困耶路撒冷城时，挑选以色列宗室四个俊美

少年侍王的故事。这几个被选中的少年相貌俊美，聪明颖慧，且有一定的知识，遂教他们迦勒底的文字语言，给以优美的饮食，教养三年以备用之。四人之中尤以但以理智慧出众，倍受国王恩宠。研究教育的专家学者，曾推测希伯来人把这种贵族教育方式移植过来在本国推行，教育培养自己未来的统治者。

西亚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教育发展是很早的，特别是巴比伦的文化教育成就更为辉煌。两河流域各族人民创造了楔形文字，这种文字曾被很多国家接受使用。随着文字的产生，和古代埃及一样，在两河流域学校和学校教育出现了，这里也是人类最初的学校教育的摇篮。古代巴比伦在天文学等科学方面的成就，不仅对当时西亚各国影响很大，而且被希腊罗马所借用。其他如苏美尔、巴比伦的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遗产，也对东方各民族文化 and 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样看来，古代两河流域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化教育，对世界文化教育的影响是伟大的。

五、南亚古代印度文化教育

古代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它的地理概念大体包括现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古代印度人民就活动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创造了印度的古代文明，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公元前 2000 年代中期，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诸部落从中亚南下入侵印度，他们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地区，继而向东扩展占有了恒河流域。雅利安人过去主要以畜牧业为生，来到印度之后，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活，结成农村公社。他们逐步学会农业，用牛拉木犁耕地，收割谷物时使用镰刀，也学会了灌溉。印度古籍《吠陀》记载了这段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史称这段时期为印度的吠陀时代。公元前 1000 年代初，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产生加剧，雅利安人逐渐由原始公社制度过渡到奴隶社会。

公元前 6—4 世纪是南亚次大陆的列国时代，根据佛教文献记载，当时印度北部大约有 16 个奴隶制国家。其中重要的有摩揭陀、憍萨罗、迦尸、弗栗特、鸯伽等国。这些国家互相兼并争霸，到公元前 3 世纪的时候，位于恒河中游的摩揭陀国家强大起来，向西北扩张到印度河流域，并占据了德干高原的主要地区。阿育王在位期间（约公元前 273—前 232 年），继续向南征战，最后各国被摩揭陀征服。这样，形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

1. 婆罗门教的教育

（1）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后，自称雅利安瓦尔那，意为白色高贵的人。他们把被征服的当地土著达罗毗荼人驱为奴隶，称之为达萨瓦尔那，意为黑色的野蛮人。“瓦尔那”一词具有“颜色”、“品质”的意思，汉译为“种姓”。这样就在印度出现了最初的种姓区别，种姓制度开始萌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雅利安人从原始游牧的军事民主制向奴隶制的转变，到后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 900—前 600 年），在古代印度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所谓种姓制度。

按种姓制度规定，印度整个社会成员以血统、婚姻和职业分成了四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第一等级是婆罗门，主要由祭司、贵族组成。他们主管宗教祭祀和文化教育，部分人还有直接参与政权的权利。第二等级是刹帝利，包括国王、武士和官吏。他们掌握国家军事和行政大权，实际上是军事行政贵族集团。刹帝利的基本职业是充当武士。婆罗门和刹帝利是天然的统治者。第三等级是吠舍，包括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主要从事农业、牧业和商业贸易职业。虽与婆罗门和刹帝利同为死后可以再生为人的再生种族，但是处于被剥削者的地位。吠舍种姓在政治上没有特权，要以布施（捐赠）和纳税的方式去供养婆罗门和刹帝利两个等级。第四等级是首陀罗，包括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和破产贫困与丧失土地的自由民。首陀罗种姓从事农、牧、渔、猎及各种低贱的职业，他们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是被压在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实际处于奴隶地位。首陀罗为“非再生族”。在种姓制度中，婆罗门社会地位最高贵，其次是刹帝利，这两个等级是奴隶主统治阶级。在古代印度各个等级之间，贵贱分明，界限森严，不同种姓之间尊卑极为悬殊，不共生活，不通婚姻。特别是首陀罗，与前三个等级之间

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能受奴隶主贵族剥削奴役，地位最低，处境也最悲惨。印度种姓制度的出现保护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特权地位，成为维护奴隶主阶级国家利益的有力工具。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的宗教。它是由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演变而来的。雅利安人在早期吠陀时代（公元前 15—前 11 世纪），其宗教信仰属于自然崇拜。雅利安人把宇宙自然种种变化，都归之于某种神的力量支配，于是便产生了天神（梵伦那）、太阳神（弥陀罗）、雷电和战神（因陀罗）、火神（阿耆尼）、苏摩酒神等各种各样的神。到吠陀时代后期（公元前 9—前 6 世纪），雅利安人在向奴隶社会转变和奴隶制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出现了种姓制度和专门的祭司阶层婆罗门。大约在公元前 7 世纪产生了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保留和利用了原始的多神崇拜，但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这时原来神的性质也有了改变，因陀罗神由雷电和战神变成为国王和贵族的保护神。还产生了最高主宰的大神，宇宙的创造者婆罗摩，即大梵天。婆罗门祭司以《吠陀》为经典，以《梵书》、《奥义书》和《森林书》作为经解，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加上烦琐的仪式和祭祀活动，借此愚弄和欺骗劳动群众。奴隶主阶级利用婆罗门教作为精神武器，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婆罗门祭司给种姓制度披上了神秘色彩，把等级制度神圣化。他们还捏造出造物神梵天用嘴创造出婆罗门，用肩和手创造出刹帝利，用膝盖创造出吠舍，用脚创造出首陀罗的神话。从而说明种姓制度各等级区别是由神的意志决定，并由此论证奴隶主阶级特权地位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奴隶主阶级还制订出加强和巩固种姓制度的各类法典，称之为“达磨”，谓“法”之意。根据这些法规，对各种姓社会地位、权利、义务和生活方式作了严格规定。如严禁低级等级的人从事高级等级职业，不同等级不能通婚，不能同住同行同进餐。在刑事处分上也表现出极为不平等。杀死一个刹帝利的赔偿，只及杀死一个婆罗门的赔偿的四分之一；杀死吠舍和首陀罗的赔偿依次减半，各为八分之一和十六分之一。婆罗门侮辱了首陀罗，所受法律惩罚，只要付很轻的罚款。

婆罗门教维护种姓制度和奴隶制国家政权，它的教义和后来出现的佛教，成为维系种姓压迫和培养宗教意识为核心任务的古代印度教育的主要内容。

（2）婆罗门教的教育

婆罗门教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摆脱尘俗，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达到与梵天合一。也就是说，得到了最高的智，获得高智即为得到真理。因此，培养梵天合一的人便成为婆罗门教的教育目的。《吠陀》圣典被婆罗门教视为梵天智慧的结晶和知识的总汇，它由《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索吠陀》和《阿闍婆吠陀》四部构成，是婆罗门教的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关于婆罗门教的教育大体情况，可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方面来叙述：

家庭教育。吠陀时期，婆罗门对儿童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

当时家族是社会的和政治结构的基础，家庭地位非常重要。在家庭里实行家长制，父亲是一家之长，管理子女生活，有权决定和处死子女，自然教育子女更属于父权范围。为了保持种姓的世袭和培养僧侣的目的，父亲在家中要教子记诵《吠陀》经。《吠陀》是以梵文写成，内容十分晦涩，难以理解。又由于《吠陀》是圣书，传授时只允许口授，不准手抄笔写，所以儿童

学习起来很是困难。一般要花费 10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学完一部经典，四部吠陀全部学成需要 40 年，实际上只能学成一部分而已。这种枯燥乏味的学习要求儿童用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惟有婆罗门贵族儿童才有条件接受。对于刹帝利和吠舍种姓子弟要求低，减少学习吠陀经典的数量，以让他们把时间用于学习军事知识和其它的实际知识。家庭教育主要传授《吠陀》经典，此外，也注重对儿童传授生活、习俗的知识，养成儿童规则的生活习惯，如早起、眼睛和牙齿的清洁习惯等。

在古代印度，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家庭教育一直占着重要的地位。

学校教育。随着印度人民在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中积累的经验，科学知识的萌芽和发展，以及宗教祭祀的需要，早期的婆罗门的家庭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于是出现了学校教育。

在古代印度各地比较早出现的学校可能是一种培养训练僧侣的学校，称为吠陀学校。这种学校的教育目的企图通过学校达到保持种姓的世袭和训练未来的婆罗门僧侣教士。初期，入学条件比较严格，必须为婆罗门子弟。到公元前 6—5 世纪开始发生变化，刹帝利和吠舍的子弟也可进校学习。教师皆由婆罗门教士任教。

公元前 8 世纪《奥义书》出现，这是一部注释《吠陀》经典的书，由此时到公元前 4 世纪孔雀王朝，印度史上称为奥义书时期。在这段时期，古代印度产生了“古儒”学校。

古代印度在公元前 8 世纪以后，若干门类的科学知识萌芽发展。人们为建筑祭坛、寺庙，获得了几何学、代数学方面的知识。当时出现有《祭坛经》之类的书，专门记述祭坛的形状、制作法和如何变换，书中已论述到勾股定理。为了选择吉祥的祭祀日期和适应农时的需要，人们不断地对星相进行观察，从而掌握了天文学和占星术方面的知识。为了正确学习和解释吠陀经书，文学、发音学和音韵学应运而生。这么多门类的科学知识的诞生，使婆罗门教的教育由机械背诵《吠陀》经典逐渐发展到钻研经义，具备了从理论上阐述经义的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由于以上这些社会实际发展情况，过去那种只重视背诵《吠陀》经典的传统教育，到这个时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胜任解释经义和传授各门学科知识的需要。这样，便产生了对于经义具有研究而又专门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人。这些人在印度的古籍中被称为古儒。由他们在自己家里开办的学校称之为古儒学校。古儒受到社会的尊敬，又有优厚的待遇。他们在家中设立学校，招收贵族子弟入学。阿什仑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由古儒私立的经义学校。下面简介古儒学校的办学情况：

古儒学校招生对象条件，婆罗门子弟 7 岁入学，贵族子弟 8 岁入学，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子弟 11 岁入学，许多不愿或不能亲自教育子女的家庭送孩子到古儒学校读书。入学须经一定的手续，按婆罗门教的规定，凡有志入学儿童，在作正式学生之前，须向婆罗门教士提出申请。然后通过入法礼的仪式，仪式要选择吉祥之日，届时适龄儿童着上新装，参加隆重的仪式，表示要成为梵行者。仪式结束后，经过古儒教师考试，合格者方能入学。开学期定在每年的七八月间。

学生进入古儒学校后，随古儒学习的年限不一，大约要 12 年，这是根据学习吠陀经卷数多少而定。一般来看，儿童在学完一卷《吠陀经》后就离开学校。在教学内容方面，学校和家庭教育比较，其特点最重要的是，教育教

学扩大了学习内容，教授多种学科和钻研吠陀经义。课程设置除《吠陀》经以外，设历史、文法、祭礼规则、数学、预兆学、时间学、诗学、灵魂学、武器学、天文学、美术等，并规定语言学、韵律学、文法学、字源学、天文学和祭礼为六科，作为学习吠陀经典的基础学科。在学习以上这些基础学科后，学生才去研读吠陀经典。古儒学校这样设课，虽以神学为核心，但涉及了广泛知识领域，这就在客观上对印度学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教学方法方面，改进机械背诵，禁止体罚，加之演示、复述、记录和实习教学手段，但实际上机械背诵和严酷体罚仍旧存在。古儒在教学时，还利用年龄大的儿童作为助手，这些助手先随古儒学习，然后由助手协助教师把知识教给一般儿童。这种教学方法，在 18 世纪为英国随军赴印度的牧师 A·贝尔所采用改进，后成为英国流行一时的导生制，即贝尔——兰卡斯特教学法。

当时，婆罗门教还在印度不少地方，设置了叫做“图洛司”的一种简陋学舍。每个学舍约有 25 名学生，主要学习《吠陀》经。

高等教育方面，奥义书时期，在印度的一些城市形成了学术教育中心。最初，学者们组织学术讨论会，研讨神学和哲学等问题。举行讨论会时，自行设校的古儒参与讨论，受过基础教育的青年也可借此机会倾听和参加学习。这种讨论会的规模日渐扩大，遂发展成为学术教育中心，且具备了高等学校的雏型。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教育中心，有托克希拉、班拿耳斯等。

2. 佛教的教育

（1）佛教创立与“四谛”教义

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大小国家争征的结果最后为摩揭陀国所统一。在奴隶制发展过程中，婆罗门教日益遭到反对，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对它所维护的种姓等级制度表示极大的愤慨，越来越强大的军事行政贵族也不满意婆罗门的特权地位，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婆罗门教已不足以维系人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佛教正是在印度列国时代的这样“伟大转折”的社会形势下，于公元前六世纪出现的新宗教。

佛教的创始者是释迦牟尼。姓乔达摩，名悉达多，公元前 565 年，出生于释迦族聚居的北印度河流域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是净饭王的太子，属于刹帝利种姓，被佛教徒和世人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隐修者和圣人”。悉达多幼年受过完备的教育，聪明智慧，多情善感。他 29 岁时，为要彻底解决人生问题，抛弃优裕的宫廷生活离家出走，到摩揭陀国一带寻师求道。他经过七年的艰辛，修行成佛。佛的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此后，他在摩揭陀、憍萨罗、拔沙等国继续宣扬自己的学说，周游列国传教达 40 年。公元前 486 年于拘尸那迦城圆寂。释迦牟尼死后，佛教继续流行传播，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宣扬在灵魂上“众生平等”，主张不需要婆罗门特殊祭司阶层，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修行得道。它反对婆罗门的特殊地位，但不反对奴隶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1 页。

制度，更不主张劳苦大众采用斗争的方式改变现实的处境。佛教比婆罗门教进步之处在于它具有一定限度的民主性。佛教教义的中心思想和基本内容是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苦谛：说明人生经历的苦难。佛教认为，人活着就是受罪，人生多苦，要经受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盛阴等八苦。

集谛：说明产生苦谛中种种“苦”的根源，在于存在各种欲望，有了欲望就会付诸行动。有了行动便造成了“业”（后果），而“业”又是以后的“因”，其结果是因果不断，生死轮回。

灭谛：说明必须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

道谛：说明要达到涅槃，必须修行才能得道。其途径和方法，包括“正见”（信仰正）、“正思维”（决心正）、“正语”、“正业”（行为正）、“正命”（生活正）、“正精进”（努力正）、“正念”（思念正）、“正定”（精神集中，禅定正）等八正道。

从佛教所宣扬的主张来看，人们如果修行得道就可以进入“极乐世界”。实际上，佛教所谓的“众生平等”不是在现实世界，而是在“极乐世界”的“天国”。这种教义在当时不仅对不满意婆罗门统治的人们来说，而且就是对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集团而言，也是符合其利益的。因此，佛教很快流行起来。在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时期，它被定为了国教。

（2）佛教的教育概况

从佛教四谛教义要求来看，它强调人们通过苦行修道而大彻大悟，蔑视现实的人生和实际生活，弃绝世间享乐，消灭一切欲望，追求涅槃及虚幻的来世，达到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这也是佛教的教育目的。在教育方面，佛教进行了一些改革，在种姓划分上不像婆罗门教那样严格，主张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凡是愿意为僧者都可以到寺院学习佛教教义。比起婆罗门教，佛教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使教育面向较多的群众，带有一定限度的民主色彩。

佛教寺院是教徒修行的地方，也是接受教育的首要机构。婆罗门教以家庭和学校为教育的场所，佛教广设寺院作为教育的场所。从教育的角度和意义来说，寺院具备了学校的性质，可称为佛教学校。寺院建有殿堂储备经卷，对学僧的徒众提供衣、食、住。凡是有志为僧者，首先经过父母的允许，并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如患有癫病、疡病、肝病、肺病、癫痫病患者不能入学。另外，奴隶、负债人、已被国家征为兵员的人也不准进入寺院。入学者，必须抛弃财产，与家庭割断联系，还要受具足戒。入学仪式简单：须剪去头发，身着袈裟，向大和尚行礼，口中念诵：“我受佛祖之保佑，我受大嘛之保佑，我受善之保佑。”由此开始，在清规戒律的束缚下，接受佛教的教育。

佛教教育以神学为中心，教学内容主要是学习佛教经典，包括经、律、论三藏，以及宗教的仪式。但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可能还要学习一些其他的学科。在中国唐代高僧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中，关于教育学习内容就曾记录：儿童“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

授五明大论”。 “五明”，即五门学科分类：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诂目疏别”，即学习研究语音、语法和修辞的学问。二曰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即学习研究工艺、数学、天文、星象、音乐、美术之类的科学技术和艺术。三曰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即印度古代医学的内容。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复真伪”，即学习研究论理学，所谓形式逻辑。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即学习关于宗教哲学的知识。

佛教寺院教学，要求教师“师必博究精微，贯穷玄奥，示之大义，导以微言，提撕善诱，雕朽励薄。”教学方法经师广泛使用地方语言解释经义，改变婆罗门教师以梵文作为教学用语，这样易于僧徒学习掌握，是比较进步的办法。在学习初期阶段，师生面对面地讲授，经师口诵，僧徒记诵，口耳相传，反复诵读。学习到高级阶段，则采用议论和争辩的方法，对经义里面一些疑难问题，学生可以提出发问。僧徒学习年满12年，经考试合格者，称作比丘，意谓僧人。多数比丘离寺回家，选择少数比丘留寺深造，一般再学习十年，继续学习教义传授和生活监督，然后担任寺中僧职。

佛教教育重视道德品格教育和僧徒的言行举止训练，在管理方面也很严格，订有各种清规戒律。凡入寺院者，要过清静节约的生活，奉行不杀、不盗、不淫、不饮酒等戒规，也不得从事任何世俗性职业，平时生活除睡眠、托钵、饮食和洒扫之外，全部时间都用于学修方面。寺院教学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教师不仅要传授经义，而且对学生负有一定的义务，照顾学生的衣食住行。僧徒视老师为父母，更要毕恭毕敬地承担义务，侍奉老师的日常生活，如送洗漱水、放好坐具、端饭等。

佛教重视对女子教育，这点和婆罗门教有所不同。佛教还在印度各地修建尼庵，作为女子修行和学习的场所。尼庵在接受幼尼和教育内容上，和寺院教育管理大致相同。尼庵教育的水平，除个别尼庵，一般不如寺院高。尼徒学习完毕，称作为比丘尼。

佛教除以寺院和尼庵作为正式的教育场所外，还重视家庭教育。因为佛教教育面向广大群众，随着求学者人数日渐增加，寺院和尼庵有限，难以容纳，一些信徒也可以在家修行，接受佛教的教育。这些在家僧称作优婆塞，在家尼叫优婆意。在家僧尼也同样受到佛教戒律的约束，苦行修炼，诵读经典，并要定期参加寺庵的宗教仪式。寺院和尼庵负有指导优婆塞和优婆意的学习任务。这种辅助信徒家庭教育形式，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使佛教很快成为众人的宗教。

佛教教育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在教育措施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和婆罗门教比较都是进步之处。佛教教育不仅对当时的印度，而且对以后东方一些国家乃至古代西方的教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概而言之，古代印度人民同其他古代东方民族一样，为丰富世界文化教育的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南亚古代印度文化教育，在世界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玄奘：《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页。

《大唐西域记》，第37页。

六、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教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很早的古代开始，直到现在，已有了将近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伴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教育也出现了思想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

1. 西周官学的衰废和私人办学的兴起

随着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解体，与它相适应的“学在官府”的教育也走向没落和衰废。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产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代替西周官学的教育组织的新的形式。官学的衰废和私学的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教育上发生的重大变化。

（1）西周官学的没落衰废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建立在商代学校教育基础上的西周教育，建立了奴隶制的官学体系，是奴隶主贵族教育的典型代表。西周的教育目的为培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人才，学校系统分“国学”和“乡学”两类，教育内容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为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行政管理制度。西周的学校教育和一切文化学术都为奴隶主官府所垄断独占，适应奴隶主贵族政治统治的需要，“学在官府”和“官守学业”就是对这种官学教育性质和特点的高度简明的概括。

西周末年和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发生了大变革，这是西周官学衰废的根本原因。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在奴隶制解体过程中，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的官学也随之日趋衰落下来。这时，奴隶主贵族子弟不像从前那样热衷向往庄严的官学，他们整天嬉戏游荡无心读书，奴隶主贵族的官学已经形同虚设。从《诗经·郑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景，《子衿》篇描写：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
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
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
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
如三月兮。

这首诗如果释译一下，大概意思是：穿着青领衣裳的学子呀，我的心时刻在关心着你们啊！纵然我没有亲自去找你们，可也得学习呀。系着佩玉带子的学子呀，我的心日夜在惦念着你们啊！纵然我没有来找你们，可也得上

学呀。你们怎么可以整天喜好登高在城头上东来西去闲逛呢？要知道一天不学诗书礼乐，可就要生疏荒废如同三个月了。由此不难看出，诗中讽刺了那些衣着华丽的奴隶主贵族子弟是如何生活，又是怎样对待学习的？郑国的官学如此，其他官学状况亦可见一斑。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官学和衰败的奴隶制一样，都是很不景气的。

春秋时期，官学的没落已成为明显的事实。春秋大约有 200 多年的时间，但现在从文献记载，关于官学问题的材料，仅仅只有二件事情：一是《诗·鲁颂·泮水》记述鲁僖公（公元前 659—前 627 年）修建泮宫；一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传记说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清末学者黄绍箕也说：“周室东迁，庠序废坠。春秋二百四十年，诸侯学校之制见于经传者，亦只鲁僖公之立泮宫，郑子产之不毁乡校二事。外此诸国，几未闻其有一二学校，岂书缺有间欤？”当时，王室、诸侯连年忙于打仗，战争频繁，社会动乱，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学校教育。上文所引的诗的小序中就说：“《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郑玄为此注解：“国乱，人废学业”。另外，奴隶主贵族在政治上的没落，缺乏上进的精神，只图享受不重视教育，有些诸侯贵族公开反对官学教育。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往者去见周大夫原伯鲁，谈及官学的事情，原伯鲁就和他讲：“不悦学”，甚至还讲“可以无学，无学不害”。这是公元前 524 年的事情。说明奴隶主贵族不可能再垄断学校教育，同时，那种与时代背驰的贵族教育也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官学是以贵族为教育对象的，他们不想进学不思读书，连贵族本身也认为官学可有可无，官学走向没落衰废也就是必然的了。

随着西周王室的衰落，没落贵族及其后裔乘乱逃亡，不少在周天子和诸侯宫廷中掌管文化的职官，也开始走出宫廷另寻生活出路。例如，《论语·微子》记载，周天子宫廷中掌管礼乐的官吏纷纷出走，乐官大师挚跑到齐国，二乐师干跑到楚国，三乐师缭跑到蔡国，四乐师缺跑到秦国，打鼓的方叔迁至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移居到汉水地区，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到海边去了。这是一批司礼司乐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其他方面的知识分子情况同样也是如此。他们失去了世袭的职守流落到了民间，也就把文化知识带下去了。与知识分子向民间活动的同时，官府的许多图书典籍也跟着扩散了。这样，就打破了奴隶主贵族的“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现象，造成“文化下移”的趋势，出现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王官失职，官学失守，文化下移民间四方，西周奴隶制官学彻底地衰废了。

（2）“士”阶层的出现和私学的产生发展

在西周官学走向没落衰废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私学的兴起和发展。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但究竟是何时开始的？这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私学的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大变革的产物，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化下移就为私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还有“士”阶层的出现和成长也直接推动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因此，我们在讨论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教育情况时，还是先从士的出现谈起吧：

春秋战国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变化过程中，“士”作为一个新的社

《子衿》诗引自《十三经注疏》上册，《毛诗正义》卷四，中华书局 1980 年版。作者根据诗中注疏译文。
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8 页。

会阶层出现了。所谓“士”，有文士和武士，还有能文能武之士。在西周奴隶制度下，士是奴隶主贵族中的最低阶层，如“公卿大夫士”中的士，即指一些下级官吏。这些人职位世袭，还能够“食田”（《国语·晋语》）占有少量的土地，受过六艺知识教育，亦文亦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士的构成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士阶层形成了。一部分士是从奴隶主贵族中游离出来的，他们凭借掌握的六艺知识技能，变成依靠知识谋取生活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士是由于庶人工商的身分变化，他们的子弟上升为士的。还有一部分士是从新兴地主阶级中涌现出来的。可能还有获得解放的奴隶转变为士的。这批人不狩不猎，不工不商，脱离生产劳动，靠着掌握的文化知识或一技之长，走公室跑私门，寻找个人的政治以及生活的出路，成为社会上极为活跃的一支力量。

春秋初期，各国诸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巩固统治地位，对“士”开始重视，出现了养士之风。齐桓公为了争夺霸业，采纳管仲的建议，一时养游士多达80人，供给车马衣裘财币，让他们周游四方，号召天下贤士来为齐国服务。齐国首先称霸，养士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表现了养士的政治效果，反映了“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深刻道理。春秋末年，不仅公室养士，私门也争相养士。例如，齐田成子“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又如鲁季孙好士“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可见私门养士的状况。到了战国时期，“养士”之风更加盛行，公室如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都一度吸引士众所往。齐威王和宣王创办的著名“稷下学宫”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私门养士如四公子齐孟尝君、楚春申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以及秦国的吕不韦，所养的士都是很多的。孟尝君有“食客数千人”（《史记·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喜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史记·平原君列传》）。士的地位大大提高，这是时代的风气。

士，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后，自然也就成为人们择业的对象了。士，进可以做官食禄，退可以为师办学，身价很高地位优越。所以，有不少人认此为进身捷径，争着来学做士，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他们要进学读书，官学已经没落衰废，即便存在也不能担负起培养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的人才的任务，这些人要读书只有投身求教那些有学问的人。据传在春秋战国期间，由于赵襄子在一天内举了两个中牟的贤士为“中大夫”，结果“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明那时人们热衷读书追求当士的风气是很盛的了。这样，有人渴望“学而优则仕”，有人志趣当师办学，于是私学便产生了。士的出现是私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养士之风的盛行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迅速发展。由以上所述可见，文化的下移和士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产生发展的更直接的原因。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总是紧密联系着。因此，西周官学的衰废，春秋时私学的产生发展都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绝不会是突废骤起的。现在，教育史学界一般认为，私学产生于春秋中期，到了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私学繁荣蓬勃发展起来。

春秋初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大变化，没有统一的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各诸侯国根据需要各自为教，教育思想内容和文化学术观点也不尽一致，形成了不同的学风。如《管子·大匡第十八》所说：“卫国之教，危傅以利……鲁邑之教，好迓而训于礼……楚国之教，巧文以利”。随着文化学术下移扩

散，士阶层的崛起，春秋中期出现了私学。有人认为私学在春秋初叶可能就产生了，现在看来还没有确凿的材料能够证明这一历史事实。春秋中期有了私学，《吕氏春秋·精谕》中记载了邓析开办私学，著有《竹刑》，教授法律内容。《列子·仲尼》中，也记述了郑国伯丰子办私学。这些私学的创办都在孔子之前。从孔子开始，私人讲学之风日益兴盛，私学普遍于各地。正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所记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的私学和儒家学派，2000多年来对中外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他在鲁国开办私学，与各家私学相比，孔子私学规模宏大，教育经验丰富，使私学作为一种新的办学形式，应该说是从孔子开始的。关于孔子办私学，以及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在下面我们还要专门详细论述。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孔子出生成长的鲁国当时文化教育状况。春秋时期，鲁国这个地方有它的特殊地位。在政治经济改革上是走在前面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发展得比较快。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就开始实行“初税亩”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在文化教育方面，鲁国又蕴藏了旧的思想文化。鲁国原来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地，伯禽到鲁国的时候，周成王赏赐给他大批的文物典籍，同时带去了一些文化官吏。这就使鲁国成为西周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到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鲁国保存的传统文化是比较丰富完整的。公元前541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访问，很有感慨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因此，新与旧交织在一起，当时鲁国的思想斗争是很尖锐的。孔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办起了私学。在他的提倡和影响下，孔门学生也分散到各国去开办私学。《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卫、陈、楚、魏、齐各国都有孔门弟子办学，私学普遍发展了。战国时期，孟子、荀子都是儒家学派的大师，聚徒讲学致力于教育事业。孟子所办私学规模，史书形容“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私学培养出不少人才，秦相李斯，学者韩非等都出于他的门下，西汉儒家的经学不少是由他的弟子传授的。墨子也创办了私学，规模和影响仅次于孔子私学，被并称为孔、墨两大“显学”。墨家私学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教育团体。《墨子·公输》篇中记，墨子与楚王对话自称有弟子300人。《淮南子·泰族训》亦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可见其墨子私学的规模。其他还有道家、法家、名家、纵横家等也都办了私学，聚徒讲学。在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私学派别。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产生发展，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各家私学及其代表人物，从不同阶级和集团利益出发，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展开了思想上的斗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各派之间互相辩论，而又相互影响吸收，即便在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发生变化。这一切对当时的社会变革，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各家各派私学既是教学团体，又是政治学术派别，在这个中间，大师辈出，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从事教育活动，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经验，成为我们现在宝贵的思想财富。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和

私人讲学奠定了基础，漫长的过程，朝代的更替，官学时兴时废，但私人讲学之风弦歌不绝、绵延不断。这是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其源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

2. 孔子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学说影响深远、历久不衰，被认为是东方文明的象征。而他本人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被尊为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今天，东西方国家不少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他和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1) 生平事略和教育活动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逝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其先世是宋国贵族，由于宋贵族内部倾轧，曾祖父孔防叔，畏华氏之逼迁居鲁国。孔子的父亲名纥，字叔梁，是一位下级武官，以力士闻名，曾做过陬邑宰。母亲姓颜，名征在。孔子三岁时，父亲孔纥去逝，从此家境更加衰落。所以，他自称“吾少也贱”（《论语·子罕》）。司马迁也说：“孔子贫且贱。”孔子自幼好学，“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作习礼的游戏。及长，15岁时就开始立下了坚定不移的学习志向。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孔子的这段话概括了他一生进德修业的过程。其中“而立”、“不惑”、“天命”之词，已成为我们现代人年龄阶段的代语，可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生活习俗形成的影响。

孔子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按他的身分和条件，当时是无法进官学学习的。更何况那时的官学已经衰废，即便存在也是名存实亡。孔子取得知识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靠自学获得的。据传，他曾向师襄学过琴、跟苌弘学过乐、问礼于老聃、向郈子学官制，入太庙要“每事问”（《论语·八佾》）。孔子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就去吹吹打打。还学会了弹琴、射箭、驾车子之类被认为是值不得称道的技艺，“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就这样，孔子把奴隶主贵族的诗书礼乐一套知识全都学来了。

孔子青年时代，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曾在季氏门下做过很小的官吏。一次当过管理仓库的“委吏”；一次做过管理牛羊的“乘田”。按赵岐注解，委吏为“主委积仓廩之吏也”。乘田为“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

据孟子言，“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这意思是说，孔子在做“委吏”时，把帐目写得清清楚楚，出入的数字都写对了。他管理牲畜时，牛羊都壮实地长大了。初步显示了他具有做实际工作的才能。

《史记·孔子世家》。

《史记·孔子世家》。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3、244页。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3、244页。

孔子进入“而立”之年，30岁左右开始讲学，以后差不多40年的生命都花在教育工作上，从事长期的教育活动。有的书上讲孔子20岁开始了从教活动，但我们认为孔子从30岁开始讲学可能更为符合实际一些。因为他本人就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到30岁时，懂得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学问有成了。这时，他在曲阜城北设立了学舍，规模比较大。在这个学校里，讲学的地方，叫“堂”；学生的宿舍，叫“内”。学生都是慕孔子之名远道而来求学，“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史记·孔子世家》）。最初的弟子有颜渊、子路、冉有、子贡等。学生来的地区，以今天行政省分区划分，有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有的比孔子小不了几岁。孔子外出讲学游历，学生们也相跟而随，请教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在游历各国时，遇到危机困难，仍能坚持继续讲学、弦歌不绝。一次，孔子和学生们被围困在陈、蔡，断了粮，随从弟子病不能起，但他仍讲诵不断。大树之下，杏坛之上，都有他的足迹，都是他讲学的地方。据传，孔子到了后期，弟子达3000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或有说七十七人。孔子一生有两大贡献，聚徒讲学，开办私学，就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发展的第一大贡献。

孔子从40岁左右开始，搜集我国古代文献，修订诗、书、礼、乐，这件工作一直进行到晚年。50岁时，孔子在政治上发迹，做了鲁国中都宰，不久升司空，后调为大司寇，56岁由大司寇“摄行相事”（代理宰相）。可以说，这几年是孔子一生比较得意的时期。但由于当时鲁国政局不稳，矛盾重重，他被迫离开了鲁国，奔走于宋、卫、陈、齐等国，前后有14年。这段时间，他的保守主张，不为各国执政者所采纳，个人生活凄凄惶惶，甚至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不得已又重返鲁国。此时，他已经是一位68岁的老人了。孔子眼看自己重登政治舞台已经不可能了，从此专心从事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度过他的晚年。他整理完成了《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部著作，后人称之为六经。孔子整理古代文献的意义是重大的，他为以后人们研究古代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教育提供了宝贵材料，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传播起了伟大的作用。而这六部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指导人们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经典，具有严肃的指导作用。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删定而成六经，这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发展的第二大贡献。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一代宗师和大教育家孔子病逝，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滨。鲁哀公在悼词中说：“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春秋左传·鲁哀公十六年》），表达了鲁哀公感到多么孤独和今后向谁请教的沉痛心情。孔子死后，弟子们在墓旁搭起草房，守丧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不忍离开，又独自守丧三年。子贡称颂老师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表达了学生们对自己尊敬和亲爱的老师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

《论语》一书是研究孔子和他的教育活动及教育思想的最基本和主要的原始资料，全书共有20篇。《论语》一书取名，意义是语言的论纂。书中记载了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录了他的若干学生的活动。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就是说《论语》的作者是孔子的学生和再传弟子，他们根据自己所记汇辑成书，非一人之作。《论语》的编著的开笔时间可能在春秋末期，完成于战国初期，也非一时之

作。后人对《论语》多有注释，流传版本可谓汗牛充栋。宋代大教育家朱熹还把《论语》和《大学》、《中庸》、《孟子》三部书合编在一起，并详加注释成为《四书集注》，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教育的重要经典。

（2）首倡“有教无类”，主张“庶富教”

孔子关于教育对象的思想，体现在他首次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作为他办私学的指导方针。“有教无类”这一教育思想，是孔子教育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

“有教无类”一语出自《论语·卫灵公》，原文是：“子曰：‘有教无类’”。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关键的问题是在对“类”这个字怎样理解？现举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说明。东汉马融作注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南北朝时的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说：“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按他们解释的意思，“类”即可解释成为“种类”。今人，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中说，孔子教学“不分贫富，不择对象，他是‘有教无类’”。任继愈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84页上说：“孔子‘有教无类’，他的弟子中有贵族，也有比较贫苦的城市居民，当然不会有奴隶，但比起春秋以前，至少孔子容纳了奴隶主贵族以外的类，扩大了受教育的面。”以上这些提法解释，比较合乎孔子关于教育对象的思想，说出了“有教无类”的基本含义是：不分种族、贵贱、贫富、贤愚、年龄和地区，任何人（除奴隶外）都可以入学接受教育。孔子在提“有教无类”时，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脩的“脩”是指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脔，十脔为一束。束脩就是十条干肉。说明凡是奴隶主阶级愿意学习的人，只要能够交“束脩”，孔子就可以收他做学生。

从孔子的学生群体来看，他在办学过程中是实现了“有教无类”这一方针的。我们列举一些学生的情况就能够说明这一点。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35人，无年及不见于书传者42人。

在众多的学生中，有；贵族子弟孟懿子、南宫敬叔、司马牛。商人子弟端木赐（子贡），家累千金，结驷连骑。出身贫贱的颜回，居陋巷，过着“一簞食，一瓢饮”的生活。曾参种菜，其母织布，十年不曾添一件新衣。闵子骞受后母虐待，冬天穿着塞芦花的衣服，御寒取暖。仲弓，其父“贱人”，家贫几“无立锥之地”。子路食藜藿（野菜），百里负米养母。子张是鲁国“鄙人”。子夏衣若悬鹑。公冶长曾判刑入狱坐过大牢。颜涿聚当过“大盗”。聪颖学生有象闻一知十的颜回和闻一知二的子贡那样的，也有象高柴那样“愚”，曾参那样“鲁”的并非聪明的学生。学生年龄状况也参差不齐，十分悬殊，年龄大的学生秦商只比孔子小4岁，年龄小的学生，如公孙龙少孔子53岁。学生来自鲁、齐、卫、晋、宋、蔡、秦、楚等国。难怪在当时就有南郭惠子发出感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荀子·法行》）

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对象只限于奴隶主的贵族子弟，文化为贵族所垄断，教育大权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而“有教无类”的口号提出后，就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将教育对象扩大了，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把学校由官府移到了民间。学校冲破了宫廷藩篱与社会发生了广泛联系，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推动了文化的下移，反映了当时教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这在当时

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放在世界文化教育范围看，孔子的“有教无类”的理论和实践，也占有较高的地位。十六、十七世纪之际，通过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的翻译介绍，孔子的“有教无类”和其教育思想传入了欧洲。这些传教士还举行孔子报告会，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孔子学说：“有教无类”。其中服尔德就是一位热心和崇拜孔子的欧洲人。他赞颂孔子的“有教无类”是“给人类带来了教育的福音”。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

下面来谈孔子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教育作用问题基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教育对人性形成的作用，也就是教育对人的培养有什么作用；第二，教育对社会和国家的作用。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因为教育对社会国家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人的培养来实现的。

教育对人的培养作用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类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为习染的不同，便逐渐地相距悬远了。孔子说的性，是指人的本性，即先天的素质。习就是习染，指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这就肯定了环境和学习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安排的环境影响和教育活动。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这就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指出，孔子在谈到教育作用问题时，他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意思是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改变不了的。关于上智下愚的解说，古今学者颇有异说。《汉书·古今人表》说：“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这是以其品质而讲。孙星衍《问字堂集》上讲：“上智谓生而知之，下愚谓因而不学”，则是兼以其知识与品质来说。孔子自己也说：“生而知之者上也”，上面说的“上智”可能就是“生而知之”的人。这种人当然是不会有的，就连孔子自己也讲：“我非生而知之者”，是一个“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孔子既讲“性相近，习相远”，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反映了孔子关于在教育作用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的矛盾性。

关于教育对社会国家的作用问题，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用行政命令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整齐约束百姓，百姓只是暂时地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犯罪可耻；用道德来教育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但能知廉耻，而且人心归服。治理国家使用“德”、“礼”是孔子的主张，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社会秩序就可以维持，封建政权就能巩固。这对后来历代统治者重视教育，用道德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孔子不仅认识到教育对治国的重要性，而且把教育看成是“立国”的要素。主张“庶富教”，提出“庶富教”的教育治国和先富后教的教育思想。

在《论语·子路》篇内记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经众多了，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

裕起来”。冉有接着问：“如果已经富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答说：“教育他们”。这个故事反映出了孔子教育治国论的思想。他认为，世间人是最基本的，没有人也就谈不上立国和治国。但人既有口要消费，又有手能生产。所以，第二步就要发挥人的作用，使他们幸福，以满足他们消费的需要。第三步，有了物质基础，最后还要发展教育，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把教育最后搞好了，一个国家才算完全治理好了。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反映了他已意识到教育受经济制约，经济发展，教育才有可能发展。因为人们如果吃不饱、穿不暖，何尝有条件 and 精力去学习呢？解放前的旧中国，政治混乱、经济凋蔽、民不聊生，国家如何发展教育，人们又怎能学习，历史的事实不是最好的说明吗？今天，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宏伟的现代化建设，“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深入人心，经济在发展，教育在发展。两千多年前，孔子讲的人口、经济、教育作为立国治国的三要素，仍不失为有借鉴的作用。

（3）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要将“士”培养成为“君子”，或者说是“君子儒”。这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需要，要求有一批既有道德又有才能德才兼备可以从政的贤才。

“君子”一词，在春秋以前，是贵族统治者的专称，含有奴隶主贵族老爷的意思。孔子所说的君子或君子儒，是把原来君子的含义范围加以扩大，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标准的理想人格，成为其培养的目标和对人才规格的要求。孔子培养的君子或君子儒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品格又如何呢？

我们在研究孔子的主要材料《论语》一书中，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讲到有关君子的有 107 处之多。看来孔子对君子的品格是很重视的。在《论语·宪问》篇中，有一段是孔子和学生子路就君子问题讨论的对话。大意是：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子路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使一般人安乐。”子路接着问：“象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使所有老百姓都得到安乐。修养自己来使所有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论语·雍也》篇也记载，孔子明确对子夏提出要求：“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意思是说，子夏你要去做个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去做小人式的儒者。上引两段材料，和《论语》中其它有关描述君子的文字联系起来看，孔子培养“君子”或“君子儒”的标准，一方面是“修己”，另一方面就是“安人”。“修己”就是要修养自己，保持谦虚的态度。“安人”就是使百姓得到安乐。要做到这样，君子或君子儒必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中国近代教育家陈青之说：“凡孔子及其弟子所形容君子的一切言行，无不是指着模范人格说话”，“这种人格，不仅富于知识，实优于品性，得志时能致君泽民，不得志时能安贫乐道。国家若是有了多数的这种人材执行政务，则政治必然清明；社会有了多数的这种人材主持正义，则风俗必然醇厚，这就是孔子的教育目的。”培养君子或君子儒既是孔子的教育目的，也是他的人才观。

孔子提出从平民中培养君子或君子儒，合乎要求的、理想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条培养人才的途径，概括起来说就是“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一语出自《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这个命题虽然出于子夏之口，但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代表了孔子的教育观点。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的解释，历来存在着分歧意见，但基本的含义提出了把官职和学习联系起来考察用人的观点，这是大家共识承认的。有官职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并继续学习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得到一定的官职，学习与做官联系起来。学习成为通向做官的途径，学习好坏就成了做官的条件，学习不好或成绩不优，自然也就没有作官的资格。因此，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不发愁没有职位，只发愁没有自立的本领。他勉励学生努力学习，好好学习，学好了去做官，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做官。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这是对奴隶制世袭世禄制度的一个批判和冲击，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新命题，有时代的意义和进步作用。西周时期，选用人才大量存在着“不学而仕、仕而不学”，或“学而不优”的现象，奴隶主贵族子弟做官的资格是靠世袭来保证的。而“学而优则仕”的口号提出后，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不学，或者虽学而不优，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它有力地冲击了“氏以别贵贱、氏以别智愚”的宗法观念，与“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路线相配合，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它为从隋唐开始实行了 1300 年之久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对以后中国 2000 年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育目的决定了教育内容。孔子的教育内容是以思想品质和伦理道德的教育为主，包括了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等三个部分。具体地说，孔子是以“四教”、“六艺”和“六经”来教育和培养他的学生。

四教

孔子以四教教育学生。按《论语·述而》篇的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就是说老师以文献、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这里，孔子所谈的“文”，主要是指西周的传统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他所言的“行”、“忠”、“信”的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品行、忠诚和信实的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之间的关系，孔子是把道德教育摆在首位，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为道德教育服务的。这层关系，孔子在《论语·学而》篇明确地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由此可见，儒家治学是把做人摆在第一位，把求知摆在第二位。

六艺

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是西周时期国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六艺的艺，含有艺能的意思，可以推测当时人们头脑中是把知识的传授和技能训练结合在一起。礼艺，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艺，包括艺术音乐、诗歌、舞蹈。礼、乐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教育的性质。礼重在约束外表行为，乐重在调和内在感情。射艺，指射箭。御艺，指驾兵车。射、御是军事教育训练。书艺和数艺，指识字和计算之类的文化基础知识。《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中身通六艺者 72 人。这说明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六艺教育，要求

学生学习六艺的知识技能。但孔子培养目标是“君子”或“君子儒”，所以教育内容比起六艺还要广泛丰富。他整理古代文献编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作为教学授课的基本教材，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六经。

六经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收集古代文献，整理出了《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部经书。孔子当时并未直接定名为经，把这六书称作为经的，始于庄子的《天运篇》。以后经过儒家学者不断地逐渐完备，遂成为儒家学说的经典，称为六经”。六经内容包括我国春秋战国以前的文化知识的一切领域，保存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哲学、文学等多方面的极为丰富的宝贵资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誉称过“六经皆史”，这是很有见解的。下面将这六部经书的内容和性质简要作些介绍：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名篇选集。春秋时期流传的古诗约有 3000 多篇，这些古诗歌的创作年代，大体是从西周开始到春秋中叶的 500 多年间。经孔子搜集、整理、删去重复的，存其精华 305 篇，按其性质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和商颂等部分，编订成为一本诗歌选集。国风包括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和社会风貌，其中抒情诗居多。这些诗歌具有清新、明快、朴实的艺术风格，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小雅和大雅是西周宫廷的诗歌，是贵族们在宴会时相互应酬的诗歌，内容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的某些黑暗面，颇有史料价值。三颂是贵族的庙堂诗歌，内容为歌颂祖先功德和祈求神灵保佑，其格调特点庄严肃穆。在雅、颂里还保存了一些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我们了解那时的文化教育提供了资料。孔子是很重视诗教的，他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想内容符合于周礼的准则，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以后，诗学被列为必学科目，在儒家传习不断。今天，流行的《诗经》版本，相传为鲁人毛亨所传。

《书经》，又称《尚书》，是春秋以前历代政治历史文件汇编。孔子选集了虞、夏、商、周历代的重要典章文物和重要言论，编纂而成为《书经》。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语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书经》后来保存下来的有 29 篇，从《尧典》起，到《泰誓》止，上起唐虞，下至春秋。从《书经》所载材料，可以推见我国古代的政治情况，特别是西周时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把它和《诗经》配合起来作教材教育学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这样看来，孔子把《书》经作为教材是确实的事情，而且是用当时通行的普通语去讲解。

《礼经》，主要记载春秋以前社会的重要礼制。据说在孔子以前，奴隶主贵族的礼是很多的，《汉书·艺文志》描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孔子非常重视礼，他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于是选取士所必须学习的礼制，内容包括冠、婚、丧、祭和朝聘宴会的礼仪程序，定

为《士礼》17篇。这就是流传下来的所谓《仪礼》。《仪礼》之外，还有《礼记》和《周礼》。《礼记》是儒家讨论礼制的文集汇编，内容有孔子关于礼的不少言论。《周礼》是一部讲官制的书，非周公所制，乃为后儒所作。《仪礼》、《礼记》和《周礼》，合称“三礼”。“三礼”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历史资料。

《乐经》，是关于音乐的书，但可惜早已亡佚。孔子一生重视音乐，他以音乐为涵养弟子性情的工具，并把音乐看作是治国安邦的一种手段。据传，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其肉味，赞美《韶》乐尽善尽美；而称《武》乐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说明古乐在那时是存在的。

《易经》，是一部有关占卜之书。它从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8卦，演变成64卦、384爻。每一卦有卦辞，每一爻有爻辞，用来解释吉凶休咎的征兆。这些卦辞和爻辞的文字极简单，但十分隐晦难懂。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竟把拴系竹简的皮绳磨断了三次，足见其用心用功。简言之，《易经》这部书的内容，既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自然现象，也夹有宗教迷信成分。

《春秋经》，是一部编年的历史。原为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当时还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齐之《春秋》。经孔子对鲁《春秋》加工修改后，《春秋》才变为专名，成为六经之一的《春秋经》。《春秋经》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的历史。内容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灾异等多方面资料，共1232条。后人解释《春秋经》，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合称“三传”。《春秋经》是有系统的史籍，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六经是孔子私学的主要课程。孔子教学内容中也可能有军事方面知识，但缺乏生产知识。

（4）关于道德教育

孔子重视道德教育，把对学生的道德培养放在首位。他在长达40多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自己系统的道德教育思想。今天，我们在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时应该重视他对道德教育的理论贡献，看到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对当前德育工作的指导作用。我们在这里，着重介绍孔子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实施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君子”或君子儒”，对这样人的要求标准是能够去从政。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孔子认为使之能够成为一个从政的君子，主要条件应该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修养。所以，孔子在教育学生时，始终把道德教育摆在首位。他在处理德育与智育关系上，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道德观念要以文化知识为基础，并通过知识传授来进行，知识教育要为道德教育服务。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这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君子或君子儒，应具备仁、智、信、直、勇、刚六种道德品质。这些道德品质的形成，

《韶》，舜时的乐曲名；《武》，周武王时的乐曲名。

应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教育，要以知识学习为基础，才能具备好的道德品质。否则，就会出现偏向，产生愚、荡、贼、绞、乱、狂不良行为现象。道德行为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作指导，就会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孔子强调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教育，说明了德育和智育内在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孔子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他以“仁”为道德的最高准则，以“礼”为道德规范，来实施道德教育。仁和礼的关系，仁是内容，礼是形式，只有两者统一起来，才能达到道德教育目的。孔子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对此是十分重视的。

“仁”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中心，也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内容。春秋时代，孔子首先把“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宣传，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时期对人的重视，这是历史的进步。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多次谈到有关“仁”的问题，论“仁”的次数也最多。范文澜先生说：“《论语》记载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据杨伯峻先生的统计约有104次，匡亚明先生统计有109次，陈元晖先生在批点李埏《论语传注》时数到了51次之多。从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说明“仁”是在《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属于道德教育方面的词，这是为大家所承认共识的。

孔子所说的“仁”，根据《论语》里论述“仁”的材料，归纳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仁”者的内容含义就是“爱人”。《论语·颜渊》篇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为“仁”，仁就是做人的道理，就是爱或同情心，把人作人来爱。《礼记·中庸》篇上也说：“仁者，人也”。都是在说仁的基本内容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孔子提倡“爱人”是有等次的，并不是不区分善恶，而普遍地爱一切人。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只有仁人才能做到对那些人应当爱，对那些人应当恶；所爱的是否应当爱，所恶的是否应当恶。因为仁人所喜爱厌恶的标准是正确的。由此看来，孔子是以仁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准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人是有所爱也是有所憎的，是在承认阶级统治条件下来谈“仁”的。

孔子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为了真正实现“仁”的教育，他把忠和孝两项道德规范作为“仁”的教育根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在家孝顺父母，出外便敬爱兄长。他的弟子有若也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爱人”为起点，首先从调整家庭内部间的关系开始，进而扩大到国家社会。这样，以“孝”尊敬父母，维护和巩固宗法家长制度；以“忠”尽心尽力诚实负责，以事父母之心而事君事臣，成为国家的忠臣贤相。这种以忠孝为“仁”的根本教育，在以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被利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

孔子进行道德教育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礼”。象重视“仁”一样，孔子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又特别强调“礼”。仁主要是主观的修养和教化，礼则是客观的楷模和制度。具体说来，礼指一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诸如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这些是礼的根本。根据这些所谓固定不可变的

根本制定礼制，确立人们的关系和个人应受的约束，使其守本分不逾越。孔子把“礼”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所以他非常重视“礼”，重视对学生进行“礼”的教育。

我国“礼”的起源和发展很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积累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可以认为就是最早的“礼”，它具有调整氏族内部的关系作用。如氏族成员中存在的“冠礼”可能就是一切“礼”的开端，其作用在“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礼记·冠义》）。孔子在谈到夏代到西周时期礼的发展过程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夏、商、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了西周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典章制度，成为调整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用它来定亲疏、别贵贱、决嫌疑、明是非。孔子在西周“礼”的基础上，又进行损益，提出了包括各种规章制度和生活礼节礼仪的封建之“礼”。他教育要求学生学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学礼或学不好礼，是无法在社会中站住的。学礼就要做到一切视听言动都符合礼的规范，努力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孔子把“仁”和“礼”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他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还摸索出进行道德教育的规律和法则，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道德教育原则，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几个主要原则和方法：

立志学道

孔子十分强调和重视人的立志。所谓立志就是每个人要确立人生目的和树立远大的理想。孔子本人从自己做起，15岁就开始有志于学问，成为弟子们和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经常教育学生，和他们讨论确立个人志向。有一次，孔子对颜渊、子路说：“你们何不说说自己个人的志向？”子路回答：“我愿意把车马衣服拿出来和朋友共同使用，即使用坏了也决没有什么怨言。”颜渊说：“我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也不表白自己的成绩。”子路接着问老师：“我们希望听到老师您的志向！”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让老年人安逸、让朋友信任，让年轻人怀念”。孔子就是这样引导学生向“仁”道方向修养提高自己。他还对学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他用生动的比喻教导学生立下坚定意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和学生们的这些谈话内容，都说明了他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对一个人的立志问题是很重视的。

孔子教育学生要立志，究竟应立什么样的志向？在他看来，这个志就是“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君子学道”（《论语·阳货》），然后达到乐道的精神境界，这说明只有道才是他理想的志向。这个“道”的意义是什么呢？从孔子关于道德教育言论中，我们理解是指他所讲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即道德教育主要内容“仁”和“礼”。志道、学道和乐道都是围绕“仁”道这个中心展开活动的。为了实现这个“道”的理想和信念，一个人应该有一种为此而献身的精神，做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为了实现仁道的志向，孔子教育学生正确处理长远理想和眼前利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他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告诫人们处理好长远和眼前的关系，为了实现大目标要能够

牺牲眼前的利益，更不能追求和贪图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动摇自己的志向。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要做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他称赞颜渊极有修养和安贫乐道的精神，说他“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把思想和精神都用在学道和守道上，面对清苦的生活不去计较。

孔子在立志学道方面，还重视恒心和百折不挠精神的陶冶。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锻炼和经得起各种考验，才可达到立志过程的最高阶段，实现远大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孔子教育学生应当象松柏那样经得起严寒的考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要求学生锻炼意志坚贞不移，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内省自克

内省和自克是孔子提倡的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内省”也叫“自省”，或称“自论”，意思都是相近的。所谓内省自克，就是要求对个人的言语行动不断进行自我省察，并以仁道的标准来约束克制自己。这一培养道德的方法，经后代儒家继承，特别是宋明时期理学家的的发展，成为封建道德修养的主要手段。

人生活和工作在社会中，如何处理好周围的人际关系，正确估计自己和对待他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孔子在进行道德教育时，要求学生内省，强调从自我做起，培养道德的自觉。他说：“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里仁》）。这是对内省提出的要求，意思是说看到贤者就应当想到向他学习看齐，而见到不贤的人就应反省自己，有没有同他一样的毛病。孔子教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他以为，一个人如果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就会避免和减少与他人的怨恨。当和别人发生矛盾，他要求“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在自身找错误和缺点，使之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公认道德规范准则。孔子提出道德教育贵在自省自觉，并不是让人们“闭门思过”、“闭门修养”，而是以理论和实践对照检查个人的内心世界和言语行动。孔子的学生曾参，每天都多次反省自己：替人办事没有尽心尽力吗？和朋友交往不诚实吗？老师传授的学业没有努力去复习吗？可谓儒家善于内省的典型，至今传为道德修养的佳话。

孔子提倡“内省”，又要学生“自克”。据《尔雅释诂》训为胜，引申为约。社会的公共道德准则和规范，对每个人来讲，都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所以，需要人人遇事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来维护公共道德和社会秩序。孔子对学生说：“克己复礼为仁”，意谓一个人如果能克制自己使其言行合乎“礼”，那么就是达到了“仁”这一道德最高标准。

概括说来，孔子倡导的内省自克，重视培养道德的自觉性，作为一种道德修养的方法，包含了合理的因素。今天，我们的德育工作，仍然需要重视和调动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不断增强道德品质的修养。

力行慎言

力行慎言指身体力行，知行统一和言行一致。孔子提倡力行慎言，说明他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更为重视道德实践。

孔子关于力行慎言的论述，在《论语》中是有不少的记载。例如，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又讲：“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

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这里的“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和“耻其言而过其行”，都说明孔子教育和影响他的学生要注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多干实际事，少说空话和大话。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防止言行脱节。

孔子在教育实践中，考察学生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样做，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在他的影响下，孔门弟子多数重视道德实践，子路就是其中勇于力行的代表。“子路无宿诺”语，就是说子路做事从不拖延诺言，一定如时履行。总之，在道德教育中，孔子要求力行慎言，尤为强调身体力行，这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特点，应该成为道德修养的一项重要原则。

改过迁善

道德教育或者说道德修养，实际上是人们改正缺点、发扬优点，不断完善个人道德品质的过程。通常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是讲社会上完美无缺的人是罕见的，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优点和缺点。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对待缺点和错误。

孔子认为，有的人在出现缺点和错误时不去正视它，相反，文过饰非加以掩饰。学生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表述了孔子这一想法。还有一种人，有了错误和缺点就及时改正，“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光明正大决心改正，“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孔子重视教育学生应采取“过，则无惮改”这样的积极态度。学生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一个人有过即改如日月恢复光辉，他就会受到人们仰望和尊敬。

总之，孔子重视道德教育，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服务。他以“仁”和“礼”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由培养“君子”和“君子儒”目标所决定。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和原则，立志学道、内省自克、力行慎言、改过迁善，反映了道德教育的一般规律。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中华民族道德的形成，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时，对于如何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仍有借鉴之处，是需要批判地继承。

（5）论教学和教师

孔子关于教学的思想，是他长期从事教学实践活动的结晶，也是其整个教育思想中富有光彩的地方，他的教学思想相当丰富，特别是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的论述，是符合教学的客观规律的。这些教学原则和方法，可资继承和借鉴之处很多。我们归纳为：

学思结合并重。孔子提倡学习，重视学习。他的学习态度是采取“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论语·为政》），自己要多听多看随时发现问题，并且有存疑的精神而不盲目轻信。还提出：“四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的原则，教人勿妄自意度、勿独断、勿固执、勿自以为是，这在思维教学中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些都已成为孔子当时和后世人们对待学习应采取的科学态度的格言。

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强调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学习与思考并重，并且要以学为主。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概括地说明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学习时如果不积极地进行思考，只是读书满足于记忆一些知识，就不会抓住事物的本质。而思考若不以学习为基础吸收实际知识，也就会产生心中疑惑流于空想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忽视学与思的结合，单纯的学习或思考，都会产生片面性。

孔子还以自己个人的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告诫学生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强调学在前、思在后，学而后思。他在要求处理好学思关系的同时，还具体提出作为所谓君子事事处处都应该运用思考。他提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学思结合并重，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中，他是以学习为基础，在思考中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因材施教育人。孔子教育学生注意因材施教，形成了一条重要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在我国教育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位最早贯彻“因材施教”原则的教育家。

孔子通过观察、问答，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论语》里保存了不少有关评论学生性格特点的记录。但“因材施教”这四个字并非出自孔子本人之口。南宋教育家朱熹概括了孔子因人而异的教学方法，在《论语集注》内提出了“夫子教人，各因其材”的概念。这就是“因材施教”教学名言的最初的由来。孔子在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中，能够因材施教，充分体现了这个原则，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

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首要的前提条件是了解学生的特点，承认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施教。孔子在了解学生的过程中，经常采用的办法是观察法和谈话法。他考察学生的方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通过谈话来了解学生的立志问题。通过观察和谈话，他用精炼的语言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优点和缺点，比如他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论语·先进》）。孔子既看到了学生品格的优点，也发现了他们的缺点，并能作出恰当的评价，反映出他对学生情况的熟悉。孔子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按照不同的情况因材施教，栽者培之、倾者复之，或因学生的能力而加以相当的培植，或因他们的缺点而施以适当地补救。

孔子从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和个性的特点来进行教学。《论语·先进》篇上记载了这样一件典型的事例，大意是：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个很好的主张，就马上付诸行动吗？”孔子回答：“家里有父亲兄长，怎么能够听了就擅自主张去实行呢？”冉求也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孔子却回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去行动”。公西华对老师就一个问题两种答复，很是困惑不理解。孔子解释说：“冉求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而仲由勇于作为，所以我要压压他使之谨慎”。这个故事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具体作法。又例如：学生同样问“仁”，而孔子所答不同；同样问“孝”，而所答不同；同样问“行”，而所答不同，都表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精神。孔子这样重视学生个性而因材施教，这是他教学成功的要诀，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教育教学艺术。

启发思维诱导。和学思结合并重的原则相联系，孔子提出了启发思维诱导原则，这是他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启发教学主要精神特点是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和调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地利用学生已有的求知动机进行诱导。这样，教学会自然收到良好效果。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记载于《论语·述而》篇中。在我国教育史上，孔子首次提出了启发式教学原则。今天，我们常说的“启发”一词和“举一反三”的成语都是渊源于此。对孔子所讲的，宋儒朱熹曾作了比较深刻的解释，后人学者一般也沿用此说。按照朱熹的注解：“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和孔子原话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就是说当学生还没有愤悱的表情时，先应当诱导学生思维，引起学生的愤与悱。而当学生进入积极思维状态时，教师才要适时地给予启发，帮助学生端正思维的方向，使他“通其意”、“达其辞”，这样的启发才有效果。比如一个四方的东西让学生认识，老师已经举出一个角的样子对他讲清楚了，但这个学生还不能类推其它三个角的情况来互相证明，这个时候就得暂时搁置，不必再给他讲解了。如果教师还继续唠叨地讲下去，就很难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换一种说法就是启发思维是不能越俎代庖或强行灌注的。孔子说的“不复也”和他一贯主张的“诲人不倦”并不矛盾，只是怎样更好地取得教学的效果。

孔子在教学中运用启发式教学，《论语·八佾》篇内记载的“子夏礼后之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次，学生子夏读诗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口颊含笑的脸多么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多么媚呀，洁白的底子上面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啊？孔子知子夏的疑点，在“素以为绚兮”，故启发回答说：“绘事后素”，意即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施五彩作画。人有了倩盼之美质，然后可以修饰打扮。子夏领悟到孔子是讲“礼”要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但他对这个想法还不敢肯定，处于心愤愤口悱悱的状态，于是进一步问孔子：“礼后乎”（是说礼在后吧）？孔子听了很高兴，赞扬子夏：“卜商呀，你能够阐发我的意思，是能启发我的人”，我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子夏读的是《诗经·卫风·硕人》篇，这首诗的原意姑且不去谈它，但从教学方法的角度研究，孔子和子夏的问答对话，孔子运用了启发式进行教学。孔子利用形象思维，从生动而具体的画面，将学生引向抽象道德观念，让学生主动地去认识“仁”和“礼”的关系和意义。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孔子启发教育学生，还看到了师生之间，也是能够相互启发的。

孔子教学善用启发形式，受到弟子们的广泛称赞。学生颜回感叹老师的道德学问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形象而深刻地描绘了孔子启发教学的情景，赞美了孔子学问的伟大，启发式教育教学方法的成功。孔子教学给学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的启发式教学法不仅在中国是为首创，而且在世界

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1—122页。

卜商，即子夏，孔子的学生，姓卜名商，字子夏。

文化教育史上也是领先的，比西方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教学法还要早。

温故知新为师。孔子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新旧知识的联系，他提出了“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矣”的命题。这一教学原则的含义，是指在温习旧知识的基础上，去探求获得新知识。巩固旧知识和探索新知识，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有机的联系，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实际上，人们的认识是在不断温故知新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

孔子认为，要做一个老师，不仅要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还要有自己的新的体会和新的发现，具备了这种创造性的劳动能力以后才可以做一名老师。教师肩负着传授社会生产经验和人们生活经验知识的使命。因此，教师在自己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既要注意继承人类的文化遗产，还要不断探索创新开拓新的知识的领域。

以上所述，是孔子在教学方面的几个主要原则，这并不意味孔子在当时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原则，有的原则就是后人概括的，如“因材施教”。但孔子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成功的教学实践，涉及到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蕴含了这样的教学原则体系，体现出了这些教学原则，与认识过程中某些规律相暗合，遂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学的珍贵遗产。

孔子是教育家。他一生辛勤执教，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被后世誉为“万世师表”。孔子有关论述教师和对教师的要求的言论很多，概括叙述在下面。

孔子热爱教育事业，他一辈子都在勤奋学习，一辈子都在教书育人。孔子有一句名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教师，为了教好学生，首先自己必须先学好，学好是教好的基础和前提，否则头脑空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记·学记》）。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必须有一桶水，很通俗地表达了这个道理。

孔子对自己的要求是“学而不厌”，一生从未停止过学习。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是说他个人不是不经过学习而就有了知识，对于历代文化的喜欢，是勤奋敏捷地去追求。当学生子贡称赞自己的老师“夫子圣矣乎？”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吗？孔子却谦虚地回答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圣人，我做不到，我自己不过是对于学习不知厌倦，而教人时不嫌疲劳罢了）。还有一次，孔子和学生公西华讨论“圣”与“仁”的问题，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这意思说，讲到圣和仁，我是不敢当起的；我不过是学习和工作总不感到厌倦，教人时总不知疲倦，也只就是如此如此罢了。公西华听了感叹地说：“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这可正是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所学不到的啊！）从孔子和学生子贡、公西华的无拘束谈话，可见出孔子的学而不厌的精神及其对学生的影响。

孔子学而不厌，还表现他能够随时随地地向人请教，他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拜他人为师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论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公孙丑上》。

《论语·述而》。

《论语·述而》。

语·述而》)。孔子15岁有志于学问，好学不厌直到晚年。他的为学真可谓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地步。

孔子对学生和他人，以高度的责任心要求自己，树立了“诲人不倦”的榜样。他“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向他学习，他都给予教诲。“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在教学中不论什么环境和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都能坚持继续教学工作。孔子到了宋国，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被围困陈、蔡时，不得行，绝粮七日，跟随的弟子病倒而不能起，但他仍讲诵弦歌不衰。这些正表现出了教师应有的诲人不倦的可贵品质和忠于教育事业的高尚的精神。

孔子关心学生、热爱学生，并以身作则去身体力行，给学生树立了楷模和表率。这是他教育教学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教师只有热爱自己的学生，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满腔热情地去培养和教育他们，才会赢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他为学生闵子骞、子路、冉有、子贡的表现，从内心深处感到高兴。冉伯牛患了重病，他十分难过并亲自去看望。颜回死了，他悲痛已极哭得伤心。孔子对于年轻一代，寄予了无限的厚望。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也？”（《论语·子罕》）（青年一代是可敬畏的，怎能断定他们今后赶不上现在的人呢？）这表现出孔子相信学生可以超过老师，青年人可以越过老年人的进步发展的可贵思想。

孔子重视教师的言教和身教，认为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对学生会更有说服力和示范感化的作用。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意思是说：教师自己作风端正，如通命令下达一样，学生不令而行；反之，虽然下达了命令，学生也不愿意听从。作为一个教师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树立起好的榜样，又怎能去教育端正他人呢？正人先正己。孔子精辟地说明了一个教师以身作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说明了为人为学的一个基本准则。

孔子从事教育事业的专业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毫无保留的态度，为后人树立了做好教师的光辉的典范形象。这些都是值得敬佩的。

综上所述五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孔子在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因为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了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在长期的教育教学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关于孔子，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得好：“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

3. 墨子、孟子、荀子和韩非教育思想特点评介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纷起、百家争鸣，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活跃的局面。“诸子”是指各家学派，“百家”也是一个形容词，谓学派之多。上述，我们重点阐述了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除孔子以外，当时有代表性的著名教育家还有墨子、孟子、荀子

和韩非等。至于这几位教育家的具体情况，本书由于受到篇幅字数的限制，故不能详细全面地展开。在这里，我们仅就他们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分别加以评介如下。

（1）墨子及其教育思想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著名学派，同儒家学派被并称之为“显学”。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足见其墨家学派在那时的声势雄风。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名翟，春秋末期鲁国人，曾为宋国大夫，他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考，现在一般人认为，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墨子出身低下，精于工艺善于制造车械，常自称为“贱人”。墨子创立了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墨子·尚贤》）利益的墨家学派。墨家学派的私学规模也比较大，似同孔门“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情欲》）。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多以裘褐为衣，以跣踣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具有吃苦耐劳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墨子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奔走游历于鲁、宋、楚、齐等国，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和不良习俗，提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的十项主张。这些内容有进步的方面，也有落后的成份。其中兼爱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内容。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分离为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关于墨子及其学派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大都记录保存在《墨子》之中。

《墨子》一书就当时有关社会和生产的重要知识，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总结，基本上保存了墨家的全部学说，是研究墨子和墨家思想的基本材料。墨子的教育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重视教育倡“染丝说”。墨子重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看到教育对社会安定所起的影响。他认为，治理国家重在统一思想，提倡“尚同”以一同天下之义，使之有共同的是非标准，这样才能达到求治的目的。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推行教育。他企图用“上说下教”的办法来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建设一个平等兼爱的社会，所以到处去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墨子提出“染丝说”，说明社会环境和教育对于人性形成的作用影响。他认为，人性如“素丝”，本来并没有善恶之分，完全是后天的环境和教育影响才产生了善恶之别。他以染素丝为例，说明比喻一个人品质在受环境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墨子在一次看见染素丝的时候，很有感慨地说：“染于苍则苍（青），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毕）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墨子·所染》）墨子以染丝相比，说明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应该说这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但墨子又有夸大环境在人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人处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在改造客观环境中，既受环境作用的影响，又在能动地改造着客观世界。

教育目的培养“兼士”。墨子从实现“兼爱”的政治理想出发，提出教育的目的要培养“兼士”，或者叫做“贤士”，以承担起治国利民、兼爱相利的职责，成为“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

墨子认为，“兼士”应该具备这样的品质，即“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墨子·兼爱》）。这就是要求兼士把他人看或自己，把别人的家庭看成个人的家庭，把别人的国家看成自己的国家。而对于那种只想自己、不顾别人、自私自立的人，墨家称之为“别士”。除品德标准之外，墨子要求兼士善于辞令能言善辩，还要通晓治国的道理方法和掌握实用的技术。

墨子培养兼士的思想，反映了劳动者要求互相帮助共渡难关的美好愿望，这是墨家学派的基本精神。

注重科学技术教育。儒家学派重视诗书礼乐的教育，墨家学派在强调“相利、相爱”的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在智育教育中注重科学技术教育，并以此为教育内容传授给学生，培养造就科技人才，这是墨家学派教育内容的特点。

墨子精通工艺，善于器械制造。他的高超的技术可以和当时著名的巧匠鲁班（公输般）并相媲美。《墨子·公输》上记载了墨子止楚攻宋这样一个故事，内容大意是：公输般为楚国造了一种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马上从鲁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来到楚国都城郢，劝阻他们取消攻宋的计划。楚国当时自恃兵强器精，可以不费力气地打败宋国，不愿意放弃攻打宋国的打算。墨子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执意要去攻打宋国，恐怕也不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已经派人带着器械守城去了，你们制造的云梯没有用。当场在楚王面前与公输般比赛攻城与守城的技术，公输般使出九种攻城器械，墨子也使出九种守城器械对付他，使公输般的攻城武器都不能生效，结果公输般失败，终于迫使楚王停止攻宋。这一故事说明了墨子有很高的技艺。

在《墨子》一书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等篇中，记载着许多有关几何学、力学和光学的科学知识，这些材料的内容不少是与近现代科学原理相近的。例如，几何学方面，关于点、线、面、体的研究；力学方面，关于杠杆、天平、秤、滑车、斜面的研究；光学方面，关于光线的进行、阴影、倒影、平面镜、凹凸面镜的原理研究。墨子和他的学生做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的实验，并成功地解释了小孔倒像的原理，指出：“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墨子·经说下》），证明了光线传播的原理。

墨家学派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同时，也积极提倡劳动教育，把劳动教育作为对学生教育的内容之一。墨子主张社会成员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并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他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鞮、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人人如能各尽其所能，社会生产才能发展。他还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号召人们必须从事劳动，有力相劳努力自强，用劳动创造自己的生活环境。

关于教育原则方法。墨家学派和儒家学派相比，在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上，虽不是那么系统完整，但有自己学派的特点，值得研究探讨。

主动强说 墨子教人提倡积极主动精神，采取“强说人”、“行说人”的教学态度和方法。他说：“不强说人，人莫之知”（《墨子·公孟》），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去“行说人”，送教上门。并认为，“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公孟》）墨子教人强说行说，和孔子教人“诲人不倦”，都表现出了作为教育者应有的高度责任感和热忱的精神，墨子教育学生在强说和行说的过程中，注意目的性和针对性。一次，

墨子率领学生游说诸国，学生魏越问他：“到一个国家见到四方之君，应先说些什么呢？”墨子回答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熏音湛涵，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这即是要求学生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根据不同的对象，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回答不同的内容。若专就对学生来说，也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述而且作 墨子主张述而且作，教育学生具备创造和创新的精神。他反对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即阐述而不作，相信古代文化的那种保守态度。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这意思是说，应该继承古代文化中善的东西，还要创造出新的东西，使善的东西越来越多。他提倡养成分析研究的精神，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对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他常用“何自”、“是何故也”、“何以为”、“将奈何哉”、“何以知之”、“然则我何欲何恶”等这些词语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这是墨子教学思想中很有价值的地方。

察类明故 意谓通过对事物的类比，善于去寻绎探明事物的原理。墨子重视“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教育方法，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他说：“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墨子·非攻》）。教育学生根据已知推测未知，根据明显的现象推知隐微含义，比如他的“三表法”就是这样。所谓“三表法”，首先是历史根据，“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其次是他人的经验“下原察（察度）百姓耳目之实”；最后是合乎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据此作为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检验认识的标准和实践后判断是非的根据。这是合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

学必量力 墨子从学生的实际和特点出发，强调“学必量力”专心学习，这种教学思想也是十分可贵的。有一次，墨子的几个学生在求学时向他请教学射。墨子说：“不可以，聪明的人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从事学习做事。战士在疆场上一边要打仗，一边要扶助他人，尚且办不到，你们现在不是战士，怎么能同时既要学成学业又要学成射箭技术呢！”他还针对能力不同的学生，按照他们程度的深浅，分别进行教学。他说：“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墨子·大取》）。这就是说，对于程度高的，能力强的学生，要教深一点，应增加内容就增加；相反，学生水平比较低的，则教浅一些，应减少的地方就减少，做到学生能力所及易于接受。

墨子是一位重视躬行实践的教育家。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包含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他在教育和教学方面，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尤其是以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培养教育学生，是很有特点的。

（2）孟子及其教育思想

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其中“孟氏之儒”是儒家学派当中一个重要学派，代表人物就是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 372—前 289 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

(今山东省邹县)人。他是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其父早逝,母亲仇氏教子有方。“孟母三迁”和“断织劝学”的故事,反映了孟子少年时代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崇拜孔子,自谓:“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后世把孔子和孟子并称,他们的思想学说合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为了推行他的行“仁政”实现全国统一的政治思想主张,也曾率领弟子到过齐、梁、宋、魏、滕等国,并列名齐国稷下学宫,受到各诸侯国的礼遇。但各国君主认为,孟子学说“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列传》),不合时宜多不采纳。孟子根据重民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响亮口号,两千多年来鼓舞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权而斗争,成为封建时代可宝贵的一种政治理论。孟子对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大师,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是战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热爱教育工作,提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的教育观点,给后世以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把“教”和“育”二字联用,组成为“教育”一词的来源。孟子把得到培养天下优秀人材看作是人生一大乐趣。他的学生很多,著名的弟子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孟子晚年,和孔子一样返回故里,专心著述讲学。《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思想学说和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孟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可以归纳为:

“性善论”和论教育作用。孟子提出“性善论”,作为构筑他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人性生来就是善的,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这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是四种道德的萌芽,称之为“四端”。而这四端发展起来就成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称之为“四德”。在孟子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能否发挥自己的人性本质。它一经探求,便会得到;一加放弃,便会失去。

孟子从“性善论”的观点出发,论证了教育在人性发展上的作用。他认为,人生来既然有四种道德的善端,那么教育的作用则在于收回原有的善性,去扩充善端。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学问之道不是别的,就是把丧失的那善良之心找回来就是了,这就是教育在人性形成发展上的作用。孟子根据“性善论”,以为圣人和贤人是把人所固有的善端加以扩充完善的结果,从而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观点。

孟子重视教育对人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看到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比政治有时还显得重要,实行仁政的过程也可以看作就是教育。孟子是这样看待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德的语言却赶不过仁德的音乐能打动人心,良好的政治赶不上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心。好的政治,百姓害怕;好的教育,百姓热爱。良好的政治得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可以获得民心。这样,就肯定了教育对社会国家的作用意义。

培养“明人伦”的君子。孟子总结了古代兴办学校,特别是夏、商、周三代的教育经验,明确地提出了教育目的为“明人伦”,培养“明人伦”

的君子或统治人才。

孟子教以人伦，明人伦的具体内容，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意思是说，父子之间要有骨肉之亲，君臣上下应有礼义之道，夫妻挚爱而内外有别，长者晚辈分尊卑之序，朋友相处讲求诚信。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的准则，被后世人们概括为人的道德的“五伦”。应该承认，在中国封建时代明确提出封建宗法道德的五伦关系是从孟子开始的。

根据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孟子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成为他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主张教育的整个内容和全部过程就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办好学校教育，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至于自然科学知识则是不被重视的。孟子教学以《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经为主要教材，这在《孟子》一书中是多处可见的，其中尤以引讲《诗经》和《书经》的内容的地方很多，常言“诗云”、“书曰”语。以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开端于孔子，中经孟子发展完善，此后形成儒家教育的中心内容和主要特点，极大地规划和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教育。

关于学习与教学。孟子在长期从事教育实践的活动中，对学生如何学习和教师怎样进行教育教学，积累总结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在学习方面，孟子认为有四种主要的学习方法。其一，深造自得。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强调学习要有主动的精神，依靠自己自求自得苦心研究，才能够活用到实际上面，使知识达到“自得”境界。这样，一个人在处理和解决事物时，就可能操持自如，左右逢源默识心通。反之，被动的学习都是外铄的肤浅的知识，心中必无所得，学了等于没学没有收获。其二，专心致志。孟子重视学习的专心致志，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他以国手奕秋教两个学生学棋为例，生动地说明专心学习的重要。其中一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话；另一人表面听讲，心里却在想着有只天鹅快要飞来，想拿弓箭去射它。两个学生虽在一起学习，但结果后者不如前者有收获，究其原因是一专心与不专心的关系。学习不仅要专一，还要持之以恒，一曝十寒也是难以成功的。其三，循序渐进。孟子认为学习是有一定的步骤，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应该循序渐进，所谓“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象流水似地顺序前进。相反，如果不按照程序，“其进锐者，其退速”（《孟子·尽心上》），前进太猛后退也快，会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反对“揠苗助长”。其四，由博反约。孟子还总结出由博而约的学习方法。他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这是说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返回到概括地述说中心大意的地步。这可以说是一种学习的归纳法。

在教学方面，孟子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五种主要教学方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从这段话来看，孟子教学的主要特点是根据学生程度个性和所处的地位来因材施教。对程度高的学生来说，只需要加一番点化之功，如同雨露润泽草木一般；对那些学力较差的学生，如果是品德稳重，就针对完成他的德性；若是有天资聪颖，就去培养发展他的才能；对一般的学生要答其所问，排其所难解其所惑，随问随答就可以了；对不能口授的学生，则采取“私淑弟子”间

接的方法去教育。孟子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灵知性，值得我们学习思考。

道德修养和意志锻炼。孟子从“性善论”的人性观点出发，基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他很重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意志锻炼。在道德修养方面，他和孔子一样十分注意立志和树立理想，强调“尚志”和“持志”。他认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就是“反求诸己”，作自我反省严格要求自己。他曾这样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道德修养的关键贵在自觉，自觉为善自觉拒恶。他还认为一个人的祸福，都取决于本人的行动。“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自求多福”（《孟子·公孙丑上》）。他援引《尚书·太甲》的话告诫人们：“自作孽，不可活。”在道德修养上，孟子要求人们改过迁善、闻过则喜、与人为善，还列举圣人贤者为例作为学习的楷模，如谓：“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

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孟子特别重视意志的锻炼。关于一个人的意志锻炼，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孟子认为，一个人经过这种艰苦环境磨炼之后，才能增长才干，具备坚强的性格，去担负治理天下的重任。他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提出的“大丈夫”的概念和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影响和激励的作用。对此，冯友兰先生评价说：“懂得了这个词汇，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3）荀子及其教育思想

荀子，名况，字卿。生卒年不详，约在公元前298—前238年。战国后期赵国人。他的家世和青年时代的情况，由于资料缺乏尚不清楚。中年以后，曾经东到齐国，西至秦国，后南游楚国。他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在众多学者中“最为老师”，曾三次被推为学宫的“祭酒”。荀子以当时知识界的出色人物，在楚国被春申君两次派作兰陵（今山东峄县）令。春申君死后，荀况也被罢官，他遂潜心著述讲学，著书数万言，至终老于兰陵。代表著作有《荀子》一书，凡20卷，32篇。

荀子在政治上，主张法后王，用礼、法和术来维持社会秩序，对以后的法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荀子是一位朴素的唯物论者。他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反对迷信，否定鬼神，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和“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这种人定胜天的积极思想，是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反映。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对先秦诸子学说作了全面深刻地批判和总结，是先秦儒家中最后的一位大师。在教育思想和理论方面，他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概括如下：

性恶论和论教育作用。荀子以性为恶主张“性恶论”，这是荀子学说

和孟子思想不同的突出特点。荀子在他写的《性恶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讲：“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明确地提出了人性恶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的本性原来就是恶的，人之所以能为善，是靠后来的努力所为，由于学了礼义而懂了礼义，恶性也就转变为善性了。他以为人生而有欲，有欲必争夺，并且在人性中生而就具有“好利”、“疾恶”、“好声色”等不好的情欲，所以人性是恶的。这种说法和孟子讲的人性善，从本质来说都是唯心主义的。但是，荀子人性论思想中所包含的“善者伪也”的思想，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

在教育方面，荀子特别重视教育的力量，认为教育可以起到“化性起伪”的作用，甚至人的贵贱、智愚、贫富都可看作是教育的结果。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惟学乎！”（《荀子·儒效》）荀子在论证教育作用时，以环境对自然物影响为例，来说明客观环境对人成长的作用。他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环境和教育相比较，他以为教育的作用更大。他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劝学》）。这意思说，无论是南方的吴、越，还是北方的夷、貉，他们子女出生时哭声相同，长大以后习俗言语却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教使之然也”，是教育造成的。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荀子强调人的不断努力，他把这种主观作用称之为“积”。

荀子在重视教育对人性发展过程起的作用同时，也注意看到教育对社会的作用，把教育看作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他说：“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犯）也？”（《荀子·强国》）。荀子认为，教育可以统一人民的思想，使他们协调行动步调一致，达到巩固强大国家的目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战国后期社会走向统一历史发展趋势的反映，但他过高地估计了教育的作用。

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荀子提出以培养士、君子和圣人作为教育的目标，而学为圣人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又说：“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儒效》）“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荀子·礼论》）。从这些话来看，反映出荀子从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着想，要求教育目的是培养由士、君子到圣人的治国理政的各级各种治术人才。

根据“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的教育目的，荀子具体规划了施教的内容：诵习《诗》、《书》、《礼》、《乐》、《春秋》，指出：“《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他认为，当时儒家之书包含了天下学问的全部内容，学好了《诗》、《书》、《礼》、《乐》、《春秋》，学问就有了基础。此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儒家经书作为对人进行教育的基本内容，荀子在初始的奠基作用是应予以肯定的。

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荀子所著的《劝学篇》，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教育论文，他用儒家观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教育问题，给我国文化教育史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劝学篇》列为《荀子》一书的首篇，文中阐明了教育和

环境对人和发展的作用，规定了教育目的和内容，揭示了教学原则和方法，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尊师近师的主张。现在，我们把荀子在《劝学》、《解蔽》、《儒效》等篇中，论及培养学生学习态度和在学习方法，择其要点内容归纳为下述几条：

立志有恒 《劝学篇》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就指出了学习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劝学鼓励人们去学习。荀子同样重视人的立志问题，要求人确立“冥冥之志”，树立精诚专一于学的信念。他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劝学》）。这意思是说，若没有专心致志精神的人，在学习上就难以取得进步成绩；若不能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人，也很难于做出一番出色的事业。志向确立之后，学习还要贵在有恒，要有刻苦努力坚持不懈的精神。荀子以雕刻为例，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断；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学》）。这些话流传下来，已成为人们在工作和学习时，严格要求自己的著名格言。

虚心专一 荀子在《解蔽篇》中指出：在学习和求取知识的过程中，要有“虚壹而静”的学习态度。“虚”就是虚心，“不以所已臧（藏），害所将受”，不要以先入之见或已有的习惯妨害接受别人的意见或者新知识。“壹”就是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学习时用心专一，不一心两用。“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劝学》），在同一个时间内，集中注意一件事情效果比较好些。“静”就是静心，“不以梦剧乱知”，学习和思维不要做没有根据的想象，也不要受剧烈感情波动的影响，心情镇静有利于学习和思考认清事物。

善假于物 荀子教育学生在在学习过程中，还要善于利用前人总结的知识经验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不断创新。他说，借助于车马行走的人，并非是他们善于走路，却能远行千里；借助于舟船渡水的人，并非是他们擅长游泳，却能横渡江河。君子的天性和普通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善于借助和利用外物罢了。荀子认为，一个人善不善学会利用客观条件和已有的工具，对他的学习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善于借助客观条件，就会比不善于借助外物的人，学习进步会快会大些。他教育学生，一要“学莫便乎近其人”，简捷的方法和直接的途径是向你崇敬的人学习；二要“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居住要选择乡邻，交游要接近贤士，多从良师益友处获取教益，避免不良习俗的浸染。

学以致用 荀子对于学习的过程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劝学》）从这段话来看，荀子是把学习过程分为四步进行的：首先，“入乎耳”，这是通过感觉器官接受外界的刺激，从而获得所谓感性知识；其次，“箸乎心”，这是把接受的外部刺激，即感性认识在头脑中加工而成所谓理性认识；第三，“布乎四体”，这是由脑神经发布命令，传至身体的各个部位；最后，“形乎动静”，这是身体各部位按着神经号令，表示出反应的动作。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闻、见、知、行四个学习环节，即“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学习的过程从“闻之”、“见之”到“知之”，最后到“行之”学以致用，才算结束完成。荀子关于学习过程和学以致用的认识，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这些见解是可贵的。

重视教师的作用和地位。在先秦诸子中，竭力提倡隆师尊师，重视教师的作用和地位，这是荀子教育思想的特色。

荀子在《修身篇》中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他认为良师益友是求学的助力，所以把师友的作用看得很重要。在工作和学习中，良师益友不仅可以教人以知识，还能以人格身教感化育人。在荀子看来，教师是礼义的化身，他把教师看得比礼还重要。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修身》）充分肯定了教师在改变人的本性使之合乎礼义的过程中所起的楷模作用。

关于教师的地位，荀子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明确地将教师与天地君亲相提并重，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了极点。他这样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礼论》）将教师看作为治国之本。所以，荀子又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高度重视教师，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事。

荀子重视教师的作用和地位，也给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基本条件。这就是：“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荀子·致仕》）。一个称职的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还应具备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条件，即教师要有尊严使人敬服；教师要有崇高的信仰和丰富的经验；教师讲诵经典能循序渐进，有条理而不凌乱；教师能精通细微的道理，并且能论证发挥。这样的教师，才能成为学生和人们学习的榜样。荀子对自己的学生充满了无限的期望，认定后继者通过学习必将超过前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是他留给后世的名言。

（4）韩非及其教育思想

韩非（约公元前 280—前 233 年）是先秦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战国末期出身于韩国贵族，具公子的身份。早年与李斯同师事荀子，“喜刑名法术之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看到韩国政治腐败力量贫弱，一方面，多次劝谏韩王变法图强革新，但始终未被采纳；一方面，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和《说难》10 余万言的著作，系统地阐述法家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当这些著作传至秦国，立刻受到秦王嬴政的重视赏识，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公元前 234 年韩非出使秦国，因受李斯、姚贾谗言陷害，次年（公元前 233 年）便囚死于狱中。他的著作后人称为《韩非子》，流传下来，现存 55 篇，是研究韩非和法家学派思想的主要资料。

韩非继承和发展先秦法家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三者结合起来，融汇贯通，冶为一炉，成为法家学说集大成者。他批判了儒、墨、道三家的历史观，指出历史是在向前发展，提出今世必然胜过上古、中古和近古之世的进化历史观点。韩非认为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时代在变化，所以治理社会和统治国家的办法也应该按照现实的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墨守成规遵循古代的传统。他说：“圣人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嘲笑如果用古代的办法来管理当今的百姓，就好

比宋国农夫“守株待兔”那样的愚蠢可笑。韩非对人性的认识，比其老师荀况的“性恶论”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为一种绝对的“性恶论”。他以为人性都是恶的，是自私自利的，上至君臣下到百姓，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利害的关系，甚至父母子女之间也不例外。他的以法治国的思想正是建筑在这种绝对的“性恶论”的基础之上。韩非主张“法治”，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人之手，实行绝对的专制，以严明的赏罚驱使臣民效力服务，用严酷的刑法镇压人民的反抗。韩非的这些思想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他们要求变革现实的需要，秦统一以后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思想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的教育思想是和他的整体法治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的教育主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严格禁止“二心私学”。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取缔“二心私学”。

韩非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不是一条心，故称这些私学为“二心私学”。这些私学“乱上反世”，是天下祸乱的根源。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五蠹》）这意思是说，新兴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权，如果放松警惕，让那些儒家学派的人用文学扰乱法律，侠士们用武力触犯禁令，而统治者还以礼宾厚待他们，势必会动摇政权的巩固。

为了适应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统一政治的需要，韩非主张治国以法为本，在上层建筑领域只能宣传法家思想，严格禁止“二心私学”的存在，打击镇压“儒生”。要求对办私学的人“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禁止他们的行动自由和结社的自由。并具体提出禁绝的办法，“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从思想、言语到行动都要严加控制，以有利于思想的统一。

培养智术能法人才。韩非从推行“法治”，建立封建专制的需要，明确把培养智术能法人才作为教育目的，体现了法家关于人才的观点。韩非培养人才的目标，与儒家和墨家思想有很大不同。儒家以培养“明人伦”的君子或士为目的，墨家以培养具有“为义”、“兼爱”精神的兼士或贤士为目的。韩非则提出教育要培养“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和“耿介之士”。他认为，“智术之士”见识远大、明察事理；“能法之士”强毅刚正、敢于斗争；“耿介之士”驰骋疆场、勇赴危难。一句话，教育目的应该培养一批忠实和服务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明法、守法、行法的具有革新精神的人才。韩非鄙视那些所谓“行仁义者”和“工文学者”，瞧不起儒、墨各家培养出来的人物。他专门写了《五蠹》这样一篇文章，对危害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秩序者，称为“奸伪无益之民”，把这些人看作是国家社会的蠹虫。“五蠹”包括“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的学者（儒生）、言古者（说客策士）、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耕战之人）以及工商者，而将儒生列在“五蠹”之首。他说：“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五蠹》）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八个字是法家教育思想的中心思想和核心内容，可以看作是法家教育的总纲领。这一思想从提出到实行看来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重视法治教育宣传法令内容，主张法令必须明白易知，由官吏向百姓解释宣传。之后

韩非在继承商鞅法治思想的基础上，从“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的观点出发，认为必须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行符合法家精神，遵守国家的法律，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于是明确提出了“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的著名的教育方针。法家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及至，秦统一以后，李斯便向秦始皇建议：禁私学，烧《诗》、《书》和百家语，“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法家的法治教育思想得到了全面贯彻实施。

韩非提出“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就是进行普遍的法治教育。他把封建国家颁布的政策法令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让全国人民都来学法、执法和守法。这个“法”，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诸方面。这样，法家的教育内容就和儒家把以礼乐为主的教育，墨家把科学和生产知识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完全不同了，以法律的教育代替了文化知识的教育。而“无书简之文”语，实质上就是废除清算古代的文化典籍，《书简》即指《诗》、《书》、《礼》、《乐》等典籍。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家把一切书籍都不要，按照韩非自己的解释：“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这说明，关于“法”的书籍还是可以保留的，其他如兵、农的书简也还是要的。实际上，当时民间收藏法家的著作十分普通，“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这些话是韩非亲自目睹之后写在了《五蠹》篇之内。

韩非为了推行“以法为教”的教育内容，同时提出“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保证实现的措施。“以吏为师”，就是政府各级官吏担任教师进行法治教育。这些封建国家的官吏要能够“明法”、“知法”、“行法”，他们掌握教育权力，可以解释和宣传法令政策。这里的“师”，已不同于人们平常所说的“师”，而是法家进行法治教育的执行者和宣传者。而“无先王之语”，意思是剔除古代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宣传的礼乐一套东西，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倡导的“以吏为师”的教育主张，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得到大力推行。1975年底，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12座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秦代竹简，大部分内容是法律和文书，有不少是直接与吏师制度有关的。如吏师弟子有正式学籍，有专门的“学室”对弟子进行教育，选拔黜免及役使均受朝廷法令制约。这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韩非和法家的思想提供了翔实的文字实物资料，是值得重视的。

韩非提出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政策，在新兴地主阶级取得全国统一政权的前夜，对社会实行普遍的法治教育，使教育为封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政治服务，应该说有积极的一面，也是一种重要的措施步骤。在当时进行法治教育，使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教法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人知法人人畏法，坏人坏事不易发生，这对维护社会秩序、富国强兵都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从整个文化教育发展方面来看，韩非所倡导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种教育思想又未免片面和狭窄了，它违背了教育的规律和特点。“以法为教”是除了法令教育外，不要其他的教育；“以吏为师”是除了官吏以外不要其他的教师。韩非的这种法治教育思想，在实际上取消了文化知识的传授，否定了人类知识的作用，也否定和贬低了学校教育和教师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没有认识到教育的全面意义及其特点，

这是韩非和法家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缺陷和严重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我们概括地介绍了墨子、孟子、荀子和韩非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他们对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育原则、学习方法、教师等教育各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墨子躬行实践、培养“兼士”、重视科学技术的教育思想。孟子提出“性善论”、强调“明人伦”，重视道德修养和意志锻炼的教育思想。荀子主张“性恶论”，所著《劝学篇》论述学习，尊重教师“贵师重傅”的教育思想。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培养智术能法人才的教育思想。这些都丰富了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理论的宝库，也可以看出当时教育思想的深刻性和多样性。

4. 著名学府“稷下学宫”的创建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官学衰废，教育主要靠私学，值得注意重视的，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学宫”的创办。这所著名的学府的建立不仅成为当时列国的文化教育中心，百家争鸣的园地，而且是向新的封建官学过渡的一种形态，对封建官学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在都城临淄的稷门设立的学校，故称“稷下学宫”或“稷下之学”。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关于它的创办时间，自汉代开始就有争论，今人一般认为：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在位执政期间（公元前374—前357年），根据东汉徐干（《中论·亡国》）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孙培青先生据此推测，稷下学宫创立于公元前360年左右，距今约2350余年（见孙培青：《学术自由的稷下学宫》，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齐威王继承其父桓公事业在位时（公元前356—前320年），任用邹忌、田忌、孙臆改革军政，注意广泛延揽人才，发展扩大稷下学宫，齐国和其它各国学者纷纷来此讲学著书。对留在学宫的著名学者，给予优厚待遇，尊称为“稷下先生”。到齐宣王在位时（公元前319—前301年），稷下学宫发展达到高潮，史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后经湣王（公元前300—前284年）、襄王（公元前283—前265年）时期，稷下学宫虽然名声远扬，却在逐步衰落。至齐王田建时（公元前264—前221年），齐国为秦国所灭亡，稷下学宫随之终结。稷下学宫从创办到结束历时约150年左右，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化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稷下学宫的创办不是偶然的，它是齐国封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产物，初创目的是由于齐国政府欲“招致贤人”为其政治服务，齐宣王就说：“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战国策·齐策四》）。这表明学宫开始具有公室养士的性质，且养士用士这一基本思想贯彻在办学的始终。据刘向《别录》：“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进一步说明了稷下学宫还是一个官办的教育机构，齐国政府利用稷下学宫不仅大量招贤养士，还借此培养训练封建官吏。这样，稷下学宫就由养士制度发展转化成为官办的封建学校。

稷下学宫创办之后，大量的文人学士和他们的学生一批批地络绎不绝地来到稷下。稷下学宫建筑规模宏大，康庄大道、高门大屋，能容纳上千名师生，为各国游学者的吃住提供了方便的物质条件。学宫有教师，有学生，有教有学。当时，各家学派名流学者，都是自己开办私学，他们来时很自然也就把学生带来了。如淳于髡、孟子、田骈、宋鈞、尹文这些人都是率群徒来的，少者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齐威王和齐宣王大兴稷下之学，宣王时还将著名的七十六位先生赐予“上大夫”的荣誉称号，这些人享有个人宅邸。多数的老师和学生一同吃住在学宫。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吏治不参予政事，可以自由研究讨论问题，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化知识教学活动。各国学者荟萃到此讲学，使稷下学宫很快发展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教育中心。

稷下学宫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特色，它的特点是欢迎游学、学术自由、待遇优厚，其中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是最基本的特征。其一，欢迎游学。稷下学宫与西周奴隶制的“学在官府”完全不同，欢迎游学允许有教和学的两个方面的自由。这就是说，教师可以自由招收学生到处讲学，学生也可以自由寻师求师受教，这是私学出现后产生的教育形式，稷下学宫利用这种方式开展教育活动，成为一个十分集中的游学场所。来游学者可以是个别的，也可以是集体的，稷下学宫对来者不论属于那一个学派一律表示热情接待。教师择优聘请，首席不由官方指派，而由众人推举，称做“祭酒”。荀子来稷下学宫“最为老师”，曾三次被推为“祭酒”。这种灵活的游学制度，学无常师行动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使师生扩大见闻，促进思想交流发展，有助于人才的尽快成长。其二，学术自由。表现在凡来稷下学宫讲学的各家各派，虽然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不同，但都可以在稷下讲学。根据史书记载，来过稷下学宫的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儒家有孟子、荀子，道家有彭蒙、宋鈞、尹文、接子、季真、环渊，由道家发展为法家的有慎到、田骈，名家有儿说、田巴，阴阳家有邹衍、邹奭，博学而无所谓学派的有淳于髡、王斗、徐劫、鲁仲连等。可以说，稷下学宫容纳百家，来者不拒。各家学派在稷下学宫展开了百家争鸣，活跃了思想，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例如，孟子自称“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也说：“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荀子·非相》）宋鈞、尹文“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庄子·天下》）。田骈能言善辩，被当时人称之为“天口骈”。又如名家儿说“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辩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邹衍被称为“谈天衍”。这样一大批的辩才汇聚稷下，进行自由辩论，创造了稷下学宫的学术研究辩论的兴盛局面。辩论的过程和形式，有个别进行，也有大规模公开辩论；有先生之间辩论，也有学生与先生之辩；有学派内部之争，也有学派互相间的辩论；还有稷下学宫先生和齐国政府执政者间的辩论。辩论的问题内容既有理论性的，也有对现实问题发表的见解。这样的学术辩论促进了诸子学派的吸收、分化和交融发展。稷下学宫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缩影，先秦学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高峰。其三，待遇优厚。齐国政府为使稷下的学士们专心致志讲学著述，给他们以很高的政治荣誉和优厚的生活待遇。齐宣王挑选各家学派学士76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修建壮观的府第，表示尊宠之意。淳于髡、孟子、荀子被尊为卿，孟子还授予一级客卿，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学士们获得相当于上大夫的俸禄。齐国统治者考虑到稷下学宫人数众多，还把学士划分

等级，分别按级给予款待。稷下学宫不仅对学士这样优厚待遇，而且连随从他们的学生也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在战国时期普遍尊礼贤士的风气之下，稷下学宫给予学士的优厚待遇，表明了齐国统治者对于人才的尊重，这虽说是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可也是稷下学宫长期发展兴盛的原因吧！

稷下学宫创办的历史意义，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稷下学宫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开创了我国封建时代创办官学的道路，对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包括私学如书院制度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稷下学宫所独创的官方兴办，私方主持的办学形式；容许人才流动自由游学讲学、兼容并包各家私学的办学方针；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和提倡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以及尊重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都是具有启迪作用的。稷下学宫是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大创造，既使在今天，它的办学成功之处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